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客死他乡的国王

—南越王陵揭秘



前 言

西汉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盛世，虽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向前发展了，但人们的思想仍然非常迷信。表现在对死亡的认识上，人们大多认为人死后灵魂尚存，还要像活人一样吃喝玩乐。基于这种观念，汉人死后不惜巨资，挖墓穴、做棺槨、着玉衣，随葬丰厚的物品供死者的灵魂享用；还要在地面之上高筑坟丘、陵园、祠庙等，设专人负责维修，按时供奉。西汉时期厚葬之风甚盛，从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中可以得到具体、形象的反映。当然，厚葬只局限于极少数统治阶级，广大平民百姓是追赶不上厚葬之风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基本建设速度的加快，配合建设发掘清理的古代墓葬越来越多。著名的河北满城汉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北京大葆台汉墓等西汉王侯陵墓就是因此被发现、发掘的。本书重点介绍的广州南越王墓也是在建筑机械的轰鸣声中被发现的。

丧葬制度是古代封建社会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至皇帝，下到平民，无论富贵贫贱，死后都有一套与其身分相符的墓葬规格。西汉丧葬制度最高的级别就是天子之制，在史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载，本书也将有所提及。仅次于天子之制的就是诸侯王的葬礼，在有关文献中有简单的记载，本书拟做较详细的叙述。南越王墓就属于一座与众不同的诸侯王墓。说它与众不同，是因为它远离中原，偏居岭南，南越王又曾称帝，实际上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南越国的皇帝。表现在墓葬上，既有中原地区汉文化的特征，又能看到江汉地区楚文化的一些痕迹，还掺杂着岭南地区百越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同时也能充分反映出南越王称帝的历史事实。

本书编写的目的，是想通过南越王墓的发现、发掘与研究概况来展现汉代诸侯王墓的一般情况；用墓中出土的文物珍品等直观、生动的材料丰富人们的文物考古知识，进而增强人们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意识，最终使得人们更加热爱祖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

《华夏文明探秘丛书》

总序

我们一起寻根

我们共同探源

古老的历史，并没有全都记载在浩瀚的史书里；悠久的历史，也没有全都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往事如烟，岁月悠悠，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她有许多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秘密，等待人们去探寻。

被称为“尘土学者”的中国考古学家们，为了探索华夏文明的奥秘，发掘出了许许多多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珍宝，他们将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那些辉煌的篇章，展现在现代文明面前。

考古学家是经历人生艰辛最多的一类学者，他们苦苦求索，锲而不舍，硕果累累。

他们跋涉祖国的山山水水，走岩棚，入洞穴，风餐露宿，辛勤追寻人类起源的证迹；他们聚中原，散边陲，踏破铁鞋，艰难探寻华夏文明起源的轨迹。

他们奔走在古代骆驼商队往来过的丝绸之路，探访古代中西文化交汇的接点，发现了一颗又一颗大漠明珠；他们一次次进入古人生活过的聚落废墟，仔细审视它的主人遗下的足迹，亲身感受我们的先民们存留的气息。

他们周密勘探一座座湮没的千年古都，查证昔日的纵横街坊，复原消逝的巍峨殿宇；他们亲手开启历代帝王陵墓的大门，领略皇家葬礼的威仪，揭示神圣地宫的奥秘。

他们细心临摹古代墓室斑驳的壁画，揣摩无名画工的真实用心，再现古代社会生活的生动画卷；他们流连在残断的甲骨简册之中，辨识早已音义无存的字符，重现方块汉字演化的信息。

他们深潜江河湖海，寻找波涛吞没的古代商船，探取静静沉没在水下的珍宝；他们查访沙海深山的石窟摩崖，感受泥塑石雕折射的佛光，探索古代佛教艺术的真谛。

他们几乎天天在摩挲古人使用过的器具，研究它们原本的用途，揣度古代工匠不朽的匠心；他们寻觅到许多被历史老人遗忘的事物，纠正了不少世代相传的误说，费心考查万物的来历……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本来是最质朴的学者，被人理解却越来越不容易；本来是一门大众化的学问，却久在象牙之塔愈来愈神秘。人们不了解从事这寻根探源的文物考古学家们，也更不了解华夏瑰宝重见天日的曲折过程。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我们就有了编写这套丛书的动机，也是为着了却一个久久不能忘怀的心愿。本丛书旨在普及文物考古学知识，企求在文物考古工作者与普通读者之间，架起沟通彼此的通畅桥梁，提供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

丛书的大部分作者，都是研究文物与考古的学者，作者在这里奉献的，是他们孜孜不倦研究华夏文明的心得，是他们辛辛苦苦探寻华夏文明的收获。作者们说道的不仅有收获的喜悦，还有探索的艰辛；不仅有珍宝出土的传奇故事，也有探索者自己的离合悲欢。

丛书探讨的，是人们触摸得到的曾经深藏在历史尘埃中的华夏文明，拂去历史尘埃，这些神州宝藏便见缤纷光彩。沐浴文化的雨露，蹈循历史的印迹，我们可以聆听到华夏文明演进的千古足音。

古老的华夏文明，像是一座巨大的迷宫，锁住了太多太多的秘密。我们的作者们领先一步，进入这千古迷宫探秘，一睹尘封的光彩，他们愿意与读者分享先睹的快乐，与素不相识的老少读者进入时空隧道，一起寻根，共同探源。

1996年3月于北京

南越王陵揭秘

昙花一现的岭南王国 西汉南越国简史

秦以前的岭南

岭南是指五岭以南、南海以北的这片土地。五岭在今天的湘赣、粤桂边界上，具体地说，从东到西依次是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它们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岭南地区气候温暖、雨水丰沛，自古以来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1958年，在广东省曲江县狮子岩发现了一个人类头盖骨的化石，经测定距今已有10万年。以这个头盖骨为代表的古人类被命名为马坝人，说明岭南地区至少在10万年以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

大约在1万年前，岭南的先民们居住在天然的洞穴中，以采集植物的根茎、果实以及打猎为生，使用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称这个阶段为“旧石器时代”。到了四五千年以前，人们已经知道将打制的石器进一步磨制，使石器变得更锋利、更合用。考古学上把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这时的人们居址选择在距水源较近的地方，主要是大小河流两旁高起的台地及向阳的山坡上。

由于居住环境的不同，先民们谋生的方式也就不同。居住在北部、中部山区或平原上的人们，主要是靠采集植物根茎、果实，捕猎动物为生，也捕捞河中的各种水产作为食物。而沿海的居民，主要打捞海中的各种贝类和其他海洋生物。他们使用一种特殊的石器，叫做“螻蛄啄”，用来敲破牡蛎类的硬壳以食其肉，所以在他们居住过的地方留下了贝壳堆积，称作“贝丘遗址”。

但不论居住在何处，此时的人们已学会烧制陶器，有装水用的器皿，有煮饭用的炊具，等等，以供日常生活所需。他们已经会造房子，不再居住在阴冷潮湿的洞穴中了，他们创造了一种适合南方潮湿环境的房屋，即先在地上打木桩，搭起支架，再在架上造房子，这种房屋被称做“杆栏式房屋”。

岭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000左右进入青铜时代，已有了本地区冶铸的青铜器。现在考古发现的有盛酒水的青铜提筒，一种靴形钺(yuè)，都是富有本地特色的产品。秦始皇统一岭南前，这里的越族大多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刚刚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还没有形成国家，只有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君长。

关于这一点，史书有零星的记载。如《越绝书》记载：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了越国，越王无疆的儿子之侯带领越人散入岭南，与岭南的越人会合，之侯自封为君长。又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广西地区曾有西匠君译吁宋，秦军攻略岭南时才把他杀死。居住在今越南境内的雒越人，也是部落联盟的君长统治。

秦统一岭南后，在岭南设置郡县，推行了封建制度，一下就改变了越族社会的发展进程，其奴隶制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就缓慢地转入了封建制社会的发展阶段。秦代统一岭南，是岭南开发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秦始皇统一岭南与赵佗立国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原，建都咸阳，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罢休，将目光又落在了岭南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派大将屠睢率领 50 万秦军，兵分五路南攻。据史学家考证，这五路大军，其中两军在湖南，两军在江西，一军则直逼番禺。后来的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就是当时秦军中的一员战将。但是秦军征服越族的战争并不顺利，遭到了越人的顽强抵抗，越人不愿成为秦军的俘虏，纷纷逃入深山密林中。他们发挥自己善走山地、习水性的长处，经常偷袭秦军，使秦军疲于奔命，连主帅屠睢都被杀死了。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秦军陷入了攻不能克，守无后援的困境。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下令监御史史禄开凿了沟通南北水运的秦凿渠——灵渠。灵渠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水系，解决了秦军粮食运输的大问题，而且在统一岭南后为岭南地区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灵渠修成后，秦始皇立即重新部署了统一岭南的战争。始皇三十二年未或三十三年初（前 215—前 216 年），派秦尉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秦军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很快击溃了西瓯越人的反抗，杀死其君长译吁宋，占领了西瓯地区。随后又挥军南下，占领了雒越居地。经过 6 年的艰苦作战，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4 年），秦终于统一了岭南。

秦统一岭南后，在岭南地区也推行了郡县制，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桂林郡的辖区在今广西，首府是布山（今广西贵县）；南海郡所管辖地区，主要是今天的广东地区，首府设在番禺（今广州市）；象郡的辖区，一般认为在今天的越南境内。南海郡的郡尉是原秦军将领任嚣，赵佗则任龙川县的县令。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 213 年，开始修筑“秦所通越道”，这些道路被称作“新道”。据专家考证，新道共有四条：一条自江西的南安越过大庾岭进入广东南雄；一路自湖南的郴州越过山到广东连州；一路从湖南的道州进入广西贺县；一路自湖南全州（今属广西）进入广西静江。这些新道都是利用原来的古道扩建而成的，原来的古道往往是当时穿越五岭南北最方便、最近捷的道路。秦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宽成为新道，既省时省力，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确保新道的畅通和加强对南越的军事控制，秦在新道所经岭口要隘和一些战略要地修筑了秦关。在广西的灵渠沿岸有秦城、严关，在广东则建有“横浦关”、“浚浦关”、“阳山关”和“湟溪关”等秦关。

秦始皇略取岭南越地之后，为了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将一部分军队留下来，镇守郡治、秦关。另外，又迁徙中原的商人、赘婿、罪犯等到岭南，与越人杂处。这些移民的到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秦王朝统一中国的事业是伟大的，然而其统治残酷暴虐，这就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公元前 209 年 7 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首倡天下，各地豪杰纷纷响应，六国贵族也趁势而起。同年，秦王朝被推翻，各个割据势力之间展开了争夺天下的战争。

在这种局势下，南海郡尉任嚣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分地为王、称霸一方的机会到了。但当时他已重病在身，所以召来了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对他谈了自己的打算，指示赵佗封闭新道关口，静

观其变。任嚣谎称接到皇帝的诏书，任命赵佗为南海尉，将权力移交给了赵佗。不久，任嚣就病逝了，赵佗按照任嚣的构想开始行动。他发布文书，通告横浦、阳山、湟溪三关的驻军，说中原的盗兵快要来了，令驻军切断新道，严守各个关口。同时，又杀掉了一批秦王朝任命的官吏，换上了自己的心腹，这样就铲除了异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控制了南海的军事力量，在岭南实行军事割据。这时，中原地区仍处在各割据势力的混战之中。赵佗控制南海郡，据岭自守，静观其变，使当时的岭南地区免受战争之灾。

公元前 206 年，秦王朝灭亡。同年正月，项羽分封诸王，自封为西楚霸王，都彭城。项羽想用分地为王的封建割据来稳定自己的霸业，但实际上适得其反。同年八月，汉王刘邦暗渡陈仓，还击“三秦”，楚汉战争爆发了，中原地区又是硝烟四起。这场楚汉战争，一直打了好几年，而赵佗趁此时机开始了立国的行动。公元前 204 年，赵佗发兵进攻相邻的桂林郡和象郡，兼并两地，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南越国的兴盛和灭亡

赵佗在岭南称王时，正是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争夺皇位之际。西汉王朝建立后，由于连年的战争，社会经济凋敝不堪，财富极度贫乏，连皇帝都找不到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架车，而丞相等高官也只能乘坐牛车。而此时，西汉王朝分封的诸侯王都手握重兵，各霸一方，西汉王朝的政权尚不稳固。另一方面，北方的匈奴经常骚扰西汉的北部边境，掳掠人畜，对西汉王朝的威胁极大。在这种形势下，西汉王朝无力举兵南下剪除南越王，所以采取了怀柔的政策，封赵佗为南越王。从赵佗来讲，新近称王，本地越人尚未顺服，也不敢轻举妄动。另外，岭南地区经济落后，必须依靠中原输入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所以赵佗也欣然接受了汉高祖赐与的印绶，向西汉王朝称臣。

但实际上，汉高祖对赵佗并不放心，在当时与南越国的边境上修建了两座城堡——赣县古城和零（yú）都古城，以此来防御赵佗的军队；还派遣两个将军常驻长沙国监视南越的动向。

可见汉高祖对南越实行的是表面怀柔，实际防范的策略。汉高祖在世时，两国互派使者，互通贸易，关系相处得还比较好。

汉高祖在位仅7年，于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去世，其子惠帝即位。惠帝体弱多病，朝廷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入吕后之手。

吕后把持西汉政权时，一改高祖时的政策，将南越视作蛮夷，下令停止了与南越的贸易往来，“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意思是不要向南越输送铜铁工具和马牛羊等牲畜，即便给也只给雄的，不给雌的。当时南越国的铜铁工具大多依靠中原进口，而且牲畜看来也是从中原输入的，断绝了贸易往来，就断绝了先进的生产工具的来源，对南越国的生产、生活影响非常大。这样一来，西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赵佗先后三次派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到长安上书，劝告吕后不要将南越按蛮夷对待，恢复边关贸易。但吕后不予理睬，还扣押了南越国的三位使者。不仅如此，吕后还派人到赵佗的老家河北真定，掘毁了其父母的家墓，削杀了他的兄弟宗族。吕后的这些行为，更激起了赵佗的反汉情绪，于是在公元前183年自封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dao），与西汉政府平起平坐。

吕后听说南越王赵佗称帝的消息后，非常生气，削去了南越王的诸侯之籍，与其断绝使者往来。这样，汉高祖建立起来的西汉和南越的友好关系陷于破裂。由于赵佗猜疑是长沙王向吕后进谗言，所以多次发兵北上，攻打长沙国的边邑和南郡。长沙国苦于南越国的多次侵扰，向西汉王朝求援。吕后派隆虑侯周灶率领汉兵，计划翻逾越城岭，取灵渠严关之道，以攻打南越国。当时正值南方炎热多雨的季节，北方士兵难以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许多士兵都生了重病，死亡的人很多。赵佗也派重兵把守设在越城岭的关口，与汉兵对抗。所以汉兵始终未能逾岭进入南越国境内。汉越双方相持了1年多，至公元前179年吕后病死之后，汉军主动撤军，双方才休战。

吕后死后，诸吕叛乱，但很快就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平定。同年9月，陈平、周勃等迎立代王刘恒为帝，这就是汉文帝。

文帝即位后，派使者四出告谕各诸侯国和四方各少数民族，说吕后有病，头脑不清醒，做了一些错事，等等。这时南越王赵佗主动向西汉王朝表示和解。他通过在越城岭相持的汉军将领隆虑侯周灶向汉文帝上书，要求汉文帝帮他寻求服内兄弟，还请求罢免汉朝派驻在长沙国监视南越国的两位将军。

汉文帝接到上书后，派人修治了赵佗在真定老家的祖先冢墓，并派人看守，定时祭祀；又派人寻访赵佗的亲属，封他的兄弟为官，并赐与财物；罢免了汉朝派驻在长沙国的将军博阳侯陈凵。接着汉文帝又召见了已经告老还乡的陆贾，任命他为太中大夫，再次派他出使南越，并给南越王赵佗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对赵佗的上书予以答复，请陆贾带上亲自交给赵佗。在信的最后一句劝赵佗去帝号，表示“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还给南越王送了 100 件厚薄不等的丝绵袍作为礼物。

汉文帝的诚恳态度感动了赵佗，他看完汉文帝的信后，表示愿意臣服，长为藩臣。他在国中下令说：汉皇帝是贤明的皇帝，从今以后，去帝号、黄屋、左纛。同时又给汉文帝写了一封回信，说：我在越地已经 49 年了，现在都抱孙子了。但是每天睡觉不安稳，吃饭不香，漂亮的東西不想看，悦耳的音乐不想听，只是因为不能事奉汉朝。现在陛下又恢复了我南越王的称号，与我南越通使，我从今以后不敢再称帝了。还给汉文帝进贡了一批土特产，有“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作为对汉文帝赠赭（zh）衣的回报。

自此以后，南越和西汉王朝的关系重新和好。赵佗以后，继任的南越文王赵佖（mò），明王婴齐都曾相继派遣太子到长安“入宿卫”。

但实际上，南越王臣服于汉王朝也只是一种表面作法，而且赵佗也一直对西汉王朝存有戒心。如果按当时的制度，诸侯王要定期到长安去朝见天子，但赵佗总是称病不入朝。而且赵佗表面对西汉王朝称臣，但在其国内仍然称帝号，从象岗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釜”金印来看，第二代王赵佖也是僭称帝号的。

赵佖与赵佖之所以“居国窃如故号”，是与当时的形势有关的。汉高祖立国之初，曾分封了一些功臣为诸侯王，但高祖对他们不放心，后来逐一削夺其王位，而设封同姓子弟诸侯王。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巩固其统治，但适得其反，这些诸侯王独霸一方，对中央政府构成极大威胁。汉景帝时为了限制诸侯王，实行削藩政策，终于酿成了“七国之乱”。中原地区诸侯王势力的猖獗，使本来就心怀异志的南越王跃跃欲试，随时准备重新称帝。后来西汉中央政府平定了“七国之乱”，至武帝时又以酎（zhù）金成色不足，削夺了一批诸侯王的爵位。其后又于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使诸侯国越分越小，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相抗衡了。这种形势下，南越王再也不敢称帝了。到第三代南越王即位时，“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行为有所收敛。

赵昧在位 10 余年，死后西汉王朝封谥为文王。其子婴齐即位。婴齐曾入长安为宿卫，在越时曾娶越女为妻，生子赵建德。入长安后，又娶邯郸缪氏为妻，生子赵兴。文王去世，他带着妻儿回到岭南继承了王位，并上书汉王朝，请求立缪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婴齐在位几年，汉朝曾多次派遣使者来南越国，召婴齐入朝晋见汉天子。婴齐担心入朝后“要用汉法，比内诸侯”，即成为没有军政大权，只能取得国内经济收入的“空头王”，所以不肯去长安，屡次以患病推托。只派了儿子次公去当皇宫宿卫。不久，婴齐病死了，汉王朝封谥号为明王。

其太子赵兴即位，成为第四代南越王，其母缪氏成为太后。缪太后未嫁婴齐以前，曾与长安近郊的一个叫安国少季的人有暧昧关系。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派安国少季做使者，带了能言善辩的谏大夫终军，勇

士魏臣，到岭南来宣谕太后和南越王“比内诸侯”，入朝晋见天子。

樛太后与安国少季的关系，国人人都知道，故而对樛太后很反感。樛太后也自知不得民心，生怕自己的地位不稳，想借助汉王朝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此时赵兴尚年幼，没有主见，樛太后说服了赵兴，通过汉使者上书汉武帝请求内属，按“内诸侯”的待遇，三年朝见天子一次，撤除边境上的关卡。汉武帝当然会同意这样的要求，封南越王兄赵建德为术阳侯，赐给丞相吕嘉银印和内史、中尉、太傅等高级官吏的印章，准许南越国其他官吏自行设置，同时诏令废除黥、刖等酷刑，奉行汉朝法律。并令使者留驻南越国，帮助赵兴及樛太后镇抚岭南。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则日夜整治行装，准备入朝晋见汉天子。

南越国丞相吕嘉，曾任三朝丞相，即从赵昧到赵婴齐到赵兴他都担任丞相之职，其宗族中任官吏的有 70 多人，他的子弟也都是与南越王室联姻，在国中有很高的威望。吕嘉极力反对南越国内属，并多次劝谏赵兴，但不奏效。所以吕嘉就借口有病，不见汉使。

樛太后害怕吕嘉要谋反，想先发制人，铲除吕嘉。于是她在宫中设宴，请汉使者和国中大臣赴宴，这实际上也是一次“鸿门宴”。但吕嘉也是有备而来，其弟是南越国的一个将军，带领士兵守在宫外。饮酒之间，樛氏想借汉使杀掉吕嘉，故意问吕嘉说：南越国内属是利国之事，丞相为什么不赞成呢？想以吕嘉的话来激怒汉使，但吕嘉却一言不发，加上汉使优柔寡断，不敢动手。吕嘉见势不妙，立即离席而去。结果宴席不欢而散。吕嘉从其弟那里借了部分士兵保卫相府，从此称病不出，既不见南越王，也不见汉使。私下与其弟密谋调兵遣将，策划作乱。但他知道南越王赵兴一直无意杀自己，所以几个月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樛氏想自己动手杀掉吕嘉，却又无人可用。

这个消息让汉武帝知道了，责怪汉使怯懦不果断。武帝以为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均已附汉，只有吕嘉一人为乱，不必兴师动众，所以决定让庄参带 2000 人去南越国，协助樛太后镇抚国内。庄参却认为，如果是友好往来的话，带几个人就够了，如果是刀兵相见的话，2000 人就太少了，起不到什么作用。汉武帝罢了庄参。有一个叫韩千秋的人却自告奋勇，说：小小的南越国，又有南越王和王太后内应，只有丞相吕嘉作乱。只要给我二百人马，一定取吕嘉的首级回来。于是，汉武帝派韩千秋和樛太后的弟弟樛乐带 2000 人马前往南越，直入南越境内。

汉军南下，激化了南越内部的矛盾，逼得吕嘉不得不起兵谋反。吕嘉孤注一掷，和其弟率领将兵攻入王宫，杀死了南越王赵兴、樛太后和汉朝使者。并通告国人，说：南越王年幼无知，摆太后是中原人，又和汉使关系暧昧，一心想内属，完全只顾个人一时之利，不顾赵氏的社稷江山。我为赵氏江山社稷的永存，起兵杀死了王与王太后、汉使者。立明王越妻所生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王。这就是第五代南越王赵建德。吕嘉叛乱时，汉将韩千秋已率军进入南越国境内，并且已攻下几个小县城。越人故意放韩千秋入境，“开道给食”，使韩千秋放松警惕。直到汉军进到距番禺只有 40 里的石门时，才突发奇兵，一举歼灭汉军，韩千秋和樛乐都被杀死。随后，吕嘉派人函封汉使者的使节，连同为自己开脱罪名的谢罪信，放在汉越两国之边关上。同时派兵严守各个要塞。

元鼎五年秋（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调遣粤人以及江淮以南楼船将士 10 万人，兵分五路，合击南越。伏波将军路博德从长沙国桂阳出发，沿湟水

南下。楼船将军杨朴，从豫章郡下横浦，从江西进入南雄。这两路均取北江而下，直捣番禺，是五军中的主力。原是粤人，后投降了汉朝的两名归义侯郑严、田甲分别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从零陵出发，一路沿漓水入今广西郁林，一路到苍梧。这两路军队利用灵渠与湘江水路，直逼番禺。驰义侯何遗带领巴蜀罪人以及夜郎国的军队，沿牂牁江，取道西江，会于番禺。

这场战争相持了1年多，到第二年冬天，即公元前111年，楼船将军杨朴才率精兵最先攻陷了广州城西北的寻峡、石门两道水上要塞，并且缴获了越方的粮秣船只，使汉军的给养得到补充。杨朴派人扼守石门，等待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到来。

伏波将军与楼船将军两军会合后，又以楼船将军为先锋，直逼番禺城下。楼船和伏波两军，分别驻扎在城东南和城西北。番禺城依山面水而建，经秦任嚣、南越王赵佗和吕嘉的多次扩建加固，池深城高。汉军围城多日，却未能破城。后来楼船将军杨朴纵火烧城，伏波将军路博德在军中设下营帐，专以官印来赏赐投降者。越人早就听说过伏波将军的大名，又不知汉军有多少人，纷纷出来投降汉军。伏波将军又让投降的人再入城去招降。于是番禺守军瓦解，全部投降。

南越王赵建德和吕嘉率领亲信数百人逃入大海。伏波又询问投降的越人，知道吕嘉等人逃跑的方向，派人追赶。伏波将军的校尉司马苏弘擒住了赵建德，被封为海常侯，原是越国“郎”官的孙都抓住了吕嘉，被封为临蔡侯。

番禺城破，南越王被擒，南越王国官吏纷纷投降。其中有苍梧王赵光，投降后被封为随桃侯。桂林郡监居翁投降后，又下令瓠骆40余万人投降，被汉王朝封为湘城侯。南海太守弃，率城投降，其儿子被封为涉都侯。揭阳县令史定，降汉后被封为安道侯。将军毕取，率军投降，被封为滕侯。

灭南越后，将南越管辖的地区，改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岭南地区重新成为汉朝郡县。

汉武帝平定了南越国后，随即又取得了西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胜利。

西南地区的且兰国君，因不愿随汉军出征伐南越，杀死了汉使者、太守，于是汉军派八名校尉率部镇压反叛。南越国灭亡后，汉军的一部分回师西南增援八校尉，杀且兰君长，并斩首数万人，在南部地区设立了牂牁郡。

一向与南越关系尚好的夜郎侯，一见情势不对，连忙入长安朝见天子，被汉王朝封为“夜郎王”。汉军诛杀了且兰邓君，并杀笮侯，使西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君长大为惊恐，纷纷请求归属汉朝，将其地纳入汉朝郡县。汉先后又设置了越巂、沈黎、汶山、武都四郡。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军又以兵威迫滇王内属。西南地区均归汉。

东南的闽越国，在南越国灭亡之后起兵叛乱，被汉武帝平定，将其民迁往江淮，闽越原地一下空虚了。

汉王朝的东南、西南和南面边境的割据势力全部剪除。汉武帝集中兵力对付北面的匈奴，亲率18万大军北上，匈奴慑于汉军的强威，不敢再来犯边。北部边界也得到暂时的安宁。

到公元前110年左右，汉武帝终于铲除了南越割据势力，消灭了闽越，降服了西南地区，威慑北方匈奴，真正达到了四海之内皆郡县，政令一由汉廷的空前统一的局面。

沉睡千年方今始醒

由上文可知，南越国共有五主。这五位南越国的最高统治者死后葬于何处？这一直是个谜。广州市考古队历年来发掘了成百上千座南越国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可就是无缘碰到南越王墓。为了寻找南越王墓，解开千古之谜，考古队员们长年跋涉在市郊的青山绿水之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许是感动了上帝，他们盼望已久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南越王墓的偶然发现

文献记载，南越王葬所非常隐秘。相传第一代南越王赵忙死后，为了防止后人盗掘，丧事是在十分神秘的气氛中进行的。出殡时四辆灵车分别从四城门运出，且多设疑冢，遮人眼目。三国时，吴主孙权曾派几千兵卒南下广州，在今越秀山一带寻掘南越王墓，结果只找到了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的墓。可见第一、二代南越王墓是何等的隐蔽！那么，葬所如此隐蔽的南越王墓是怎样被发现的呢？

广州市区北部有一座海拔 49.7 米的小山，山势南北长东西窄，形如卧象，故得名象岗。象岗原与越秀山相连，是越秀山最西边的一个小山岗。这座其貌不扬，土里土气的小山岗也曾有过辉煌过去。元明时，这一带古树参天、野花遍地、牧笛嘹亮、樵歌悠扬，是一处野味十足的名胜，曾招来不少厌烦都市生活的观光客。“象岭樵歌”还有幸成为明代羊城八景之一。也就是在明代，由于扩展广州城、大开北门的缘故，象岗与越秀山被拦腰切断，成为一座孤零零的小山。清代在象岗山顶建有城防炮台——巩极炮台，与其北面和东北面的保极、永宁、耆定三炮台共同构成广州城北的坚强防线。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象岗被划为军事禁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过去的荣耀并不能长久地留在现代人的记忆里。随着岁月的流逝，象岗的名字失去了往昔的魅力，几乎被人们忘掉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广州这个位于珠江三角洲的繁华都市，地皮紧张、价位暴涨。象岗山一带正是广州最繁闹的地区之一，它的北面是大宾馆、大酒店、民航和车站（火车站和汽车总站）集中分布地区，东西两面是游人如织的越秀公园和流花公园，车水马龙的解放北路紧贴岗脚，岗南是广州市主要街道之一的东风路。解放路和东风路繁华无比，沿路商肆鳞次栉比，几无方寸空闲之地。1980 年底，广东省基建处不惜巨资，在象岗顶挖山平土，历时 3 年，把山岗削低了 17 米，平整出一块约 5000 平方米的地皮，计划在此建造 4 幢高层公寓楼。1983 年 6 月 9 日，当北面的第一幢楼动工开挖墙基时，揭露出了一些大石板（即墓的顶盖板），石板与石板之间裂缝下面，空洞洞的，一片漆黑。遇到了这种出乎意料的新情况，工地负责人宣布暂停施工，保护现场，并及时把发现的情况报告给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一座沉睡千年的古墓终于醒来了，它睁开了眼，疑惑地注视着 20 世纪 80 年代人世间的巨变。也许墓主会首先发出这样的疑问：这里就是我曾经居住过、统治过的南越国吗？

地宫初探

1983年6月9日，广州市文管会在接到基建办公室关于发现地下建筑的报告后，立即于当日组织考古队员奔赴象岗建筑工地现场。因为墓口已经暴露了出来，建筑工地人多且杂，在刚发现大石板的时候，好奇的民工就找来了铁撬，想撬开大石板看个究竟。情况是十分紧急，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造成国家文物流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考古队员来到了施工现场后，黑色的天幕已经完全笼罩了五羊城。人们爬在石板上，从石板缝往里看，随着手电筒光柱的移动，发现里面有大铜鼎和几件陶器。原来这里真是一座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古墓。

既来之，则安之。考古队领导决定立即派人下去探明情况。此时此刻，考古队员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激动，又担忧，甚至还有点恐惧。激动的是这里有可能是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南越王墓；担忧的是此墓会不会也难逃厄运，被盗墓贼洗劫一空了呢？恐惧的是此墓用大石板封顶，有的石板已经断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塌陷事故。不用说，危险肯定是有的。探求未知的好奇与对考古事业的忠诚激励着人们奋不顾身。深夜10点整，一名瘦高的队员顺着石缝勇敢地滑下了墓室。“千万注意安全。闻到不同气味或听到异响，迅速往上撤。”同伴关心地叮嘱着。事后，这位第一个下到墓室探险的考古队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象岗探秘——广州南越王墓发掘散记》，发表在《岭南文史》杂志第10辑上。文中生动地叙述了这次冒险活动的经过（后文有关发掘的个别细节、趣闻引自此文）。当他双脚刚踩到墓室时，顿时，一股腐朽而又阴湿的空气袭人而来，我骤感一阵阵阴冷，浑身麻酥酥的。我小心地选好落脚的地方，抬头一望，墓顶石块多数已经断裂，不少落入墓室，四壁石块也有变化，使这个幽暗的冥宫更显得阴森可怕，但我还来不及惊慌，便被眼前景象吸引住了。墓顶和前室四壁都有朱墨绘的卷云图案，可见古墓原是富丽堂皇的。前室两侧是东西耳室，有过道相通。我轻步跨入东耳室，映入眼帘的珍宝简直不可胜数：那斑驳陆离的大铜壶、铜甬倒卧在室中，一件件大铜提筒、铜钁等排列有序地放在一起，一排整整齐齐的铜编钟在电筒光辉映下泛着绿光，彩绘漆钟架仍存。仿佛墓主刚刚离去，那悠扬的古钟声，依稀还在墓中回旋激荡。以过去发掘过的墓葬经验来看，我初步判断还没有人进入过此墓——墓葬没有被盗，这是一座千载难逢保存完整的大墓。面对着许多宝藏，我疑似自己是在梦幻中。想不到自己成了这座封闭了2000余年的神秘古墓的第一个探索者。我想起《天方夜谭》中阿里巴巴发现财宝时的神态，而现在，我连“芝麻、芝麻，开门吧！”这句咒语都来不及说，就置身于一堆古代宝藏中。墓顶多次传来问话，探询地下的情景，我却惊愕得一时忘记了回答，兴奋、惊奇交织在一起，使我忘记了置身于一个随时都可能发生险情的古墓中。

老麦和小陈等见下面没有动静，又着急地连连发问：“下面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随葬品吗？”“有，有许多文物。”我回答着，发现自己的音调有些异常。后室有一道石门，关得紧紧的。我想从门缝中窥看后室，里面却非常黑，一切都看不见。

老麦在上面要我带一二件文物来鉴定，我小心取下了一个铜编钟、一件大玉璧，记下了它们的位置。就这样，我在墓下停了约10分钟。同伴们七手八脚，把我从石缝中拉了上来。我还来不及擦掉身上的泥水，就激动地向老

麦等汇报：“墓室没有被盗，下面有许多珍宝……。”

经历了这次短暂的探险后，过度的兴奋，使我难于入眠。巨大的墓葬、彩绘的壁画、成排的编钟、铜鼎、玉壁……象岗古墓的珍宝，走马灯似的在我脑中回旋。在梦幻之中，我多么希望，墓主就是我们找寻多年的南越王。

精心组织紧张筹备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首先派人勘查清楚了墓的大致情况，并在墓地上搭盖了一座防雨大棚，同时，将有关情况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国家文物局，随后又派专人北上进京向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详细汇报。世界知名考古学家、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建议，由文化部和科学院联名上报国务院，请求准许发掘。广东和广州市领导对这次发现十分重视，为了协调和组织好发掘，成立了由广州市政府、人大、政协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文化局、公安局以及广东省文化厅的领导共同组成的发掘领导小组。国家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带来了国务院同意发掘的批示（由两位副总理亲自批准）及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发掘证照（全国各地文物考古部门正式发掘某一地点前，都必须上报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批准，在得到田野发掘证照后方可开始发掘）。最后，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帮助下，由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文管会三方派人组成“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由广州市文管会的麦英豪（即上文提到的老麦）出任发掘队队长，考古研究所的黄展岳和广东省博物馆的杨式挺任副队长。发掘队下设发掘组、技术组、保管组、行政组，成员共有40多人，分别来自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文管会、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广州图书馆、广州市文化局、广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

炎炎夏日艰难发掘

盛夏的广州，闷热异常，室外气温高达36℃以上，湿度接近100%。就是在这样的酷暑季节里，考古队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古墓的发掘中。

考古发掘本身就意味着破坏。当考古队员用小手铲、细竹签、小毛刷等发掘工具将随葬品上面覆盖的淤土及杂物轻轻剥离清扫掉的同时，随葬品，特别是容易腐朽的随葬品（如漆木器、丝织品等）就有可能遭到破坏。所以，要求考古队员在发掘时聚精会神，思想不能开小差。看来，发掘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

特别证件

虽然对外实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象岗发掘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仍不能有丝毫马虎。发掘队在墓的周围设立了警戒线，一批荷枪实弹的武装民警昼夜24小时站岗放哨、巡逻值班。凡是发掘队的成员，每人发给一张带有本人照片的特别证件。队员进出墓室时必须佩戴特别证件，还要接受武装民警的仔细核查。有如此严密的防范措施，想混入墓室看来是不大可能的。

发掘方法

考古发掘因发掘对象不同，发掘的方法也不一样。中国历史悠久，遗留至今的古代地上、地下遗址种类很多。如远古先民的村落遗址（包括房屋、窑场、祭祀、水沟等遗址）、古代城市遗址（包括宫殿、城墙城濠、道路、水渠、手工业作坊、市场等遗址）等等。发掘这类遗址，除需搞清楚遗址的形制外，最重要的是必须判明遗址的时代。所以，在发掘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地层的变化（在一般的情况下，下面地层的时代早于上面地层的时代）以及对出土物的对比分析（某一器物的形状，在不同的时期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不是捉摸不定的，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考古发掘的对象，除了古代人们在从事各种生产生活活动中留下的遗址，还包括人死后留下的墓葬。墓葬的发掘通常要比遗址的发掘简单一点，首先必须找到墓口或墓道口，然后顺着墓口或墓道口向下清理墓室。墓葬的发掘虽较简单，也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

墓道

墓葬的墓道一般都呈斜坡形状，墓道内填土经过夯打。此墓道内还填塞有大石块，所以必须动用汽车起重机将大石块吊离。在发掘快进行到墓门处，发现了一个用木材做成的椁室。木材椁室早已腐朽不存在了，发掘队员根据椁木腐朽后留下的痕迹，硬是一点一点地将椁室的形状搞清楚了。技术人员及时地绘图、拍照、录像，最后由保管人员提取文物入库。

前室

进入第一道石门，就到了墓的前室。这道石门，在安葬了墓主，封闭了墓门，用大石块回填墓道时，受到了大石块的撞击，门的上轴已经折断，两扇石门向内倾移，中间已有一道缺口可容人自由进出。前室的发掘步骤是，由技术人员进入室内录像，根据录像记下的墓室内的险情，制定排险、防险的安全措施，然后进行发掘清理。从录像上看，前室顶是由很大的一整块石板覆盖着，石板已断裂错位。若不采取措施，随时都有可能塌陷下来。技术人员首先测量了暴露在外的几件器物的位置，暂时取出，以防顶石塌陷毁坏。然后，用装满木屑的麻包垒成一个方形支柱，承托断裂错位的顶盖石，再铲去顶盖石上方的填土，用汽车起重机吊走石门和断裂为四的顶盖石。这样，

前室内的险情被排除了，发掘清理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东西耳室

东、西耳室的修造方法与其它墓室不同。这二室的建造方法是，先在原岩上凿掏出洞室，再于洞室内用石块垒砌而成。

东耳室的顶上有一块盖石断裂掉落，斜搁在室内当中处。由于石块太大，无法运出耳室，必须先将室顶的原岩凿穿，从上面吊开石块。石块吊离后，还用木架支撑了门道顶后，险情排除了，发掘工作开始进行。

西耳室的发掘最为艰苦。发掘开始前，从过道口望进去，室内层层叠叠地堆满了器物，简直无从下手，这给发掘队员们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为此，发掘队就如何进入室内清理向队员征求良策。来自北京的白荣金师傅想出了一个低悬空作业的发掘方案。其方法是，首先，在前室用几个木屑包堆成一个高约0.5米的小堆，拿一把长竹梯放在上面，大的一端在前室，坐数人作砧码，另一端伸入西耳室，就像一架翘翘板。发掘队员沿着竹梯爬入室内进行实地观察，并在南北石墙的墙根下清理出两块没有放置器物的空地，用砖垒起两个短柱，在上面架一根厚枋木，搭成一个横跨耳室的支架。用同样的方法向里又搭起两个支架。在这三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在滑轨上用数块木板横铺成低空操作平台，发掘队员趴在平台上就可以清理器物了。这样，来回移动“滑轨”上的横木，平台就会来回移动，直到清理结束。

西耳室过道顶的石块断裂严重，也采取了支护措施。在清理过程中，对于像锈蚀严重，需要修复的铁铠甲、已经酥裂的大象牙等采取用木箱套取的办法，运回室内做进一步更细致的清理。此外，还采用了筛泥土的办法，目的是防止小件器物漏网。结果，对室内清理出来的泥土过筛了3遍，还真发现了封泥等小件文物。

西耳室发掘之辛苦，在发掘队员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羊城酷夏，气温已达到三十六七度，在强烈的碘钨灯下温度计已突破四十度。队员们趴在架上，双眼瞪着出土物，手握平头铲和小竹签认真挑剔清理。由于头部向下，不用多久，就大脑充血，汗流浹背了。这座深藏于山腹的古老陵墓，其所呈现的深邃、阴森、寂静完全被考古队的清理发掘及电影摄影机的响声所代替。最新式的Sony彩电摄像枪、尼康照像机和闪光灯等和古老的墓室、文物交织在一起，现代文明和古老文化融合在墓室，构成了我们考古队员奇特的工作和生活。（《象岗探秘》）

还有一位发掘队员在《南越王墓发掘手记》一文中这样写道：

谁要觉得考古很浪漫就该在这里呆几天，准确说是蹩几天或趴几天。因为工作面远低于蹲跪面，干一会儿就感到大脑充血，恨不能一头栽下去。电扇也解救不了狭小墓室里的潮湿闷热。摄影师们更受罪，碘钨灯一开，墙壁都烤得滋滋啦啦冒白气。我被拍过几个工作镜头，滋味确实不大美气，跟烤肉差不多。

主棺室

墓道、前室及东、西耳室发掘结束后，出土了不少精美的文物，令队员们兴奋不已。但他们心里都明白，重头戏还在后边，全墓的中心——主棺室还隔着一道石门，依然重复着千余年来同样的日日夜夜。试问，墓主听见外面吊车的轰鸣、人语的喧哗吗？您老人家可能早就想告别阴暗潮湿的地下冥宫了吧？等您走出了冥宫，昔日南越国的宫室苑囿，还能找得到吗？

面对紧闭的双扇石门，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了。主棺室“犹抱琵琶半遮面”，发掘队员是多么迫切地想揭去这最后一层神秘的面纱，看一看墓主的“卧室”是什么样子。可石门关闭紧密，不留一点缝隙。队员们为此，还真伤了不少脑筋呢！

技术人员尝试移开门前的一段石门槛，用力推石门，石门安然不动。又在门下用液压千斤顶，也未能移动分毫。怎样进入主棺室？为此，发掘队又专门开会研究，提出了打开石门，大揭顶和挖地道三种方案。大揭顶就是把后部尚未发掘的各室的顶盖石揭开，工作人员从室顶下去；挖地道的方法是从石门处向里挖一段地下坑道，工作人员由坑道爬入。究竟哪种方法可行，一时尚无定论。最后，发掘队决定从石门下挖一段仅容一人的小坑道，先派人入内探明情况后再定实施方案。

（1）初入主棺室

仅容一人的地下小坑道挖成后，我们仰躺在坑道中，两手攀扶着石门底，双腿蹬地，像《封神榜》里土行孙一样从地下遁入室内。

主室内一团漆黑，宁静得令人心惊。我们拧亮手电筒，像幽灵般爬起身。手电在幽暗的墓室失去了原来的光亮，变得十分黯淡，似萤火虫光一样。使这冥冥的地宫，在微弱的光柱下更加神秘莫测。室内跌落了不少垫石，使本来就不很大的主室更显得狭窄，一种幽禁感觉涌上心头，四壁像在向我们压了过来。这封闭了2000余年的主室，充满了潮湿腐朽的气味。阵阵阴风徐徐飘来，扑在我们身上，顿觉一阵阴冷，不寒而栗。我们倒吸了一口冷气，定了定神，才轻步进入室内。墓主的棺椁已经腐朽，6个安在外椁的大铜兽首衔环却仍然完好，东倒西歪躺在地下，双眼圆瞪，张牙露齿，在灯光的映照下，泛出道道令人心寒的绿光，恶狠狠地盯着2000年后从地下冒出的三个不速之客。在棺椁位置内，我们发现了许多玉器，还有宝剑箭镞等，室东部还有一座大型屏风的铜构件。而更多的器物，还掩盖在泥土和石块下。等待重见天日。

（2）移走石门

经过这次探查，了解到墓葬后部分为四室（主棺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室内部分大型器物暴露在外边；顶盖石虽多处有断裂现象，但一时还无坍塌的危险；石门与门楣石及门下的石砧已锈成一体，不除锈，石门不易打开。经过发掘队全体队员再次讨论，否定了大揭顶（顶石有断裂，若临时吊离，不利于日后原址保护）和挖地道（如地道过大，对墓室基础的安全有影响，如小则进出不便，大件器物也不易搬出）的方案，决定采取措施打开石门。

首先，技术人员尝试机械除锈，没有成功。用化学药物又担心损坏石门。故而要想打开石门，非采取非常手段不可。为此，还请来了广州市园林局打石工程队协助工作。打开石门的方法是，将西边石门下的砧石底部掏空，因这扇石门上轴处已有裂痕，石门在自身重量作用下逐渐下沉，待石门四边出现空位后，借手动葫芦顺利地把石门板吊离。

石门打开之前，技术人员已由经过加宽的坑道进入室内拍录资料，还取出了石门后面的部分器物，防止在打开石门的過程中损坏。石门打开后，队员们采用老办法，在主棺室搭成悬空工作平台，进行发掘清理。

（3）龙钮金印

随着清理工作的全面展开，各种精美的文物接连出土。在清理墓主身着

的玉衣时，先是出土了几枚玉印，如“赵昧”、“帝印”玉印，原来墓主名叫赵昧，确实当过皇帝。可墓主究竟是哪一位皇帝呢？

9月22日傍晚临收工时，一枚龙钮金印千寻万找始出来。

象岗汉墓的发掘高潮出现了。在墓主的左腹大玉壁上，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物件。一位队员细心地剔开旁边的泥土，轻轻地拂去灰尘，一条造型奇巧的金色小蟠龙立在四方台上，豁然跃入眼帘。明净铮亮，金光闪闪，耀人眼目。“啊！一枚龙钮金印！”他禁不住低声喊了出来。这一下子惊动了大家，十余双充满血丝疲惫的眼睛全都集中在龙钮金印上，一个性急的队员一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想翻转金印看看印文。但老麦却下令收工，等晚饭后先拍电影、录像、绘图，才能翻动它。

龙钮金印的发现，使大家对丰盛的晚餐都不感兴趣了。大家囫囵吞枣地吃完饭，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工地，“吱...吱...”响的摄影机声牵动着考古队员的思绪。碘钨灯下，印钮游龙引人注目，龙体矫健、盘尾昂首。这枚金印将是解决墓主身分，揭开墓主之谜的关键。好不容易拍摄、绘图完毕。两鬓发白的考古学家，轻步踏入主室，用小毛笔再次拂去金印的灰尘，细心地捧起金印，轻轻地放在手心，慢慢地翻转，“文帝行玺”——这名噪中外、绝世2000余年的镇墓之宝，就这样重见天日了。……赵昧——文帝——行玺，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墓主就是曾僭称为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一个重大的历史悬案解决了。至此，象岗汉墓主人的面纱已经揭开了。（《象岗探秘》）

（4）整取玉衣

主棺室发掘开始不久，就发现了一枚玉衣片，表明墓主身着玉衣敛服。由于玉衣片异常散乱，在墓内无法进行长期细致的清理。根据夏鼐先生的建议，为了保持玉衣出土的现状，发掘队决定将玉衣整取回室内进行进一步的清理。在器物（如玉衣、铠甲等）整取及去锈修复方面，考古研究所的技术方面属于全国之首。这次整取、修复玉衣、铠甲的任务就是由考古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承担的。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工作，需要精细入微的观察、判断，先进的机械、化学药物去锈手段以及科学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在玉衣整取的过程中，技术人员发明了“竹签插取套装”的方法。其操作步骤是：首先，在清理干净玉衣上贴附绵纸，分段打薄层石膏固定；然后，用薄竹签（长60—70、宽1.5-2，厚约0.2厘米）从玉衣两侧紧贴墓室地面逐根试探着慢慢密排插入（两边仅留签头），在竹签下面顺序插入薄木板，薄木板下又顺序插入铝合金薄板；再后，用预制好的大小合适的木箱边框套住玉衣，于玉衣上面再打上一层石膏，衬以木屑，钉上箱盖板，再在铝合金板下插入数条木板托底，用铁丝将木板与顶盖固定拧紧，集中人力迅速翻转木箱；最后，逐层撤去原先用于托底的木板、铝板、薄木板和竹签，将玉衣下面整理垫平，用木板封钉箱底，再将木箱翻转成正面朝上，于箱上标明玉衣头向及各边方位。至此，整取工作基本结束。

当装着墓主人——第二代南越王赵昧的大木箱被考古队员抬出墓室时，负责整取工作的白荣金师傅诙谐地说：“这是考古队给老赵‘倒出殡’了。”这真是最形象贴切的比喻。至此，主棺室的发掘清理工作结束了。

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这三室的发掘同时进行。发掘工作至此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侧室的清理步骤是：从上而下、由表及里、先易后难、保留重点。东、西侧室都发

现了人殉遗骸，在进行技术性加固后原地保留。后藏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不少是烹调用的炊具。

今天，分别负责清理左、右侧室（即东、西侧室）的两个组也传来捷音。左侧室的几个殉葬人身边，发现了铭刻着“左夫人”、“右夫人”、“泰夫人”等字样的印章，原来是藏娇之室。右侧室则出了“厨丞之印”。“食”与“色”，完全对称。但真正好吃的东西都在后藏室。……有两个炭炉说不定是烤什么肉的，还有一小罐雀骨呢。

发掘工作全部结束了。

空空的墓室，又变得静静的了。不过不久的将来，它又将会热闹起来。（以上引文均出自《南越王墓发掘手记》）

小结

考古发掘大体上可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形式。所谓主动发掘，是指考古工作者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通过实地踏查、钻探等考古手段选定某一地点，进行有计划、分阶段的非常细致的发掘。主动发掘的目的都很明确，就是希望对某一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有所帮助。例如，位于北京市昌平县的明代十三陵之一的定陵（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的发掘，就属于主动发掘。发掘工作由夏鼐主持，发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出土一些文献记载外的新鲜的考古资料，以利于对明代历史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历史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文献资料，文献资料是有限的，当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时，就可能出现停步不前的局面。这时，如果有新的资料发现，研究工作就可能向前推进。新资料的获得往往求助于考古发掘，发掘定陵的目的大概就在于此吧。

主动发掘并不追求以出土大量的文物来制造轰动效应。因为发掘的目的是要解决一定的学术课题，所以发掘的规模不一定太大，出土的文物有时也够不上多么精美。也就是说，虽然发掘的收获很大，但发掘本身并不一定很出名。

所谓被动的发掘，是指配合国家基本建设的发掘。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各种工程不断上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古代文化遗迹，这时就需要由考古部门来发掘清理。例如，50年代，我国在河南三门峡一带大规模兴修黄河大水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联合组成了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黄河库区进行长时间的发掘工作，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又如现在，为了配合正在加紧进行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国家也成立了专门的考古机构，组织中央与地方考古力量进行长期有计划的发掘。被动发掘大多都是碰到什么挖什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有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正是在偶然之中诞生的。

闻名于世，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是在社员打井时首先发现的。如果这位有幸被载入考古史册的人民公社社员不在此地打井，或者将井打在没有陶俑分布的地方，这些身着铠甲，表情威严，排列整齐有序的大型兵马俑们可能仍沉睡在厚厚的黄土层下。

著名的西汉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大葆台汉墓、北洞山汉墓以及商丘永城梁王陵群，都是在基建部门的机械轰鸣声，甚至是在炸山开石的炮声中苏醒过来的。这些规模巨大的王、侯陵墓一旦苏醒过来，均不同程度地震惊了世人，成为重大的考古发现。南越王墓的发现同样具有偶然性、突然性，同样成为重大的考古发现。

全墓的发掘，既充满了探险的神圣，又饱含着追求未知的热情，同时还洋溢着掘取宝藏的快乐和激动。当发掘队员们手捧一件件国宝，抚摸着、欣赏着，炎炎夏日的辛苦、疲劳在兴奋中随着欢声笑语飘散了。

全墓的发掘圆满结束了，可队员们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

最初的报道

南越王墓发掘结束后，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有关这次重大考古发现的专题电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以及《人民画报》、《广东画报》等报刊都刊载了图文并茂的消息或整版的专题报道，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关注。

《人民日报》在 1983 年 11 月 11 日第三版以《我国考古发掘又一重大收获——广州发现西汉南越王墓》为标题进行了报道。文中称此墓：

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期间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索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这座墓葬发掘以后，有关单位拟就地筹建博物馆加以永久保护，供国内外学者和人民群众参观。

全国考古界权威杂志——《考古》在 1983 年第 12 期以基本相同的标题刊登了一篇报道。文中说：

象岗南越王墓是岭南目前已知的最大的石室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墓中出土 19 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有金印、包金铜印、玉印、象牙印、玛瑙印等多种。其中在墓主身上发现 9 枚，最大的一枚呈龙钮金印，文曰“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值得注意的是，除墓主遗骸以外，在墓道、前室、左耳室、后左室、后右室中还发现十多具殉葬人的遗痕。从同出的印章、封泥、随葬遗物以及残存的骸骨牙齿推测，他们的身分应是墓主生前的姬妾、侍御和杂役徒隶。说明南越国上层统治者流行殉葬习俗。

1984 年第 8 期《人民画报》以《岭南考古的重大发现——南越王墓重见天日》为标题，进行了图文并茂的报道。文中称：

象岗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岭南地区的开发、广州早期城市发展与对外交通贸易，都有极为重要的科研价值。文物部门已决定申请将南越王墓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篇报道附有墓葬平面图和多幅精美的彩色、黑白图版，首次以图片的形式公布了墓中出土的部分珍宝，如“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六山纹铜镜、大型鎏金铜铺首、凤纹牌形玉饰、玉龙金钩佩饰、角形玉杯（以上是彩版）、大铜钁、铜勾鐎（diào）、透雕龙凤纹重环佩、兽首衔璧玉佩、玉剑首、剑格、剑珌、“长乐宫器”陶鼎（以上是黑白版）等。通过新闻媒介的广泛报道，象岗这个沉默已久的名字突然间又中外闻名了。人们在鉴赏墓中出土珍宝的同时，也在体味这戏剧性的发现带给我们的启示。

资料整理，出版报告

发掘工作结束后，并不等于全部的工作都结束了。实际上，发掘工作只是考古工作的第一期工程，更为繁重的整理研究工作随着田野工作的结束，全面铺开了。

南越王墓资料的整理工作是参加发掘的部分队员承担的。在初步整理的基础上，在《考古》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一文，简单地报道了这次发掘的主要收获。随后，开始了长期细致的整理研究工作。

器物的整理是从清扫、去锈，修复加固开始的。然后是绘制线图、拍摄照片，最后要写出文字稿。

陶器、玉器经过清扫后，破碎的要进行拼对粘接。铜器、铁器等金属器须经精心的去锈加固后才能修复。玉衣、铁铠甲和几件锈蚀残破较甚的大型铜器由考古研究所技术室的专家负责修复；带托铜镜等几件镶嵌工艺的铜器和屏风由广州市的专家负责修复。

有的器物还要进行分析鉴定。其中玉器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铜器、银器、铅器和铁器由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玻璃器由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测试中心，纸片由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科学研究所，墓主遗骸由考古研究所，殉人遗骸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动物遗骸由中山大学地质系和广州市文管会，药物由广州市药品检验所中药室，丝织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象岗岩石由广东省地质测试研究中心，建筑石料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质新技术研究所的先生们分别负责分析、测试、鉴定。鉴定是研究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必不可少的科学手段。

经过10多位专家学者六七年的辛勤努力，南越王墓的资料整理工作终于完成了。自1983年8月25日正式发掘南越王墓起，到1991年10月出版大型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历时8年多。《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是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的重点研究课题，其经费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报告分上、下两册，16开本。上册系文字部分，共530页，由前言、12个章节（墓葬位置与墓葬形制；墓道与外藏椁；前室；东耳室；西耳室；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后藏室；出土文字资料汇考；墓主和年代；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8篇附录（多是鉴定报告）、器物登记总表和后记等部分内容组成，详尽介绍了南越王墓发现、发掘经过、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另外，书前还附有英文提要，书中附表34幅，附图266张。下册系图版部分，共有图版277页，其中彩色图版有31页，黑白图版246页。

南越王墓的形制

汉代封建贵族大墓的形制，一般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地上部分包括高大的封土、围绕封土的陵园以及祠庙等。皇帝陵附近还建有宏大的寝园和庙园。地下部分包括墓道、耳室、墓室和侧室等。下面分别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来简单介绍一下诸侯王墓（附带介绍列侯墓）形制的一些特点。因为对比的需要，还简单介绍一些西汉皇帝陵的情况。

西汉帝陵的地面建制

西汉共有 11 座皇帝陵，除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西安市东部的白鹿原和杜东原外，其它 9 座都分布在咸阳原上。西汉帝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基本相同。以宣帝杜陵为例，高大的封土堆呈覆斗形（所谓覆斗形，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意即将斗覆置，下大上小，顶部和底部都呈方形），封土下部和上部都呈方形，边长分别为 175 米与 50 米，高 29 米。封土周围夯筑围墙，称作陵园。杜陵陵园平面方形，边长 430 米，墙基宽 8 米。陵园四面墙垣正中各开辟一门。

杜陵园东南是杜陵寝园，四周筑围墙，平面呈长方形，长 173.8 米，宽 120 米，在东、西、南 3 面开门。寝园内有大型殿址，文献上称为寝殿和便殿。寝殿和便殿都是祭祀死者的场所，其中寝殿要“日上四食”，天天如此，就像皇帝还活着一样伺候。

帝陵附近的建筑，除了寝园外，还有庙园。庙园的中心是陵庙，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四面各开一门，陵庙也是举行祭祀的场所，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频繁的祭祀。

王陵的地面建制

汉代坟墓能称“陵”者（“陵”，意为高大的土山），其墓主身分除皇帝、皇后、太上皇外，还有诸侯王、王后等。《后汉书·礼仪志》中就称诸侯王墓为“陵”。1970年发掘的山东曲阜九龙山3号墓，系葬于西汉中期的鲁王或王后墓，在此墓道内填塞的大石块上，发现有“王陵塞石广四尺”的刻铭，也说明当时确实称诸侯王墓为“王陵”。

王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包括高大的坟丘、围绕坟丘的坟垣以及祠庙等。

坟丘

汉代坟丘的高度与墓主的身分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帝陵：

坟高二丈（约合今28.8米），武帝坟高二十丈（约合今48米）。

《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曰：

汉律列侯坟高四丈（约合今9.6米），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从这段文献记载可以看到，汉代坟丘的高度由当时的法律予以规定，是非常严格的。文献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有人死后，其家人将死者的坟丘修建得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高度，结果，有的人被削去了官职，有的人不得不将坟丘高度削低以符合当时的礼制。

遗憾的是，文献中没有记载法律规定王陵该有多高。从现知的考古资料来看，王陵的高度介于帝陵和列侯墓之间。如河北定县43号中山王陵高12米，江苏邗江甘泉山2号广陵王陵高13米，河北石家庄北小沿村赵王陵高15米，定县40号中山王陵高16米，定县北庄中山王陵高16米，山东临淄齐王陵高24米。王陵坟丘底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与帝陵覆斗形封土有别。坟丘是用黄土一层层夯打起来的，夯打用的黄土，一部分是挖墓穴时取出的，一部分则要从其它地方运来。由此可见建筑王陵的工程是浩大的。

诸侯王陵除采用竖穴土坑墓外，还常采用一种崖洞墓。崖洞墓一般开凿在高大山体中，墓上就是高峻的山顶。山顶高耸，正如同巨大的封土堆一样，故一般不用再以黄土夯筑封土。徐州北洞山楚王陵开凿在一座海拔54米的石灰岩山体中，筑陵者觉其不崇，又在山顶上夯起高大的封土堆。另外，河南商丘永城梁王陵区已发现的数座崖洞墓，如夫子山1号墓、南山墓、黄土山墓、西黄土山墓等，它们所在山体的顶部也都夯筑有10米以上的封土，其中黄土山墓的封土呈马鞍形，夫子山1号墓封土呈覆斗形。王陵中见于报告的覆斗形封土在潼关以东只此一例。王陵采用覆斗形封土可能仿自帝陵，或是得自皇帝特殊的恩赐。

南越王墓是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露出开口的，发现时，象岗已被下挖了17米多，墓坑的开口情况已不可知，封土情况就更不清楚了。类似于南越王在岩石上建造竖穴墓室的，还有湖南长沙象鼻嘴1号墓、陡壁山汉墓以及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红土山汉墓在发掘前仍保存有高出岩石面约10.2米的封土堆。建于岩石山丘上的竖穴墓，或于其上再筑封土，或不筑封土。

如前所述，南越王葬所非常隐秘。孙权派数千兵士南下岭南寻找赵佗等南越王陵墓，欲掘冢盗取墓中财宝，结果只找到了三王赵婴齐墓，盗走了墓中的玉玺、金印和宝剑等珍品。这些记载从侧面说明，南越王陵在岩石小山（亦即象岗）上没有再夯筑封土，否则，如此明显的地面标志，数千人遍地搜寻，不会不被发现的。

坟垣

如同帝陵一样，王陵坟丘四周也建筑有围墙，称“垣”。

其中，建造于平坦地面上的王陵，坟垣多用黄土夯筑而成，如定县 40 号墓坟丘周围原来就夯筑有坟垣，因历年取土破坏，到 1973 年，坟垣被挖平不存了。经考古钻探（用半圆形探铲向地下提取土样，根据土质、土色的变化判定是否夯土），坟垣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45 米、东西宽 127 米，墙基宽约 11 米。这应该是建于平原的王陵坟垣的一般形制。

建于山体之中的崖洞墓，坟垣一般位于山体顶部较平坦的地方。徐州石桥楚王陵所在山体的顶部，有南北长 60 米、东西宽 30 米比较平坦的地面，周围发现有断续的石墙遗存，这些石墙就是楚王陵坟垣的残余。建在较小山丘之中的王陵，也有以黄土夯筑坟垣的，如商丘永城保安山和柿园梁王陵的外围地区，发现有断断续续的夯土围墙坟垣。总之，不管是黄土筑成的坟垣，还是石头砌成的坟垣，作用是一致的，就像诸侯王生前居住的王宫周围有宫墙一样，王陵四周的坟垣，实际上就是对王宫宫堵的模拟，是诸侯王丧葬礼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

坟垣不可能是封闭的，否则人们无法来到陵前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所以，坟垣四周应辟有门。至于王陵坟垣四周辟有几门，今已无文献可考，考古资料中也缺乏有力的证据。因为坟垣是王宫宫墙的模拟，或者是仿自皇帝陵园，所以，推测其四面各开一门，共有四门比较合适。另外，帝陵园四门外筑有“阙”的建筑，王陵坟垣门外也有。《水经注·汶水篇》记载：

凌沟水侧有东平宪王苍冢，碑、阙存焉。文献记载，王陵坟垣外大道（神道）两侧还立有石虎、石马等石兽，因时代久远，今地面无存。位于陕西省兴平县茂陵（汉武帝陵）附近的霍去病墓，至今在墓前仍保存有一批石雕作品，计有象、牛、马、鱼、猪、虎、羊、“怪兽食羊”、“人与熊斗”和“马踏匈奴”等 16 件。这批石雕作品，利用石料的天然形状，稍加雕刻，就传神地表现出动物的各种形态和气质，雕法简洁，表现力却很丰富，颇具粗犷、古拙之美，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石雕精品。

其它

像帝陵附近散布有众多的陪葬墓一样，王陵也拥有数量不等的陪葬墓。陪葬王陵的多是诸侯王生前的近臣，他们生前效忠主人，死后也被赐葬在主人的身边。满城中山王陵附近的山坡上，分布有 18 座陪葬墓，坟丘上圆下方，长、宽各 10—20 米，残高 3—5 米。南越王墓所在的象岗，经过普遍的钻探，没有发现陪葬墓。

如同帝陵设置有陵邑，王陵附近也设有陵邑。满城中山

王陵附近今有守陵村，推测汉代在王陵旁边置有陵邑，用来守护、维修王陵上的建筑。

王陵的形制

汉代的诸侯王陵，迄今已发掘了 30 多座，分布在北京、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南和广东等地。王陵的这种分布状况是与汉代在这些地区分封诸侯王的情况相一致的。诸侯王除了死在京师就地埋葬外，一般都葬在其封国之内。

王陵形制分类、演变

汉代王陵依据建造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竖穴与崖洞两大类。竖穴墓是在地面向下挖掘平面呈长方形的墓圹（kuàng），然后放置棺椁和随葬品，最后填土夯实。墓圹的一端带一条墓道，也有两端各带一条墓道的。崖洞墓是在山脚或山半腰较平坦的地方开凿露天墓道，再于墓道底部向山体中开凿出洞室而成。崖洞墓一般由墓道、墓门、耳室、墓室、侧室组成。不管是竖穴墓还是崖洞墓，墓的规模都是巨大的。修建如此巨大的陵墓，需要化费很长的时间，因此，诸侯王活着时就要动工修建自己的陵墓，文献中称这是“豫作寿冢”。

竖穴墓依墓室用材和修造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木椁墓、“黄肠题凑”墓和砖室墓。

木椁墓是指在竖穴墓圹底部以木板构筑椁室的墓。椁室一般由底板、四壁板和盖板组成，底板与四壁板之间用榫卯连接。

“黄肠题凑”墓是指在竖穴墓圹底部用枋木（横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木）一层层叠置起来，围成椁室，因枋木一头向着椁内，称“题凑”，所用枋木多为柏木，柏木心呈黄色，故称“黄肠”。“黄肠题凑”本是皇帝使用的葬具，诸侯王使用“黄肠题凑”葬具，应是得自皇帝的恩赐。

砖室墓是在竖穴墓圹内用砖（有的墓兼用少量石材）券筑墓室，就像地宫一样，其平面形制与崖洞墓相似。砖室墓一般由斜坡墓道、墓门、甬道、耳室、墓室和侧室组成。

自高祖刘邦建汉（公元前 202 年），到献帝刘协失汉（220 年），若将王莽新政权存在的 16 年计算在内，两汉（西汉和东汉，也称前汉和后汉）前后共存在了 422 年。西汉早期（高祖——景帝），王陵兼用竖穴墓和崖洞墓，竖穴墓中以“黄肠题凑”墓居多，崖洞墓刚刚出现。西汉中晚期（武帝——王莽），竖穴木椁墓和“黄肠题凑”墓继续使用，崖洞墓非常流行、数量大增。东汉时期，木椁墓不用了，“黄肠题凑”墓被“石题凑”（用石材代替木材筑砌椁室）墓代替，崖洞墓被砖室墓代替。砖室墓成为最主要的一种墓葬形制。

南越王墓的形制

如上所述，王陵在西汉早期多采用竖穴墓，西汉中晚期崖洞墓颇为流行，逐渐成为王陵形制的主流。象岗汉墓系南越国二主赵昧的陵墓，下葬于武帝时，当西汉中期。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南越王陵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但它采用的却是以竖穴墓的形制为主、兼用崖洞墓的形制，是一座形制独特的陵墓。

象岗在西汉时期，处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属于都城的近郊。赵昧选择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于国都附近的时代风尚。象岗山的原生岩为石英砂岩，在大自然的风雨侵蚀下，原生石英砂岩逐渐风化成砂质粘土。南越王选中这里建造陵寝，想必本意是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崖洞墓。但环境

不由人，风化特甚的象岗，其强度已降低到土状，使用普通的镐、铲即可开挖，是无法凿成坚固的崖洞的。因此，它从总体规划上采用了竖穴墓的形式。墓葬的修建次序是：先在象岗顶部风水好又便于造墓的比较平坦的地方，规划出墓口的平面形状、尺寸（现坑口南北 10.85 米、东西 12.5 米），然后向下挖掘，到一定深度（约 20 米）停止，在竖穴岩坑底部南端两侧横向掏洞成东、西耳室，在岩坑北部建造前室、主棺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南越王墓平面呈“凸”字形，自南而北由墓道、前室、东、西耳室、主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共 7 室组成。7 室相互连通，前室与墓道、主棺室与前室各设石门，其余各室间均设置有木门。从后藏室北墙至前室石门，南北全长 10.68 米；从东耳室东端到西耳室西端，东西宽 12.24 米。墓室总面积 100 平方米。7 个墓室全部用略经加工的石材 750 余块砌筑而成。据广州地质部门鉴定，构筑墓室所用的石材，并不是就近取自象岗，而大多是从广州以东 20 海里远的番禺县莲花山（海拔 100 米左右）开采，经水路用木船运抵象岗。还有一部分石材是从广州北郊的飞鹅岭开采下来的。750 余块石材，最大的重约 2.6 吨，全部采自远距离的地方，还要运到象岗，凿打加工，可见陵墓的修建是何等艰巨！

（1）墓道

位于墓室之南，方向 177 度（南偏东 3 度），平面呈狭长形，现存墓道口水平长 10.46 米、宽约 2.5 米、距现地表 3.22 米。墓道底部分前后两部分，由墓门往南 4.12 米这一段是一个长方形平底的竖坑，在此用木板建有放置器物的“外藏椁”，由外藏椁往南有两个小台阶，再往南呈斜坡状，坡斜 22 度，现存坡水平长 6.45 米。墓道填土均经夯实，其中还夹有两层大石块，主要用于防盗。

我国古代墓葬的防盗设施，内容是很丰富的。比如在墓圻内棺椁外堆积石块、木炭、白膏泥等都能起到防盗的作用。“黄肠题凑”墓中的枋木围墙同样起到了防盗作用。试想，当盗墓者遇到一根根柏木垒起来的厚木墙时，如果没有锋利的工具，也会束手无策、半途而废的。不过，从已经发掘的“黄肠题凑”墓来看，几乎都被盗掘过，可见盗墓者是何等利害。崖洞墓在防盗上更是下了一番工夫。首先是墓道口，这是第一道防线。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的墓道口用土坯和砖砌筑，还用铁水浇灌加固，形成一道铁墙。其次是墓道。崖洞墓一般都有较长的墓道，墓道内多用大小石块填塞。徐州楚王陵道内放置的石块，经过精细的加工，一块一块叠放于墓道内。再次是墓门。墓门一般都是石门，门后设置顶门器。当安葬了死者，关闭石门后，门后的顶门器就会自动翘起顶住石门，人在外面无法将门推开。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管造墓者多么挖空心思，设置一道道防盗的屏障，终难逃脱珍宝散尽、暴尸旷野的厄运。也难怪，诸侯王的葬礼多么气派。他们活着时就开始大规模营建陵墓，死后身着锦袍，外套玉衣，大车小车的珍宝运往陵内。下葬那天，一路上吹吹打打，国人谁不知、谁不晓？待下葬后，有好事者不费吹灰之力即可找到墓道口，盗走陵内珍宝。现已发掘的数十座王陵，除满城和象岗两处幸免于盗外，大都被盗掘一空。这两座王陵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可能是因为秘密下葬，无人知晓的缘故。

同样，秦汉帝陵追求厚葬，无一能逃脱被盗的命运。秦二世虽然将数以万计的造陵工匠杀埋陵内，秦始皇陵还是多次引来盗墓人。由此看来，防盗之策还在于薄葬。

（2）前室

前室居于墓的前部正中，呈狭长方形，南北长 3.1 米，东西宽 1.84 米、高 2.14 米。南面是墓门，北面是主棺室石门，左右两侧与东西耳室连通。前室周壁、室顶及南北两道石门上都彩绘有朱、墨两色的云纹图案。前室出土的两套石砚和西耳室出土的墨丸就是绘制壁画后留下的工具和颜料。

壁画是绘制于墙壁上用于装饰的绘画。在秦咸阳宫和西汉长安城宫殿遗址的发掘中，都发现有壁画残片。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的墓葬中，有在墓室壁上绘制壁画的，称壁画墓。壁画墓流行于东汉时期。西汉晚期的壁画墓发现很少，且都是小型墓，壁画内容以天象和神话故事为主，也有少量历史故事和庄园（如房屋、人物、车马等）、农耕（牛耕、耒播等）的内容。在属于西汉中期的大型王、侯陵墓内，很少发现壁画，所以，南越王墓发现的壁画，是西汉中期十分珍贵的绘画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壁画艺术史有重要的价值。

（3）东西耳室

东耳室位于前室东侧，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5.24 米、宽 1.75 米、高 1.83 米，西面有一个过道与前室相通，中间设有木门，已朽。

西耳室位于前室西侧，与东耳室相对，亦呈东西长方形，长 4.13 米、宽 1.75 米、高 1.82 米，东端有一个过道与前室相通，中间设有木门，已朽。

（4）主棺室

呈南北长方形，长 4.84 米、宽 1.84 米、高 2.3 米。前与前室以石门相隔，左右后三面有过道与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连通。

（5）东西侧室和后藏室

东侧室位于主棺室东边，长 6.95 米、宽 1.61 米、高 2.24 米。中部有一过道与主棺室相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西侧室位于主棺室西边，与东侧室对称。长 7 米、宽 1.62 米，有一门道与主棺室连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后藏室位于主棺室之北，东西宽 1.8 米，南北长 2 米。有一门道与主棺室相通，中间设木门，已朽。

王、侯陵墓的“正藏”与“外藏椁”

汉代王陵，不管是竖穴椁墓、“黄肠题凑”墓，还是崖洞墓、砖室墓，都有多个墓室。像死者生前居住的宫室、宅第内有寝室、客厅、车库、储藏室、厨房等不同功用的多个房间一样，王陵各个墓室所象征的用途也是不同的。《汉书·霍光传》中有这样的记载，说霍光死后，宣帝赐给他金钱、繒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筐，壁珠玕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枳木外藏椁 15 具等用作葬具和随葬品。由这段文献记载可知，汉代贵族大墓中有一部分称作“外藏椁”。何为“外藏椁”呢？《汉书》注是这样解释的：

（外藏椁）在正藏外，婢妾藏也。或曰厨廐之属也。

可知，汉代贵族大墓由“正藏”和“外藏椁”两部分组成，“外藏椁”在“正藏”之外，用于安葬婢妾（汉代一般用陶、木俑代替）和储藏厨房、车马用品。

所谓正藏，其中心应是盛放墓主尸体的棺或套棺，棺外置单层或多层椁。由棺椁组成的多重封闭的空间即为正藏。外藏椁在正藏外，应是正藏的附属部分。

下面分别就“黄肠题凑”墓、木椁墓、崖洞墓和砖室墓来说明它们各自的正藏和外藏椁。

“黄肠题凑”墓

到目前为止，经过考古发掘的“黄肠题凑”墓共有 6 座，墓主身分都是诸侯王或王后。它们分别是石家庄北郊小沿村赵景王张耳墓（公元前 202 年）、长沙象鼻嘴 1 号长沙王墓（文景时期）、长沙陡壁山长沙王后曹嬃墓（文景时期）、北京大葆台 1 号广阳王刘建墓（公元前 45 年）、大葆台 2 号广阳王后墓（元帝）、江苏高邮天山 1 号广陵王或王后墓（西汉晚期）。

在“黄肠题凑”墓中，题凑实际上也是一层椁室，只是它的结构与一般椁室不同罢了。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孟冬记》中的“题凑之室”时说：

室，椁藏也；题凑，复垒也。题凑与其内的棺椁构成了完整、封闭、多重的空间，这就是正藏。题凑外部分相对独立于题凑内的正藏，应是外藏椁。

《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受赐：

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枳木外藏椁十五具。

刘敞补充如淳的注曰：

以次言之，先亲身者衣被，次梓宫，次便房，次题凑，次外藏。

说明在“黄肠题凑”墓中，题凑是区分正藏与外藏椁的界墙。

长沙象鼻嘴 1 号和陡壁山汉墓只有正藏，没有外藏椁。北京大葆台 1 号和高邮天山 1 号墓在题凑外分别设置了二层和一层外回廊，天山 1 号墓的外回廊内还分隔成若干间小室。这两座墓的外回廊就是外藏椁。另外，大葆台 1 号墓墓道内还有一个车马坑，它位于题凑之外，无疑也属于外藏椁。

竖穴木椁墓

汉代的竖穴木椁墓是继承前代的一种墓葬形制，在汉代以前是墓葬形制的主流。这里分两种基本形式来说明正藏与外藏椁的情况。一种形式以马王堆 1 号墓为代表，另一种以咸阳杨家湾 4 号墓为代表。马王堆 1 号墓有棺有椁，棺椁构成了一个多重、封闭的空间，包括棺室、头箱、边箱和足箱；杨家湾 4 号墓在棺椁构成的封闭空间外，在墓坑、墓道里设置有 5 个独立的器物室，在墓坑外还设置了 13 个器物坑。这两种墓葬形式的明显区别在于，由

棺椁组成的封闭空间外有没有另外设置的器物坑。这里，我们将类似马王堆 1 号墓的墓，视为只有正藏的墓，而类似杨家湾 4 号墓的墓，视为在正藏外又设置了数量不等的外藏椁（即器物坑）的墓。类似杨家湾 4 号墓设置有外藏椁的还有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只发掘了墓外的 5 个器物坑，都应属于外藏椁）和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墓道内埋有车马，应是外藏椁）。

崖洞墓和砖室墓

砖室墓的建造方法虽然属于竖穴墓系统，但其墓室空间与布局结构与崖洞墓相似。因此，这里将砖室墓与崖洞墓放在一处，讨论它们正藏与外藏椁的情况。崖洞墓和砖室墓一般有 1—3 个主要墓室，一般后室（单室墓只有一个主要墓室）放置墓主棺椁，中室（二室墓的前室）陈列祭奠用品，前室、侧室和耳室用于放置食物、车马和偶人。以满城 1 号墓为例，前室（原报告称中室）放置祭奠品，后室（原报告称主室）置墓主棺椁，两个耳室位于甬道两侧，专门陈放车马和食品。显而易见，用于祭奠的前室和放置棺椁的后室以及与后室相连的侧室等相互连通，又关系密切，应视为正藏部分，而前、后二室之外的墓室及耳室位于正藏外，应视为外藏椁。例如，曲阜九龙山 3 号墓，后室（带一壁龛）与前室（带有 4 个侧室）是正藏，位于墓道和甬道两侧的两个耳室为外藏椁。又如睢宁九女墩汉墓（三室砖墓）的中室和后室应为正藏，前室及其两侧的耳室应为外藏椁。

南越王墓的正藏与外藏椁

南越王墓属于竖穴与崖洞相结合的形制。不过，即使是在竖穴墓圻内，墓室也是以石块筑砌起来的洞室，墓的平面、立体形制与崖洞墓相同。所以，它应该属于“凿山为藏”的崖洞墓。

墓内主棺室主要用来安置墓主的棺椁，此外，还放置有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墓主的棺椁位于室的正中部，它的四周分置随葬物品。靠贴东墙置一漆木屏风，堵住了主棺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口；棺椁西边靠西墙下放置兵器，计有铁剑、铁矛、铁戟、铜戈、铜弩机、箭镞、铅弹丸等；在椁的周围散布有众多的明器车饰；棺椁南边放置有陶甗和象牙筒；棺椁北边放置有铜盆、漆盆、铁矛和著名的铜承盘高足玉杯。有趣的是，两件铁矛置于通往后藏室的门道口处，可能有防卫之意。

墓内东侧室是从殉夫人的葬所，随葬品主要是分属于她们的组玉佩、玺印和日用器皿。从出土的 4 枚“夫人”印章可知，室内共放置的殉人 4 具。其中左夫人位于室内南部靠近过道处；右夫人居室内北部靠近过道处；部夫人在右夫人东侧；泰夫人在左夫人东侧。室内出土的日用器皿计有银匜、带钩，铜提筒、釜、盆、匜（yí）、熏炉、带钩、牌饰、镜，铁削、刮刀、镊，陶瓮、罐、鼎、盒、壶、甗、盆、釜甗，漆博局、案以及玻璃牌饰等。四夫人都有较多的随葬品，有的随葬品还很精美（如组玉佩、印章、铜器等），说明她们的身分很高，肯定不是普通的婢妾，可能是南越王后宫中的嫔妃。

墓内西侧室发现 7 具殉人，均无棺，直接放置在铺地木板上，随葬品多是镜、带钩、小玉饰等小件物品。经鉴定，其中 6 名为青、壮年女性，其生前身分可能是墓主的奴仆或贴身内侍；只有 1 名是 40 岁左右的中年女性，随葬品也较多（铜镜、熏炉、铜框玉卮、陶熏炉、小玉环、小玉璜等），且有一颗无字小玉印，她的身分应为奴仆之首。室内出土的其它器物还有铜盆、匜、勺，铁削、鱼钩，陶瓮、罐、壁，漆盘、盒等。

墓内后藏室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器物。器物大小相套，分类放置，大型器

物多堆放在后藏室前部，中小型器物叠置于室内中后部，有的器物整齐地排放在木架之上。器物表面多用丝织品或草编织物包裹、捆扎。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盥洗器为主，130余件器物中约有30多件内装家禽、家畜和海产品。还发现不少“泰官”封泥，说明后藏室的随葬器物经过泰官令署（掌管南越王饮食的官署）的检封。此外，室内还出土有烧煮食物用的燃料——木炭。以上情况表明，后藏室是储藏食物、放置炊器与储容器的库藏。室内出土器物计有铜鼎、姜礫（c）、勺、釜、釜甗、煎炉、烤炉、提筒、香炉、蒜头瓶、鉴、匱、盆、匱、灯、铎，铁鼎、三足架、叉，陶瓮、罐、甗（bù）、鼎、三足盒等。

墓内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室中靠西边放置漆木车模型1辆，木车已朽，铜车构件散落满地；东侧为一殉人的棺具，棺内随葬有铁刮刀、环首刀、玉璧、环、璜、铜镜和铜印等物品。铜印文为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说明这里的殉人生前曾任南越国的“景巷令”（詹事的属官，职掌王室家事）。此外，前室还出土了二套石砚（砚台和小研石），砚台和研石上都粘着一层黑中泛红的墨迹，与前室周壁及顶部朱墨绘云纹的墨色一致。石砚应是绘制前室壁画后遗下的实用器。

墓内东耳室随葬品非常丰富。室内整齐地陈放有多套铜、石、漆木质乐器（铜钮钟、甬钟、勾匱、石编磬、漆木瑟、琴等）和各种青铜器（如提筒、壶、钫、甗、熏炉、镜、带钩、戈等），其中酒器甚多。另外还有陶器（匏、壶、甗、罐、盒、钵等）、铁器和漆木器。少数铜器、陶器内装有动物骨骸。室内近门道处放置1具殉人，无棺，有玉环、玉璜、铜镜等随葬品。从出土物品多为宴乐用具来看，东耳室应是南越王的宴乐之所，室内的殉人似为敲击钟磬的乐伎（殉人北边分布有铜编钟石编磬）。不难想象这样的宴乐场面：墓主生前在大臣的陪伴、美姬的簇拥下，一边饮酒，一边观看美女在音乐的伴奏声中翩翩起舞。

墓内西耳室放满了各种各样的随葬品，从发掘的情况看，可分为三层，层层相互叠压。大部分器物上残留有丝织品裹缠的痕迹，有的多达2层。器物分门别类地被放置于竹筥、蒲包、木匣或木箱内，计有大量的铜器、铁器、玉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以及少量的金银器、玻璃器、象牙器、皮甲、药材、五色药石等。其中铜器又可分为容器（壶、提筒）、炊具（鼎、釜、烤炉）、食具（勺、姜礫）、水器（匱、鍬、盆）、兵器（剑、镞）、乐器（铎）、工具（锯、锥、印花凸版）、杂器（杵、臼、熏炉、镜、虎节）和车马器（銜、镳），共600余件；铁器计有锤、镞、斧、凿、镰、铲、削、刻刀、锉刀、刮刀、弯刀、劈刀、铲刀、环首刀、服刀、钎、锥、刮刨、杵、针、铠甲等600余件；玉石器计有玉璧、璜、环、舞人、剑饰、印章、石砚、斧、猪等70余件；陶器计有鼎、罐、匏壶、甗、提筒、小盒等600余件；漆器多朽残，能辨认器形的有箱、盒、奩、盆、盘、卮、耳杯、金座漆杯、匱等30余件；丝织品有的用于包裹各种器物，有的整匹盛于竹筥中随葬，数量惊人，品种齐全。西耳室遍地都是器物，几无立足之地，应是专门存放各种物品的库房。

墓道北端筑置有一个长方形木椁室，室内东侧靠南放置一殉人的棺具，其余的地方布满随葬器物，其中有漆木车模型、大陶瓮、车饰和仪仗饰。另外，在墓道起斜处靠近东壁的地方，埋有殉人，有棺、随葬品有铜镜、带钩、鎏金铜牌饰、陶鼎、钵、罐、小盒、匏壶、碗等。

从以上详细描述各墓室随葬品（包括殉人）的情况，不难看出墓室各不相同的功用，以及各室之间的相互关系。借此也可以分析哪些墓室属于正藏，哪些墓室属于外藏椁。

如上所述，主棺室是墓葬的中心，用来安放墓主的棺槨；东侧室是墓主嫔妃的葬所；西侧室是墓主贴身侍女的“居室”；后藏室是象征烹制食品的厨房和放置器具的储藏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与主棺室之间均设置有木门。木门并不是阻止入内的障碍，实际上它们与主棺室是相互通连的（木门可以开启），这从墓葬的平面图上看得很清楚（木门均朽）。要想进入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必须经过主棺室。以上情况表明，东西侧室及后藏室与主棺室关系十分密切，都是为墓主提供服务的场所。这四室互相通连，与前室以石门相隔，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封闭空间，应属于墓的正藏部分。其中主棺室象征南越王宫内南越王居住的寝殿；东侧室象征后宫嫔妃的居室；西侧室象征南越王的贴身女侍或奴仆的聚居之所；后藏室是南越王宫内直接为南越王服务的厨房和储房的模拟；石门或许是象征了王宫寝殿等生活区的大门。

前室与主棺室之间的石门，与各室之间设置的木门含义不同。木门可以开启，以木门相隔的各墓室实际上是相通的；而石门的后边安装有自动顶门器，不能够开启。所以，石门的内外分属两个天地。如果说石门内象征王宫的生活区，那么，石门外象征的是王宫生活区的附属建筑，也就是墓的外藏椁部分。

前室与东、西耳室以木门相隔相通。前室内置有一辆漆木车模型，并殉葬了一名“景巷令”，象征为南越王备车马，供墓主的灵魂出游之用；东耳室是供墓主灵魂宴饮娱乐的场所；西耳室是专门存放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的库房。这三室都是外藏椁。其中前室象征供南越王宫专用的车库，东耳室象征歌舞宴乐厅，西耳室象征仓库。

前室与墓道之间也设置了一道石门，此门是整座墓的总入口，既象征南越王宫的大门，又担负着防盗的重任，所以，门后也安装有自动顶门器。墓门外的木椁室内也放有一辆漆木车模型，殉人可能就是车夫；另外还有一些仪仗饰，说明此车是供墓主出行用的。木椁室以南的那具殉人，可能象征王宫门前的守卫。很明显，墓门外的木椁室以及它南边的殉人都属于外藏椁。

南越王墓的5处外藏椁，内容有婢妾（东耳室内的乐伎）、奴仆（车夫、守卫），有厨（西耳室内放置有大量的厨房用品）厩（漆木车模型），基本符合文献记载外藏椁应有的内容。

小结

在墓葬内、外设置外藏椁的做法，是汉代贵族大墓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实，这一做法不是汉代始有的，商周时期贵族大墓内、外埋葬的殉人坑和车马坑已经具备了外藏椁的特征。看来，外藏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从春秋晚期开始，有些大墓已在放置棺木的椁室外另置单独的器物坑。河北平山三汲战国中山王墓，不仅在墓坑里另置3个器物坑，还在墓坑外设置有4个器物坑。看来，这时外藏椁的设置已经非常成熟了。

在汉代的不同时期，外藏椁的设置情况也有所不同。西汉前期，外藏椁多置于墓坑之内，有的设在墓外。西汉中期以后，都设于墓内。随着崖洞墓和砖室墓的流行，外藏椁多设于墓道或甬道的两侧。

关于外藏椁的内容，从考古资料来看，基本上是以文献记载的“婢妾”和“厨、厩”为主。当然也不限于这三种，如淄博临淄齐王陵墓道外已发掘

的5个器物坑（即外藏椁）中的3号坑，是专门用于放置兵器仪仗的；又如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外发现有数个放置兵马俑的外藏椁；再如徐州北洞山楚王陵附属建筑（即外藏椁）中有歌舞室，甚至还有厕间；南越王墓外藏椁中也有歌舞室（东耳室）等等。

汉代王侯陵墓外藏椁流行的原因，主要是受到了迷信思想的影响。当时的人们认为人死后仍要像活人一样生活，死者不仅要吃各种食物，还要驾临后宫，欣赏音乐歌舞，乘车外出游玩，因此，将厨房、藏娇之室、宴乐厅、婢妾侍女奴仆、车马等统统搬入墓室供死者享用。另外，外藏椁的大量使用，还与厚葬的风气以及社会经济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当时的上层统治者提倡薄葬，就不需要如此多的外藏椁来放置所谓的“婢妾”、“厨、厩”了。如果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不好，国力很弱，诸侯王、列侯们怎么能建造规模巨大的墓室，又哪来那么多的东西随葬呢？

南越王墓的棺椁形制

棺椁是墓葬的中心，是全墓中最重要的部分。汉代以前，贵族大墓中棺椁的使用有一套十分严格的礼制。天子使用五层棺，诸公使用四层棺，侯、伯、子、男之爵位使用三层棺，大夫使用二层棺，士用一层棺。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关于用棺数量的葬制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身分等级越高的墓，使用棺的层数就越多。

西汉早期，有些墓葬仍保留使用着这种葬制。长沙马王堆 1 号墓是西汉早期的一座竖穴木椁墓，墓主是软(dài)侯利苍的妻子。此墓使用一椁四棺，正符合诸公之制。河北定县 40 号墓和北京大葆台 1 号墓，墓主都使用了五层套棺，与天子之制相吻合。这两座墓都是“黄肠题凑”墓，时代为西汉中晚期。“黄肠题凑”墓与木椁同是继承前代的一种墓葬形制。“题凑”之制在汉代以前已经存在，“黄肠题凑”是在“题凑”之制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而形成的，所以，这种形制的墓葬保留先秦礼制的因素比较多，从上述用棺层数上可以看出。

崖洞墓和砖室墓是汉代新兴起来的墓葬形制，一开始就摆脱了先秦礼制的束缚。表现在用棺制度上，已放弃了用多层棺的旧制，一般使用一棺一椁（满城 1 号墓、巨野红土山墓）或单棺无椁（满城 2 号墓）。象岗南越王墓使用的也是一棺一椁。

南越王墓的棺椁均腐朽不存。发掘队员经过认真仔细的观察，根据棺椁朽后所留的部分板灰痕迹以及原来钉嵌在外椁壁板上的 6 个大铜铺首从椁壁上散落下来的位置，并参照棺椁内随葬器物的出土情形，可以大致推测出棺椁的尺寸。外椁长约 3.3 米、宽约 1 米；内棺长约 2.2 米、宽约 0.75 米。从发掘过程中采集到的彩绘漆皮判断，外椁表里皆髹漆，外黑漆内红漆，在黑漆地上还用绿、黄、朱三色彩绘流云纹图案。内棺也内外髹漆，内朱外黑，无彩绘。

南越王墓棺椁内的空间虽小，但出土的随葬品却很丰富。从出土情况判断，椁面四角各置一块玉璧，椁盖板上还放有成捆的箭镞、铅弹丸、弓弩和铜车饰。棺椁之间在棺前棺后分别形成“头箱”和“足箱”（离墓主头、足部较近的棺椁间放置的物品）。“头箱”内平置 2 个大漆奁，一奁盛满珍珠和大玉璧，一奁装盛有钻凿痕迹的龟板，另外还出土了一批稀世之宝，如青玉角杯、镶玉盖杯、青白玉盖盒、青白玉带钩、嵌宝石的银带钩、铜带钩等。“足箱”内放置有大量陶壁，还有一个珍贵的银盒。棺内除出土了一套玉衣敛服外，在玉衣上面、里面和底下还铺垫玉璧 29 块，多为精品。另外，玉衣两侧还分置玉璧、玉璜；10 件铁剑分放在玉衣两侧腰际，每边 5 件；4 套 8 件牌饰（3 套平板玻璃鎏金铜牌饰、1 套龙龟纹镂空铜牌饰）分放在两侧铁剑上面，左右侧配置成套；玉衣头罩顶部有 1 件青白玉雕兽首衔环、右边置虎头金钩玉龙、左边放透雕凤纹牌饰、上面盖 1 件透雕龙纹玉璧和 1 件透雕凤纹重环玉佩以及 8 片杏形金叶（原缝缀在绢帛上）；玉衣上面在胸腹间分 3 组共放置 9 枚印章（“文帝行玺”“泰子”金印各 1 枚，“赵昧”、“泰子”、“帝印”玉印各 1 枚，无字玉印 3 枚、绿松石印 1 枚）；玉衣胸腹部发现许多小珠、小饰件（小玻璃珠、玻璃贝、花形金泡、素面金泡、素面银泡、素面鎏金铜泡）；玉衣胸腹之下有一串组玉佩饰（透雕玉饰、小玉人、金珠、玻璃珠等）；玉衣双鞋之下还踏着 1 件双连璧。

玉衣内墓主的骨殖大部分已腐朽，只剩下骨渣。墓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北足南，面部朝上，微向右偏。上肢微内曲，两手合拢按在玉衣腹部，下肢伸直。经体质人类学家鉴定，墓主系成年男性，年龄在 40—45 岁之间，身高约 170 厘米。另外，墓主生前还患有轻度牙周炎和牙积石。特别有趣的是，在玉衣内贴身铺垫的玉壁及残存的墓主骨骼上，都没有发现任何衣服织物的遗痕，表明墓主赤身裸体穿套玉衣。这一情况在王陵是独一无二的，或许是南越国的葬俗吧。

千年古韵奇珍异宝

金灿灿银闪闪

在当代，金银制品少且贵重，在古代更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黄金制品大约出现于公元前 5000 年的埃及。银制品的出现更晚，约在公元前 2650 年。与人类使用铜的历史相比，金银制品的出现要晚得多。

中国古代黄金、白银矿的开采，在先秦文献中即有记载，汉代以后各朝代都有重要的黄金和白银产地。考古发现的金制品始于商代，多为饰品，如金片、金叶、金箔、耳环、臂钏、等等，没有发现容器皿。金容器约出现于战国早期，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出土了金盞、金杯、金勺、金带钩等，含金量最高达 98%，总重有 5 公斤多。银制品始见于春秋时期，出现于错金银青铜器上，是以错金银工艺中银辅料的面目出现的，用量很少。战国末期，出现了银容器，如安徽寿县楚王墓出土的银匜，洛阳金村周墓出土的银盒、银卮、银杯等。春秋战国以至秦汉时期，金银制品仍以小件饰品、玺印、带钩、医疗用品以及工艺品为主，缺少较大的器皿。魏晋至隋代，器皿仍不多见，到了唐代，器皿才大量出现，呈现出缤纷绚丽的色彩。中国古代少而贵重的金银制品，一般百姓是无法享用的，穿金戴银，衣着华丽的必是王公贵族。遗留至今的中国古代富丽堂皇的金银制品，一方面反映了古代工匠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另一方面也是达官显贵奢侈生活的真实写照。

南越王墓出土的金制品计有玺印、带钩、座足、杏形金叶、金花泡形饰等，其中以三枚金印最珍贵。银制品有盒、卮、匜、洗、带钩等，以银盒的历史价值最高，银带钩的造型也很别致。

金器

（1）“文帝行玺”金印（图 1）

出主棺室墓主玉衣上胸偏右处。因“行玺”不是佩戴用玺，随葬时放置自由，非系佩于墓主身上。印方形，蟠龙钮，印台长 3.1 厘米、宽 3 厘米、高 0.6 厘米、通钮高 0.6 厘米，重 148.5 克，含金量 98% 强。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四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欲腾跃疾走。这枚金印系由南越国自铸，铸后局部又经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漕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

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的礼制规定，只有皇帝、皇后用印才能称玺，其它臣属的印不能称玺。皇帝用玺非只一种，如有皇帝之玺用于赐诸侯王书（多佩戴），皇帝行玺用于封国，皇帝信玺用于发兵（后两种玺印收存在符节台，非随身佩玺），天子之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行玺用于召大臣，天子信玺用于事天地鬼神。帝、后玺皆白玉质，螭虎钮。

在传世以及发掘出土的大量秦汉印章中，皇帝玺尚未见一例，不知是什么面目。《封泥考略》一书中著录有“皇帝信玺”封泥，可知当时确有皇帝信玺，与文献记载相符。

1968 年，在陕西咸阳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发现一枚玉印，印面方正，宽、高 2.8 厘米，螭虎钮，通体色白晶润，四侧刻云纹，文曰“皇后之玺”，其形制、印文正与文献所载帝玺相合。这枚玉玺小篆体，印文布局疏密得当，结构严谨，字体笔划平直又富于变化，显得既庄严、大度，又略带几分秀美，

为皇后所用，正符合其身分，是秦汉印章中的绝妙精品。据考古工作者推测，玉玺的出土地离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的长陵不远。西汉末年，长陵被盗掘，玉印可能遗落土中，后又被雨水冲移至沟里，幸存至今。

据《史记》、《汉书》记载，南越国是西汉初割据岭南、独霸一方的地方政权。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僭号为“南越武帝”，第二代南越王赵昧（胡）僭号为“南越文帝”，到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时才诚心归顺汉朝，不再僭号称帝。“文帝行玺”金印的出土，证明了史书所载第二代南越王僭号称帝的事实。

“文帝行玺”金印，是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这枚帝印与文献记载的帝印质地、形制和印文都不相同。文献中的帝印为白玉质、螭虎钮，印文有作“皇帝（或天子）行玺”的；而赵昧这枚帝印却是金质、蟠龙钮，印文为“文帝行玺”。可见这枚金印确有独特之处。

“文帝行玺”金印与文献中的帝印不同，与诸侯王相比，有什么异同呢？西汉诸侯王国的地位很高，王国宫室百官的建制与京师长安几乎相同。诸侯王死后使用“黄肠题凑”葬制，着金缕玉衣，都是皇帝之制。诸侯王用印也有称玺的，这也反映出诸侯王拥有崇高的政治地位。考古发掘出土的几枚诸侯王印都是金质，与赵昧帝印质地相同，但前者钮作龟、蛇形，与赵昧帝印的蟠龙钮不同。如1981年江苏扬州甘泉山2号墓出土的“广陵王玺”和1954年陕西阳平关出土的“朔宁王太后玺”都是金质龟钮；1956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滇王之印”和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印都是金质蛇钮（后两枚是汉朝颁赐给外藩首领的印）。

“文帝行玺”金印的大小尺寸与帝印和诸侯王印也不一样。前述“皇帝信玺”封泥和“皇后之玺”玉印，边长都是2.8厘米，约合汉制“方寸二”，诸侯王、外藩首领印边长2.2—2.4厘米，约合汉制“方寸”，而“文帝行玺”金印边长3.1×3厘米，比帝印和诸侯王印要大得多。只有“朔宁王太后玺”边长3.3厘米，与南越王印基本相同。据研究，此玺是东汉初公孙述割据四川时封隗嚣之母的金印，公孙述和南越王同是地方割据政权，在用印上都有意逾越汉朝制度。

综上所述，“文帝行玺”金印是南越国自铸的实用官印，它既不同于文献记载中的帝印，又不同于发掘出土的诸侯王、外藩首领印。它是迄今发掘出土的第一枚帝印，也是西汉最大的一枚金印。独一无二的“文帝行玺”金印，放射着异样的光辉。

（2）“泰子”金印

出土棺室墓主玉衣腰部。方形、龟钮，印台长2.6厘米、宽2.4厘米，通钮高1.5厘米，含金量98%强，重74.7克。印文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造，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昧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昧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昧。昧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3）“右夫人玺”金印

出土侧室。印面方形，边长2.15厘米，通高1.5厘米，重65克。龟钮，

腹中空用于系绶。铸制。阴刻篆文“右夫人玺”，有边栏和十字界格。字体较“文帝行玺”与“泰子”自由，刻工仍不失为古代印章中的精品。

东侧室除出有“右夫人玺”金印外，还出土了其它三枚龟钮鎏金铜印，印文分别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部〕夫人印”。四印分属四位为南越王殉葬的女人。在汉代，皇帝之妻称皇后，妾称夫人；诸侯王妻称王后、妾亦称夫人；列侯之妻不称“后”，直呼夫人。可见，“夫人”这一称谓在不同等级里含义是不一样的。南越国名义上是诸侯王国，实际上曾僭越称帝。不管南越国实行的是“帝制”还是“王制”，“夫人”的身分都应是姬妾。汉时以右为上，朝廷中右丞相位在左丞相之上。南越国的宫室百官礼仪制度多仿效汉朝，推测也应应以右为尊为上。据此，四夫人中右夫人地位最高，左夫人位居第二。“泰”通“大”，泰夫人即大夫人，可能位居第三。“部”或可解释成少、小之意，部夫人意即少夫人，位居最末。南越王后宫姬妾成群，这四位夫人可能是赵昧生前最宠爱的，所以死后也将她们带走。真可谓是红颜薄命！

（4）金带钩

出西耳室。通高 1.9 厘米，重 29.3 克。钩体为一长喙雁形，作回头顾盼状，长喙突出体外，双翅合敛，眼睛以细线刻划，十分逼真。圆柱形钮柱的末端作成凹槽，圆形薄饼状的钮扣有凸榫套入钮柱中，榫头分叉，使钮扣可随意转动而不致脱落，设计颇具匠心。

（5）金花泡

西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都有出土。半圆球形，直径仅 1.1 厘米，泡壁极薄。由金箔片压制成形。球正面正中饰一圆圈纹，外绕心形和点珠纹相间各 3 个，每个点珠纹由下面 3 个小珠上焊接一个小珠组成。球背面中空，焊接有一根横梁便于连缀。球正面上的纹饰都是用金丝和小金珠焊接而成，在 20 倍显微镜下可看到焊接点。如此精细入微的金细工艺，在金银加工技术尚不发达的西汉（金银工艺不是中国传统有代表性的金属加工工艺）是难以想象的，加之金花泡造型奇特，故推测它们可能是通过贸易由海外输入南越国的“洋货”。金花泡原来可能缝缀在丝织物上，起装饰的作用。

（6）杏形金叶（图 2）

出主棺室，共 8 件，高 4.6 厘米、宽 4.4 厘米，重 2.22—2.87 克。呈杏形，纹饰为两个绵羊头的侧面，螺旋状的大弯羊角十分突出醒目。纹样是锤打成的，十分精细。杏形金叶边缘凿有小孔，原来系缝缀在丝织物上，盖于墓主脸部（古称“幙目”），丝织物腐朽后，金叶散落开来。

银器

（1）银盒（图 3）

出主棺室。通高 12.1 厘米，腹径 14.8 厘米，重 572.6 克。由器身和器盖组成，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身上均饰以对向交错的蒜头形凸纹，纹饰经锤鏊而成。盖与身相合处的上下边缘各饰一匝穗状纹带，谷粒般凸起，系篆刻而出，并鎏金。盒盖顶部焊接有三个银锭形小凸榫，身底附加铜质鎏金圈足座。小凸榫和圈足座都是后来补加上去的。盒盖与底部还刻有草隶体铭文。根据对铭文的研究，原来这件银盒是南越国王后宫中所用之器，由私官掌管。出土时，盒内尚遗留有半盒药丸，应是王后生前所服用，说明王后生前患有某种疾病。

这件银盒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据研究，银盒的造型、纹饰以及制作工

艺与中国传统的金属器皿风格迥异，而盖顶上的凸榫、底部的圈足以及铭刻文字又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式样。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呢？科技工作者通过电子探针分析了银盒的化学成分，发现盒的本体含有微量的金和铜（含银97.33%），而盖上的凸榫所含金和铜的量比本体大2—3倍（含银93.95%），表明两种银的质地不同。正好，墓内西耳室出土了银锭，经测定，银锭的成分与凸榫基本接近，表明凸榫的用材取自银锭。原来，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是由外地输入进来的。银盒输入后，由私官掌管，并给予编号登记，供王后使用。由于银盒无钮与足，与南越国器物造型不同，使用起来也不方便，所以就在盖顶焊接凸榫（推测榫上还要套接主体为羊或熊等动物造型的钮），于身底套装鎏金圈足座，在焊接凸榫及套装圈足座时，还将部分铭刻文字覆盖住了。经过这样一番按照中国传统工艺的改造后，使银盒成为中西工艺合璧的文物珍品。

银盒是从什么地方输入南越国的呢？从银盒的制作工艺、造型与装饰等方面来看，都不具有中国传统风格，说明它应来自海外。经过器物的对比研究，发现与此银盒花纹相同的金银器皿在西方的伊朗和爱琴海地区多有出土。原来，银盒的娘家在遥远的西方。类似的器物在同时期的丝绸之路沿线及西汉都城长安附近都没有发现，说明它可能是乘坐商船由海路来到南越国都城番禺的，这件银盒竟还是中西海路交通与贸易往来的历史见证呢。

有趣的是，山东淄博临淄齐王墓器物坑出土的一件银盒，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出土的二件铜盒，造型和纹饰都与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银盒相似。这三座墓的年代大体相当，但相隔千山万水，怎么会出现如此相似的海外器皿呢？它们是通过什么方式、经过什么路线输入内地的呢？还有待于进行深入的研究。

（2）银洗

出后藏室。直口、平沿、折腹、圆底。口径20.4厘米、高4.5厘米，用锤鍱工艺制成。由银洗口沿上的铭刻文字得知，银洗是南越王室专用的器具。

（3）银卮（zhì）（图4）

出西耳室，出土时装在一个漆卮内。通高9.8厘米，筒径6.2厘米，含银量97%强，重216.7克。铸制而成，圆筒形带盖，平底，附有2个小铺首衔环。盖面内区微鼓起，鎏金；外区分立3个“S”形鎏金立钮，是焊接上去的。

（4）银带钩

墓内共出7件，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数种。其中东耳室、主棺室和东侧室出土的3件非常精美。

东耳室出土的这件银带钩，锻制而成，通长8.2厘米。钩首细长呈龙头状弯曲，钩身为一变形龙体，两龙交缠相连在一起。钮扁圆，尾部作卷云纹状。整体造型精致、优美。主棺室出土的这件银带钩（图5下），通长18.4厘米。带钩侧视呈弓形，表面饰以高浮雕纹饰并镶嵌宝石。纹饰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为钩首，龙头形，下连卷云纹；第二段位于钩体隆起最高处，主纹饰是一龙首，浓眉圆目，双角直竖，两侧是一只高浮雕向前腾跃的飞虎；第三段由钩体正中至末端，其间分嵌三组宝石（出土时已失），以卷云纹作隔界。带钩背面饰以针刺的卷云纹。此件银带钩通体鎏金，饰以复杂生动的纹饰，并镶嵌宝石，显得华丽无比，是一件难得的工艺精品。

东侧室出土的这件银带钩，通长 8.3 厘米。钩首龙头形，细长曲颈。钩体上半是龙尾，下半为龙爪，系变体图案化的龙身，上面还饰以七星勾连纹。钮呈扁平圆形。造型别致奇巧。

带钩的主要用途是扣接束腰的革带，还用于佩剑、钩挂镜囊、印章、刀削、钱币和玉饰品。带钩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服饰用品，春秋中晚期开始出现，南北朝以后为带扣取代，逐渐消失。带钩虽系实用品，但有的质地优良（金、银、铜、玉）、工艺讲究（鎏金、错金银、镶嵌宝石、贴金）、花纹精美，也是极富艺术情趣的工艺品。透过一枚小小的带钩，不只可以看到它的实用价值，还可以看到古代匠人们制作工艺的水准、审美的趣味以及当时人们生活的风尚。

古铜失颜绿锈斑斑

铜器是用铜或铜的合金制成的器物。人类最早接触的铜是天然红铜，用以制作小件工具和装饰品。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了公元前 8000 年的天然铜饰物。世界上最早的冶铜技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 4000 年左右的土耳其、伊朗境内。根据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中国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小件铜器，夏代已能制作形制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商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器繁荣的局面，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装饰出现了新的工艺，如鎏金、错金银、镶嵌和针刻等，从而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汉代青铜器在继承东周铜器风格的同时，在器类、造型和纹饰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中国古代青铜器大都是用铜与锡、铅的合金材料制成，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汉代铜器从用途上大致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具（酒器、水器、炊煮器、食器等），工具、兵器、乐器、度量衡器等。与商周青铜器相比，礼制用器减少、日用器具大量增加。为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方便，铜器造型趋于灵巧，有别于商周青铜礼器的厚重。器物多素而无纹饰，虽显简素，但鎏金银、错金银、镶嵌等工艺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铜器中不乏造型别致、装饰华丽的精品。汉代铜器多出自墓葬，如满城汉墓就出土了大量的铜器珍品。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也是汉代铜器考古的重要发现。

西汉时期，随着铁器和漆器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大量使用，铜器的地位逐渐减弱。但偏居岭南的南越国，情况有所不同。从南越王墓出土的随葬品来看，青铜器仍占绝对重要的地位。墓中出土青铜器共 500 多件，不少是极富地域特色的精品。这批铜器，从用途上大致可分为酒器、炊烤器、日用器、乐器、车马器和工具等，酒器有壶、钫、提筒、甗等；炊烤器有鼎、釜、釜、甗、烤炉、煎炉等；日用器种类繁多，如有鉴、铜、盆、匜、勺、姜礪、熏炉、灯、镜、带钩、杵、臼、印章等；乐器有钮钟、甬钟、勾鑃、铎等；兵器有虎节、戈、矛、剑、弩机、镞等；车马器有盖弓帽、伞柄箍等；工具有印花凸版、锯、锥等。其中最具有南越国地方特色的是酒器、炊烤器、乐器以及日用器中的姜礪、熏炉等。

酒器

酒器是盛酒的青铜容器。汉人好饮酒，墓中常出土酒器。

（1）壶（图 6）

共有 9 件。其中东耳室出土的一件高 37 厘米，器表鎏金，细长颈，圆腹，腹部饰铺首衔环一对，广圈足微向外撇。此壶造型光圆，又不失端庄大方；通体鎏金，更显得华丽无比。

（2）钫（图 7）

钫即方形的壶。共有 4 件，全部出自东耳室。其中一件形体硕大的钫通高 55.5 厘米。盖呈覆斗

形，鎏金，上有 4 枚卷云状立钮。腹呈椭圆形突出，腹部四壁各附一铺首衔环，颇具透雕感。方形座足下部四角各附 1 小足。几乎通体饰以繁缛的浮雕式纹饰。有趣的是，铜钫唯独器盖部分鎏金，器盖纹饰略显呆板，远不及器身线纹流转舒畅，故据此推测，此器盖应是后来补铸的，铜钫原先的器盖可能是丢失了。此器造型古朴厚重，装饰纹样复杂多变。用铸制如此精良的铜器盛酒，更能衬托出酒的醇美。

（3）提筒

共有 9 件。东耳室出土的 3 件大小相套在一起，以最里边的一件铸制最精。这件提筒高 40.4 厘米，缺盖，圆桶形，口径大于底径，腹部微圆鼓，复耳，平底，矮圈足。器身装饰有 4 组纹带，近口沿处是一组几何形纹带，近器足处有 2 组几何形纹带，器腹中部是一组主纹饰，饰形象大同小异、首尾相连的羽人船 4 只。船与船之间用水鸟、海龟、海鱼作装饰。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船首底倒挂着一具人头。

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族，船首羽旌下各有一水鸟站立。船中后部有一高台，台下置一鼎形器，中前部竖一长杆，杆上有羽饰，杆下悬木鼓。每船羽人 5 名，各饰长羽冠（冠下有双翼），额顶饰长羽，细腰，下着羽毛状短裙，赤脚。自前往后第一人立船首，左手持弓，右手执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持一短棒击鼓，右手执一不明物；第三人弯腰，左手执一裸体俘虏，右手持短剑；第四人立于高台上，左手持弓，右手执箭；第五人弓腿立于船尾，作用力划桨状。从整幅画面看，以船载人行于海上，船、人都以羽状物作不同寻常的装饰。人物形态各异，有的奋力划桨，有的手持兵器，有的专心击鼓，有的正在杀人。岭南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祭海神的场面。

西耳室出土的一件铜提筒，通高 23.5 厘米。圆桶形，上下微收，腹中部微鼓，平底附圈足。器上部近口沿处有两个复耳，内耳用以穿绳固定盖子，外耳用来系提梁。提筒腹上部、下部都有纹饰，但铸制不精，多已看不清。此提筒与同墓出土的另外 8 件提筒的不同之处有二，一是保存有铜质盖（一般多用木盖，不易保存），呈覆盘形；二是附有铜提梁（一般用藤条作提梁，也不易保存），由外耳铜环、衔和弓形铜条把手组成。据研究，铜盖形制与广州地区汉墓中出土的陶提筒和越南铜提筒盖完全相同，但铜提梁在提筒上却是罕见的。这种形制与质地的提梁常见于铜钲（南秦汉墓中常见，是仿天然竹提筒制成的铜提筒，与两广、越南铜提筒源流不同，形制有别，不是一个系统）上。这件器形怪异、不伦不类的铜提筒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原来，其形制更多的仍属于铜提筒系统，应是在南越国铸造的，铸造时有意仿照铜钲制成了铜提梁。一件文物，包含了许多需要破译的信息，例如，通过科学的化验分析可了解青铜合金的成分构成；通过仔细的外表观察可知铸造工艺的水准；从器物的出土位置以及器内所盛物品可判断其用途；器表的装饰性纹样是当时人们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反映；器物上的铭刻文字是研究当时社会制度、汉字演化、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有的器物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证。所以，鉴赏一件文物时，在细细体味它的造型之美、铸造之美、装饰之美、质地之美之余，还应了解它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以及它所包含的其它来自古代的信息（图 8）。

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最具地方性特色的器物之一。据研究，这类铜提筒仅发现于中国的云南、两广和邻近的越南北部地区。中国三省区共发现 23 件，越南共发现 30 多件。两广、越南出土的铜提筒，造型和纹饰基本相同，但越南开始使用铜提筒的时间可能更早，延续的时间也较长；两广铜提筒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并且都是提筒的早期型式。故推测，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广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出现的（或是在南越国内仿铸，或是通过贸易自越南输入进来）。文献记载，南越国的统治势力已达今越南北部地区，两广铜提筒中的一部分也可能是越南地方首领用以盛放贡品进献到南越王宫的。至于云南的几件铜提筒，出土时内盛充当货币用的海贝，器形与滇墓（战国末至西汉初滇国统治时期的墓葬）中常见的筒形贮贝器近似，

也应是贮贝器的一种型式，与两广、越南铜提筒没有源流上的关系。

(4) 甗

共有 4 件，全部出自东耳室。其中一件大铜甗通高 21.6 厘米。盖顶较平，斜肩、腹部最大径在腹的上部，肩部饰有牛头形双耳，各扣一大圆环，底附三矮足。

(5) 蒜头瓶

1 件，出后藏室，高 36.7 厘米。小口，细长颈，扁圆腹，喇叭形圈足。瓶口如大蒜头形，故名。蒜头瓶是秦墓出土的典型器物之一。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蒜头瓶，可能是秦军平定岭南时带来的，后流入南越王室。

炊烤器

炊具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它通过煮、蒸、烤、煎等方法做成美味可口的食物，供人们食用。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的炊烤器，从中可以了解南越国的饮食文化。

(1) 鼎

共有 36 件，分为汉式鼎（中原地区流行的型式）、楚式鼎（东周时期楚国富于地方特色的型式）和越式鼎（富于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型式）三种。

汉式鼎：出后藏室，通高 21 厘米。有盖，呈圆鼓形，上有三个环形钮。鼎腹扁圆，两侧附长方形耳，圜底，下有三矮胖蹄足。鼎盖部、腹部近口沿处均刻有“蕃禺、少内……”等铭文。“少内”系官名，主管库藏，说明此鼎（另有 4 件鼎上见相同的刻铭）是在“蕃禺”（即番禺，今广州）专门为少内官署制作的。此鼎形制与中原汉式鼎相似，可能是受了中原汉文化的影响。楚式鼎：出西耳室，仅此一件。器形高大，通耳高 42 厘米。深圆腹，圜底，长方形附耳，3 棱柱体高蹄足，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羊首形。此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鼎，后由楚地辗转流入南越国（图 9）。越式鼎：出后藏室，通高 41 厘米，是盘口形鼎。口沿较宽，颈部收小，腹鼓起，平底。盘状口外附一对半环状耳，三足扁且直。盘口内刻“重廿八斤……”等铭文。经测定，此鼎实际重量为 6725 克，可知当时的一斤约当今日的 240 克。

越式鼎：出西耳室，通高 30 厘米。浑圆腹，平底，长方形附耳，三直足向外微撇。

越式大鼎：出后藏室，通高 54.5 厘米。大口，腹壁较陡直，大平底，下附三条直形扁足，口沿上立方形双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 1 枚。据研究，泰、太、大三字互相通假，“泰官”即“太官”、“大官”，在汉代是掌管皇帝日常饮食的职官。南越王墓发现“泰官”封泥，表明南越国仿效西汉朝廷也设有此种官职，其职责应是掌管南越王的饮食。墓中凡悬挂有“泰官”封泥匣的器物，是经过泰官亲自检查后放入墓中的。

(2) 釜

出后藏室。敞口，束颈，溜肩，扁圆腹，圜底，肩部附 2 个圆环形竖耳。釜底有铁三足架支承。釜系炊煮器，三足架下燃柴火，釜内可煮熟食物。出土时釜内盛青蚶、龟足等海产品，说明是用来煮食海鲜的。

釜是古人南方少数民族通用的炊具，也是南越王墓出土富于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

(3) 釜、甑 (zàng)

出后藏室。釜小口，大圆腹，平底，肩上附双环形耳。

出土时附近放有铁三足架，用以承釜。甑敞口，深腹，圈足，腹上部附

两个圆环耳，底镂孔用以透气，类似现在的蒸锅。

釜、甑是配套使用的炊蒸器具，釜下燃火，釜内盛水，水沸后蒸气通过甑底的镂孔进入甑内，蒸熟食物。

(4) 煎炉

出后藏室，高 10.5 厘米、最宽 19.5 厘米。两层，上层大、下层小，均呈长方形浅盘状。底有 4 个扁方形短足。使用时下层燃炭火，上层煎炒食物，类似现今的“铁板烧”。

(5) 烤炉

后藏室出土了 2 件。一件平而近方形，边长 27.5 厘米。口沿面较宽，腹壁垂直，底附 4 个鸮 (xi o) 形足，四壁外各附一铺首环。在两侧面近足处共铸有 4 头小猪，作张口朝天状，用以插放铁钎等烧烤用具。炉体饰有细密复杂的纹饰。出土时，炉上置一捆铁链和铁钎，铁链用来套环提起移动烤炉，铁钎用以串肉烧烤。由炉侧壁所铸 4 只小猪图像来看，烤炉可能是用来烧烤乳猪的。现今广东菜中仍有一道名菜——烤乳猪，可见其起源要追溯到 2 千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此铜烤炉出土时，炉内塞满了黄土泥范，原来这件可能用于烧烤乳猪的铜烤炉刚刚铸好，未及使用就放入墓中随葬了

另一件铜烤炉平面呈长方形，长 61 厘米、宽 52.5 厘米，形体较大。烤炉底部设有 4 个带轴轮的足，用手可以推着走动，真是巧妙的设计制作。炉体较长的两侧面各附 2 个铺首环。炉盘口沿面和四壁外侧都有纹饰。出土时炉内尚有若干骨头存留，说明烤炉可能使用过。

日用器

日用器，这里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小件器物，如鉴、匜、镜、灯、带钩、熏炉、印章等。

(1) 鉴

出后藏室，共 3 件。一件状如深鼓腹大盆，圈足，腹上部两侧各有双环形耳，连以链条和拱形提手，鉴体外有纹饰。高 24.3 厘米、口径 37.5 厘米、腹径 40.6 厘米。出土时内盛鸡、猪、牛、羊骨和鱼、龟等海产。另有“泰官”封泥 2 枚，说明随葬前经过“泰官”的检验。

另一件口沿稍向外折，腹渐收成平底，腹上部附一对半环耳，耳上焊贴一件兽首作装饰，鉴底焊接三个短小方形足。鉴腹外有纹饰 4 组，极为细密，当是用特殊工艺——失蜡法铸成。高 15 厘米、口径 35 厘米

鉴主要用来盛水或冰，特别是在夏季，可降低室内温度，起到凉爽的作用。另外，将食物与冰存放在一起，如同冷藏室一样，使食物保持较长时间的新鲜。

(2) 匜

出西侧室，呈长方圆角形，平底，带直槽形流。腹壁的左、右、后三侧各附一个兽首衔环。腹下凿刻有“蕃”等铭文。“蕃”是“番禺”的省称，“番禺”即“番禺”。文献记载，秦代置南海郡，番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县。赵佗建立南越国后，番禺成为国都。刻有“蕃”字铭文的铜匜，或可说明是在番禺附近铸造成的。

匜是洗手的用具，一般与盘或盒配套使用。匜用来浇水，盘或盆用以承接废水。

(3) 熏炉

熏炉是燃焚香的用具。墓中共出 11 件，分单体和连体两种。

单体熏炉：出东耳室，通高 17.3 厘米。炉盖方形口，盖面隆起，顶中心有一桥形小钮。炉体口方形，下部圆形接倒铲形把，足座呈扁圆形。炉体中部和炉盖上布满“ ”形镂空。此熏炉与铜钮钟、甬钟、勾鑿、石编磬等乐器以及壶、钫、提筒、甑等酒器同出，表明是宴乐时焚香的用具。香气缭绕、乐声四起、轻歌曼舞、杯盏交错，好一派纵情享乐的景象！

连体熏炉：出东侧室右夫人棺前，应是右夫人生前所用之物。出土时 2 件放在一起，大小形制相同。通高 16.2 厘米。炉体由 4 个小方炉合铸在一起，盖顶也分作 4 个小盖，每个小盖上有半环钮。炉体腹部和盖顶均有菱形镂空。方柱形柄，方形座足，座足镂空呈条纹和三角形纹。熏炉盖系一次铸成，4 个方形炉体是先分别铸出后，再与座足铸合在一起。连体熏炉是最具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器物之一，其复杂的工艺代表着南越国铸造技术的水平(图 12)。

(4) 姜礪

出西耳室。长 13.3 厘米、高 5.2 厘米。分上下两半，上半为小乳钉状磨擦面，下半为半环形漏孔，生姜经磨擦成姜泥后放到漏孔上用手挤压，姜汁就流出来了。礪体上、下端各有一钮，用于悬挂。类似的工具至今岭南民间仍在使⽤，多用竹制成，主要用于擦取姜汁，故称姜礪。南越王宫在制取姜汁这类生活细节上如此讲究，可见南越国的饮食文化是比较发达的。

(5) 杵、臼

出西耳室，共有 2 件臼，一件杵。杵中间圆柱形，略细，当是手握部分，两端为棱柱形，长 35.5 厘米。臼出土时 2 件相套叠在一起，大的一件高 13.5 厘米，圆筒形，腹下部渐收为平底，下附假圈足。臼体中部对称分布有 2 个鼻形钮，各衔一圆环。出土时，旁边散布成堆五色药石，说明杵、臼是捣药石的用具。

(6) 铜镜

墓内共出 39 件，不少是铸制精良的珍品。

连弧龙纹镜：出西耳室，直径 27，8 厘米。三弦桥形钮，圆钮座。镜中八弧相连，弧外饰 4 条大龙纹，弧内饰 4 条小龙纹。大龙纹口大张，两肢双爪左右撑开，显得凶猛有力。

绘画镜：共 3 件，最大的一件出西耳室，直径 41 厘米，出土时放在一漆盒内。三弦钮，无钮座。缘内有 15 个内向连弧纹绕成一周。镜中以一圈凹面宽带纹为界分为两区，内区绘卷云纹，外区绘人物，绘画所用颜料保存下来的只有白、青绿两色。惜因保存环境太差，镜锈蚀严重，所绘人物仅一组(可能共有四组)尚清楚可辨。这组图案的内容是，中央有 2 人正在跨步弓腰作斗剑表演，两侧各有 4 人站立围观。将斗剑表演、众人围观的场面绘于铜镜之上，可见这种体育竞技活动在当时是很流行的。

这件彩绘人物画像镜是目前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一面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十分罕见的珍品。

带托镜：出西耳室，镜面直径 28.5 厘米。镜面和镜背托先分别铸出，再经组合而成，又称复合镜。镜托作成凹形托盘，将镜面套入，用胶漆粘接牢固。镜托背面布列有 9 枚漆金乳钉和三个环钮，并运用错金银和红铜、绿松石镶嵌等精细工艺制作出绚丽多彩的花纹图案，极富装饰性，是古代铜镜艺

术中的瑰宝（图 13）。

十字龙凤纹镜：出东侧室，直径 27.4 厘米。三弦钮，钮外有宽带状十字形四叶纹，将纹饰分成内、外两区。内区立四凤，作展翅翘首远望状，外区为四条张牙舞爪的蟠龙，作怒目回首状，周缘是 16 个内向连弧纹。工整细密的云雷地纹，更衬出龙凤纹简洁流畅的艺术风格。此镜可能是流入南越国的秦国镜。

六山纹镜：出西侧室，直径 21 厘米，三弦钮。主纹为 6 个斜形山字，中间一划特长，两侧的两划上端稍向内勾。地纹是浪花形羽状纹，中间层纹饰作莲叶形花瓣（图 14）。

考古发现的四山字纹铜镜较多，六山字纹铜镜却非常罕见。目前知道的六山字纹铜镜只有 3 面，一面流入日本，一面珍藏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内，均为传世品。南越王墓的这面六山字纹铜镜，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可见是多么珍贵难得。

（7）灯

两件成一对，出后藏室。灯盘较浅，底立 3 个尖锥钉以插固烛。柄细高，下有圈足形座。高 40.9 厘米。两灯均有刻铭，一曰“重十三斤十一两”，一曰“重十三斤十二两”。汉代墓葬中经常出土铜灯，有的设计巧妙，制作精美，既是实用品，又是工艺品。如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和朱雀灯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对铜灯造型比较简单。

（8）带钩

墓中共出土 23 件，主棺室出土的 1 件龙形钩制作最精。这件带钩通长 20.1 厘米。钩体铜胎，外表包金镶嵌绿松石。龙首用金箔片锤鍍成形。颈部两侧用金箔片各做一条游龙，其间镶嵌绿松石，游龙尾部汇合于正中成一鹰首。弓形钩体正中用金丝编成鳞状网眼，每个网眼内嵌一小颗绿松石，两侧再用金箔做成朱雀等图案相陪衬。整件带钩造型优美，工艺精湛，装饰华丽，是铜带钩中的精品。

（9）印章

3 夫人印：出东侧室，均鎏金，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印面方形，边长 2.5 厘米，分别阴刻篆文“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部〕夫人印”，刻凿均极工整，都有边框和十字界格。龟钮、龟背无纹，四足，尾向左垂，腹下中空，用以系绶带。这三枚夫人印与“右夫人玺”金印同出，应分别属于东侧室的四位殉葬夫人。

“景巷令印”：出前室，为前室殉人的随葬品。方形鱼钮，通高 1.8 厘米、边长 2.4 厘米。据研究，景、永二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有永巷令的官职，以宫中宦者充任，掌管皇后、太子家事。墓中前室佩戴这枚铜印的殉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的“景巷令”，职掌南越王室家事。南越王死后，以“景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象征在阴间如同阳世一样，为南越王准备出游用的车子。

乐器

南越王墓出土了成套的青铜乐器，这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多见。

（1）钮钟

出东耳室，出土时，钮钟尚整齐地悬挂于木质横梁上。钮钟一套共 14 件，形制全同，大小有别。最大者通高 24.2 厘米，最小者通高 11.4 厘米。方环状钮，弧形口，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枚较短小，两面共 36 枚，枚上有

漩涡纹。鼓部、钲部无纹饰。经鉴定，是南越国自铸的一套乐器。

(2) 甬钟

出东耳室。一套共5件，形制相同，大小不一。最大者通高49厘米，最小者通高38厘米。长圆筒形甬，实心，上有两道旋，底处饰一圆箍，宽展如座。舞平，用于系绳悬挂的鞞作蹲兽状，位于舞的边缘处。口呈弧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左右篆带间共有36枚，枚较短小。鼓、钲部无纹饰。

(3) 勾鑃(图15)

出东耳室。一套共8件，形制基本相同，大小不一。最大者通高64厘米、最小者通高36.8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一面光素，一面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文下每件分别阳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勾鑃是古代吴越地区特有的敲击乐器，体小者以手执柄，以槌击之而鸣。

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套勾鑃，是迄

今全国发现唯一具有绝对纪年，又自编序码的勾鑃经测定，现存勾鑃音质尚佳，仍可用于演奏。

“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八字铭文意为，勾鑃为南越文帝(赵昧)九年(公元前129年)乐府(主管音乐的官署)中的工师铸造。“文帝九年”铭文表明第二代南越王确曾自称文帝，充分证明了文献记载是正确的。另外还表明，今天我们有幸能够目睹的这套乐器珍品，已经历了2125个春秋。由它们奏出的美妙乐声，曾经弥漫在南越王宫的上空。喜庆的宴乐，终于有一天变成了哀乐，南越文帝赵昧死了。下葬的那天，他还带走了这套心爱的勾鑃。

(4) 铎

出后藏室，通高42.8厘米。体修长，壁厚重，横截面近圆筒状。实心长柄端呈圆环状，柄断面呈八边形。铎体饰羽状纹和垂鳞纹，正面上端还刻一“王字”。铎属敲击乐器，击时以手执柄，口朝上。此铎造型古朴、敦厚。

(5) 瑟杵

共出12件，东耳室8件、西耳室4件。每把瑟有4杵，可知此墓共随葬着有三件瑟。漆木瑟均已朽，仅剩鎏金的博山状铜瑟杵。东耳室出甬钟旁的4件瑟杵，以卷云纹为座，山峰耸立，其间有龙、熊、狮、野猪、猴、虎等动物奔走嬉戏，这些小动物造型生动，神态各异。一件小小的瑟杵竟有如此巧妙的构思和精湛的工艺，仿佛一幅微型百兽图的雕塑，饶有趣味。

兵器

(1) 虎节(图16)

出西耳室，长19厘米、高11.6厘米，厚1.2厘米。作蹲虎欲跃状，虎扬头，口大张，露齿，弓腰，尾巴上扬卷起，姿态威猛生动。虎两面的毛斑，系先铸出弯叶形浅槽，再贴以金箔片，虎眼、耳以细金片勾勒。从侧面观察，虎形线条流畅，层次分明。整体造型采用局部夸张的表现手法，脖颈粗壮，前爪微曲稳稳着地，腰弓特甚，臀部紧贴后爪跟上，后爪尖着地，爪跟抬起，犹如满弓之箭，准备随时射出，浑身积聚了巨大的能量。这是目前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不论在造型上还是在工艺上，都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据研究，传世有龙节、虎节，皆楚国用器，用途是持节者所到之处可以得到当地官府提供的饮食便利。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形制、字体与传世的龙节、虎节全同，但铭文有别。从铭文来看，用途应是用以征调

战车和士兵的，属军事性质的内容，与传世的秦国虎符(新郢、阳陵虎符)

和考古发现的秦国杜虎符的用途相类。故它有可能也是化为兵符使用的。此虎节的原产地应在楚国，后流入岭南，归南越国所有。

(2) “张仪”铜戈

出东耳室，通长 22.3 厘米。援部狭窄，略向上弯，内（nà）微上翘，1 穿，胡狭长，3 穿。造型灵巧，铸作精良。此戈内上刻有铭文。通过解读铭文可知，戈为秦戈，系于公元前 321 年由秦相张仪督造，到赵昧下葬时已历 110 年左右。此戈在百余年间历经几人之手？其铸造地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关中，如何到了岭南？这些问题已不可详考。据推测，此戈可能是秦国军队南下平定岭南时带来，后流入南越国。随着铁兵器的大量使用，此戈从军队退役，遂成为南越王喜爱的“文物珍品”；或被改用于仪仗器。及王死，用以随葬。这件铜戈的问世距今已 2300 多年了，透过斑斑绿锈，似乎还能看到工匠在忙碌铸造、士兵在奋力拼杀、南越王在玩欣赏的一个个场景。逝者如斯夫！这件古兵器仿佛一位阅世千年的长者，在述说历史的沧桑、战争的残酷，同时也在期盼永世的和平。

(3) 剑

出西耳室，出土时剑外套有木匣，已朽。剑长 49.3 厘米，宽身，圆短茎，中脊凸起，双面有刃。这虽是一把常见的战国楚式剑，可在南越王墓中却是唯一的一把青铜剑。

车马器

墓中出土了大量的车马器具，有一些制作考究、装饰华丽。例如西耳室出土了一件铜伞柄箍，长 40 厘米，圆筒形，中部有一节凸起的宽带纹，两端各有一道凸棱。箍的外表以错银工艺做出复杂华丽的图案，十分精美。箍内尚有木质伞柄残存，分为两截，以榫卯相连接。

南越王墓出土的车马器具品种齐全，器具表面多鎏金，有的如上述铜伞柄箍通体错银。用这些鎏金错银、光彩照人的车马器具装饰南越王乘坐的车子和马匹，马车一定显得格外富丽堂皇。

工具

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工具有锯、锥、印花凸版等，以 2 件印花凸版最重要。

印花凸版一件大一件小，出西耳室。大的一件长 5.7 厘米、宽 4.1 厘米，形体扁薄呈板状，正面花纹近似 1 颗小树，树顶饰旋曲的火焰纹，背面有：穿孔小钮。据研究，这 2 件印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小的一件用以确定图案花纹的分布位置，称“定位纹版”；大的一件用来印染主要图案，称“主面纹版”。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纺织科技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用这 2 件印版印染图案的印花丝织品，在西耳室就有发现。

其它

(1) 鎏金铜牌饰

墓中共出 5 对 10 件。呈横长方形，鎏金，饰镂空动物纹。出自墓道外藏椁殉人附近的一对牌饰，周边微凸起，饰穗状纹，中间为雌雄 2 只绵羊相互依偎的图样。同样纹饰的牌饰在东侧室左夫人棺位处也有一对。出自主棺室墓主玉衣左右两边的一对牌饰，周边也是穗状纹带，中间饰一龙二龟纹样。龙昂首张口卷身，两龟被龙卷在身内，作回首相望状（图 17）。饰同样纹饰的牌饰在东侧室也出土了一对。

牌饰是固着在皮带上作为装饰用的。图案作动物纹的横长方形铜牌饰，一般认为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最具特色的服饰之一。南越王墓位于岭南，距北方草原地带遥遥数千里，怎么会出土具有北方草原风格的动物纹铜牌饰呢？经过专家学者的详细考证，原来，动物纹铜牌饰并不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所独有。南越王墓出土的2种铜牌饰，图案作一龙二龟纠缠纹样的，应是中原汉人的产品，由南下的中原人带入岭南，或是南下岭南的中原人在南越国制作；图案作二羊交缠纹样的，应是北方游牧民的制品。秦代时曾大举北伐匈奴，秦官兵可能把铜牌饰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原；后来这些秦国官兵又参加了南平百越的战争，把铜牌饰带入岭南，后流入南越国。当然，二羊交缠纹样的铜牌饰，也不排除在南越国仿铸的可能性。

器物是古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进行文化交流的载体，通过对某一器物的考证、研究，不仅可以获得国内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信息，有时，这些器物还是国际间文化交流的物证。上述小小的铜牌饰，就引出了不少古代南、北方文化交流的话题。

（2）鎏金铜铺首（图18）

共有6个，出主棺室，原钉于外椁壁板上，是外椁上的装饰物。出土时，椁前后两头各1个，两侧各2个，位置是对应的。6个铺首大小造型及纹样都相同，双目圆睁，眼珠圆鼓，双眉宽粗上卷，口大张与面颊同宽，上齿毕露，下髭及两嘴角髭均上卷，两耳作卷云形，鼻梁凸起，鼻宽大衔环，圆环上又铸出三组卷云纹带饰。铺首面目十分夸张、狰狞。

（3）屏风铜构件

主棺室发现了一件大型漆屏风，出土时屏风已朽，只保存有铜质构件若干件。这里介绍的是几件造型生动的铜构件。

转角鎏金铜托座：主体系一力士跪坐，高16.2厘米。力士双眼瞪圆，眼珠外突，鼻短而高，口衔一条两头蛇，4枚獠牙卡紧蛇身，两手各握一蛇，两腿也各夹一蛇，5条蛇相互纠缠在一起，构成一幅生动、形象、极富艺术感染力的图象（图19）。

鎏金蟠龙托座：通高33.5厘米、通长27.8厘米。龙扬脖昂首屈肢盘尾，作起步状，4足踩在1个支座上。支座由2条蛇卷缠2只青蛙构成。青蛙张口瞪目，表情恐怖紧张，双臂用力作欲挣脱逃跑状。龙双耳后掠，口大张，眼圆瞪，1只蛙蹲卧口内，表情安详，好像刚刚从毒蛇的缠卷中挣脱出来，得到了龙的保护。龙的额顶伸出1个管形插座。此构件构思奇妙，想象力丰富，是精美的造型艺术品（图20）。正间鎏金铜托座：托座由3条蛇相互纠缠构成，造型圆润流畅。

鎏金朱雀铜顶饰：通高26.4厘米，最宽24.5厘米。朱雀昂首展翅翘尾，站立在一个方座之上。自颈以下及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造型优美，富于动感（图21）。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双面造型相同。正中为兽面，双目圆睁，眼珠大且突出，鼻宽而高，鼻梁直贯额顶。张口露齿，上髭中分伸向两边，末端上翘勾卷。头顶生双角，双眉和双耳向外扭曲伸展成相互交缠的卷云纹样，终端是一根圆管形插座。额顶正中向上也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下颚两侧，各向下伸出一个曲尺形插榫，用来插入屏风顶的枋木上。兽形面目狰狞，表情夸张，极富装饰效果（图22）。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器，出土时多锈蚀严重，经过技术人员科学的去锈处理，青铜器的真面目一件件展现在我们面前。青铜器种类繁多，有小如带钩者，有大如提筒者，有素而无纹者，有纹

饰繁缛者，有酒器、炊烤器，也有乐器，兵器和工具等等，有的造型简单但不失优美，有的造型复杂能显示出制造工艺的水准。据冶金学家的鉴定研究，这批青铜器大多数是在南越国铸铜作坊中制作的，主要用的是铸造方法，盆和甬是在铸造成形后又经加热锻打而成，使器壁变薄且均匀。通过对部分青铜器青铜成分的测定，并与中原及楚地青铜器青铜成分进行对比分析，南越王墓出土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应是来自中原和楚地，说明南越国与毗邻的地区以至更远的中原地区保存着紧密的贸易关系。

岁月无情黑锈满身

铁器是将铁矿石冶炼加工制成的器物。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工炼铁的是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居住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中国考古发现最早铁器属于春秋时代，战国时代铁器的使用已很普及。西汉时期，应用铁器的地域更为辽阔，器类和数量显著增加，质量也有很大提高。东汉时期，铁器最终取代了青铜器，成为最主要的金属器具，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也有不少生活用具。铁器的大量使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所以，汉代中央政府十分重视铁矿石的开采、冶炼以及各种铁器的制造。西汉偏居岭南的南越国，由于开发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通过自铸和与北方进行贸易输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的铁器。南越国铁器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多有出土，而出土器类最全、数量最多的还要数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出土铁器约 700 余件，计有剑、戟、矛、钺、铠甲等兵器；铲、耒、锄、耜、镰等农具；锤、镑、凿、削、斧、刻刀、环首刀、刮刀、弯刀、劈刀、铲刀、服刀、刮刨、锉等工具；鼎、叉、钩、链、钎、杵、镊、锥、针、钉、码钉、鱼钩等日用器具。铁器出土时外表多缠裹有丝织品，说明随葬时作了精心的处理。

铠甲

出西耳室，出土时卷作圆筒形，外裹有草席。由于铁甲片锈蚀严重，在墓内不易清理，所以采取整体起取的方法，装箱运至北京，在考古研究所技术室进行复原。复原的程序大致是：先清理掉铠甲外附着的漆皮、朽木、朽席及土垢等杂物，仔细观察铠甲各个部位甲片的组编方法，同时做好摄影、绘图和文字记录；再用纸板制出原大的铠甲复原模型，最后制作出复制件（铠甲锈蚀严重，无法进行去锈后的重新组编，故而只有保持铠甲出土时的原状不变，另外制作复制件）。此件铠甲共有 709 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片体正面略凸起，周边经错磨倒棱。每件甲片上有孔眼 8 个，用于穿系丝带，组编成形。经复原后，此件铠甲无立领，无袖、无垂缘，形状近似现今的坎肩，通高 58 厘米，属于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满城 1 号墓出土了一件铁铠甲，出土时已锈成一团，甲片多已紧紧地粘连在一起。经过去锈后复原，铠甲由甲身（形似坎肩）、短袖、垂缘三部分构成，共用甲片 2859 片。外观呈方领、对襟开口、短袖形，长约 80 厘米，袖长约 34 厘米。这件铠甲比南越王墓出土的铠甲形制复杂，代表了西汉时期北方地方铁铠甲的一般形制。

玉具剑

此墓随葬铁剑共 15 件，其中 5 件为玉具剑，均出自主棺室。5 件玉具剑中，玉剑首、剑格、剑璲、剑珌俱全的只有 2 件，其中 1 件出墓主腰际左侧。此剑残长 164 厘米，鞘为竹胎，外捆缠丝带。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以丝质和麻质的辫带捆缠。4 件玉剑饰中以青黄色玉璲雕刻最精。璲的正面高浮雕群兽，有长尾螭虎、小螭虎和小熊，形态十分生动。

错金银铜筒铁矛

出主棺室。矛铁质，与鞘锈蚀在一起。鞘竹胎，外缠丝绢，髹漆。筒铜

质，鎏金，正背两面都有金、银错的套叠式三角形图案纹样，两侧金、银错流云纹，装饰非常华丽。秘竹质，已朽，末端附件铜镞满身饰以错金、银的流云纹图案。装饰如此华美的铁矛或是南越王自用，或是用于仪仗。

鼎

出后藏室。鼎身鼓圆如罐，三蹄足瘦长。上腹对称附半环形耳，耳内衔圆环。此鼎造型不同于中原的汉式鼎，颇具地方特色，是目前岭南仅见的、最大的铸铁容器，对于研究岭南冶铁铸铁手工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据研究，南越国并没有自己的冶铁业，其铁器一部分通过贸易由中原地区输入，一部分由中原地区输入铁板原料，在本地加工制造（如上述铁鼎）。没有冶铁业，就无法制造出大量的铁工具，这无疑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岭南地区的开发进程应该还是比较缓慢的。

精雕细琢巧夺天工

玉器是以各种玉石原料，经过采矿、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抛光、刻款等工序制成的玉石制品。玉石原料分软玉、硬玉、碧玉、蛇纹石、水晶、玉髓等。玉石器种类繁多，依其用途可分为礼仪用玉、葬玉、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器（包括印章、文房用具等）、工具和艺术品等。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已知欧洲、亚洲、美洲及新西兰等地均出产玉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开始制作玉器。在欧洲的一些地区，早在原始社会即以玉石制作工具。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玉材分布较广，其中最主要的古玉产地有新疆于田和叶尔羌的和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和辽宁的岫岩玉，此外还有陕西蓝田玉等。

汉代玉器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一个过渡阶段。玉器种类较商周时期变化较大，礼仪用玉大量减少，葬玉和玉装饰品、日用品增多。治玉技法也有所改进，除了保留商周时期在扁平玉片上施加浅浮雕纹饰的技法外，汉代玉器中高浮雕和圆雕图案增多了。镂孔花纹和细刻线纹也增多了。玉器表面抛光技术进一步提高。汉代玉器的花纹大致可分为几何纹和动物纹两大类。几何纹如有涡纹、卷云纹、谷纹和蒲纹，动物纹如有龙纹、兽纹、凤鸟纹和兽面纹等。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以其数量大、种类多、制作精而闻名于世。1991年12月6日开始，以“南越王墓玉器选萃”为标题，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出了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珍品68件（套），展期73天，轰动了整个香港。在此展览前几天，《南越王墓玉器》彩版图录由香港两木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越王墓玉器共计240多件，计有璧等礼仪用玉，玉衣、鼻塞等葬玉，璜、珮、韞、觿、舞人、组玉佩等装饰品，角杯、铜框玉盖杯、铜框玉卮。承盘高足玉杯、盒、带钩、印章等日用品，剑首、格、璲、秘等剑饰。其中大部分玉器选料精良，造型匀称，花纹流畅，是汉代玉器中的上乘之作。

葬玉——丝缕玉衣

我们在阅读有关汉代历史的文献时，经常会碰到“玉衣”这个名词。顾名思义，玉衣是用玉制作的衣服，是汉代皇帝、诸侯王、列侯等高级贵族死后穿着的殓服。在考古发掘出土玉衣实物前，无人知晓其真实面貌。1968年，在发掘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窦绾的陵墓时，出土了两套完整的玉衣，玉衣的形制大白于天下。

玉衣是作为墓主身着的殓服随葬的，所以均出自墓葬之中。到目前为止，出土有玉衣的两汉（西汉和东汉）墓葬共有三十多座，多数墓葬因被盗掘，致使玉衣散乱不完整，无法复原。其中保存完整的玉衣共出土了十余套，尤以河北省内出土最多，共7套，都是各代中山王及王后穿着的（西汉3套，东汉4套），江苏徐州土山东汉墓出土了一套玉衣，墓主应是彭城王。安徽亳县董园村一号汉墓出土了两套玉衣，据考证其墓主为东汉时期费亭侯曹腾夫妇。

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用玉，东汉灭亡后，玉衣也随着退出了历史舞台，销声匿迹了。在汉代以前，虽然没有出土形制如同汉代的真正的玉衣，但在考古发掘中，不止一次地在东周墓葬中发现缀玉面罩和缀玉衣服。缀玉面罩是将制成眉、眼、鼻、口等五官形状的玉石片缀附在织物上，覆盖在死者的脸部，这可能是汉代玉衣头罩脸盖部分的前身。缀

玉衣服是将形状各异的玉石片缝缀在死者所穿的织物敛服上，这或许是汉代玉衣的前身。总之，汉代玉衣的出现不会是突然的，在形制完整的玉衣出现以前，应该有一个长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玉衣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发现的缀玉面罩和缀玉衣服。

汉代的玉衣起源虽可追溯到东周时期的缀玉面罩和缀玉衣服，但就玉衣的形制、用途、寓意及其所代表的等级制度来看，与缀玉面罩、衣服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汉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各项制度多承秦制，到文景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的礼制，包括丧葬方面的礼制也开始着手制定。从考古资料来看，位于河北石家庄北郊小沿村的西汉初年赵景王张耳墓没有发现使用玉衣的痕迹。文景时期的王侯墓共发掘了十余座，出土有玉衣片的墓只有4座。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玉衣做为汉代新制定的丧葬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应该开始使用于文景时期；二是文景时期正因为玉衣刚刚开始使用，玉衣的使用很不普遍。

汉代玉衣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备的，也有一个从不完备到完备的演变过程。西汉早期的玉衣，能够复原的只有山东临沂刘疵墓出土的一套。这套玉衣由面罩、帽、手套（两只）和鞋（两只）共6部分组成，分别套罩在头部、两手和双脚上，其用意似乎在于以点代面，即用身体最末端的几个点来代替全身，起到象征性的作用。西汉早期出现这种不完备的玉衣形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认为这是玉衣的早期形制，玉衣的完善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或认为刘疵的身分不高，还不配戴形制完备的玉衣。当然，这些看法都是能够解释得通的，但不应忽视的原因至少还有两个，即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玉料来源。西汉早期，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国力较弱，财政匮乏。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到文帝、景帝之时虽然国力有所增强，但并没有达到富庶的程度。在这样的国力条件下，制作出玉衣的局部，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对要少得多。同时，用局部象征全部，又可以满足丧葬礼制的需要。另外，制作一件完整的玉衣需要大量的玉材，而西汉早期玉材矿的开采是很有限的。据地质矿物学家的研究，汉代玉料绝大多数是来自今新疆境内的和田玉，其次还有今辽宁境内的岫(xiù)岩玉。当时中原地区虽然河南南阳有玉矿藏分布，但可能还没有进入实际的开采阶段。所以，不管制作何种玉器，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要从和田和岫岩输入玉材。西汉早期，和田偏居西域，岫岩又远在东北，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在这两个地区可能尚不能行使强有力的统治，这不能不影响到玉料的大量开采及向内地输入。汉武帝时期，著名的外交军事家张骞奉命出使西域，最后终于建立起了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关系，并在此地区逐步实施了有效的统治。这样，大量和田玉的开采并通过贯通中西的著名的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才成为可能。因此可以说，西汉早期玉衣呈不完整的局部形象，可能与玉料的缺乏有直接的关系。刘疵身着不完整的玉衣，有的玉衣片还有用其他残玉器改制的现象，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时用于制作玉衣的玉料是不充足的。

从武帝开始，西汉中期的玉衣形制已很完备。已经复原的满城汉墓和定县40号汉墓的三套玉衣，形制基本相同，都由头部（脸盖和头罩）、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手套、裤筒和鞋组成。这种形制的玉衣一直沿用到东汉末年。南越王墓出土的一套玉衣经复原后，形制基本如此。

南越王墓墓主是否身着玉衣，发掘前这还是一个谜。南越国偏居岭南一

隅，其丧葬制度也许与中原有别。当时，与南越国相邻的长沙国，从已发掘的长沙王、王后墓（长沙象鼻嘴1号汉墓和陡壁山汉墓）及软侯利苍家族墓（长沙马王堆汉墓）来看，墓主都没有穿着玉衣殓服。或可认为，南越王墓墓主身着玉衣的可能性也许并不大。当墓内前室和左、右耳室发掘结束后，主棺室的发掘随即展开了。9月20日，主棺室的清理工作刚刚开始，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一块四角钻有小孔的薄玉片，富于发掘经验和文物知识的工作人员认定，这是个重要的信息，表明墓主一定身着玉衣殓服。这一推测很快就被证实了。9月28日，在将玉衣周围的器物清理起取完毕后，用“竹签插取套装”的办法，将玉衣整取入一大木箱内，次日将装有玉衣的木箱从墓室中搬出，暂放\发掘工地临时库房。1984年春季，这件木箱又长途跋涉运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年7月31日开箱整理（图23）。

此件玉衣出土时，墓室底部的铺板及棺椁全朽，玉衣直接平贴到岩石地面上。另外，墓主尸体腐朽后，原来呈立体形状的玉衣整体已塌陷呈扁平状，并略向南移位。再者，由于玉衣是用丝线和丝带连缀成的，丝线、丝带朽断后，玉片散乱得异常严重。这给玉衣的修整复原工作带来了诸多麻烦和困难。幸而玉衣各部位的大致情况仍可分辨出来。经过长时间的科学复原，玉衣各部位的情况如下：

头套。共用玉片265片，以丝线连缀，并在背面贴衬丝绢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圆璧形、梯形、三角形、近方形、长方形和五边形。头套由头罩和面罩扣合而成。头罩顶部以一璧形玉片为中心，作成圆弧形。面罩鼻部隆起，口部露一细缝，下巴尖圆，略具写实的风格。

上衣。由衣身和两袖组成。用丝带纵横交叉将玉片粘接在一起，并在背面贴衬麻布固定而成。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和不规则形，均无孔眼。衣身共用玉片537片，由前身片和后身片组成，呈对襟形式。在下部前后身片对接处皆有开口，有如衣服下摆的“开气”。两袖均呈筒形，上粗下细体扁且弯，左袖用玉片215片，右袖用209片。

裤筒。分左右裤筒，均呈上粗下细的筒形，制作方法与上衣相同。左裤筒用玉片266片，右裤筒用388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不规则形。

手套。左右手套结构均如手形，由手背、掌心和五指组成。拇指伸直，其余四指并拢弯曲作握拳状。左手共用玉片113片，右手121片。玉片的连缀方法与头套相同。玉片形状有方形、长方形、五边形、梯形、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

鞋。左右鞋形态近似，均由底板、前脸、脚面、左右侧帮和后跟六部分组成。左鞋共用玉片108片，右鞋用109片。玉片形状有长方形、梯形、方形、三角形和不规则形。玉片的连缀方法与头套相同。

复原后的玉衣，由头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手套、左右裤筒和左右鞋共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2291片玉片。玉质只有少数呈略透明的青白玉，多数玉质差，不透明，颜色较杂，多呈黄褐、黄白色，玉片形状以长方形和方形为主，另有梯形、三角形、五边形和圆璧形等。玉片间的连接方法有两种，其中头套、手套和鞋的玉片两面打磨光滑，边角钻有小孔，用朱红色丝线通过小孔将玉片连缀起来，并在里面衬贴丝绢加固，待部件全部连缀完后，在边缘部位还要用丝织物缝合包边。上衣、袖筒和裤筒所用玉片多是废旧玉器或边角料切割而成，厚薄不均，无孔。连缀方法是在玉片表

面用窄朱红色丝带对角粘贴，均成菱形网格状纹样，四边再用宽朱红色丝带粘贴成方格状。朱红色丝带纵横交错，构成多重几何形纹样，色泽异常鲜艳。

东汉时期的玉衣，以徐州土山汉墓出土的一套为例，仍由头部（脸盖和头罩）、上衣（前片和后片）、左右袖筒、手套、裤筒和鞋组成，同西汉中晚期玉衣的形制基本相同。两汉玉衣是在什么地方制造的？文献中没有记载。从出土的玉衣资料来分析，可能存在中央和地方同时制作，两级作坊并存的局面。西汉早期，玉衣开始制作，并日益成为治玉作坊中一个长期固定的品种。此时期玉衣形制简单，使用不普及，用量不大，可能主要在中央一级玉器作坊中生产。除制作皇帝使用的玉衣外，还将玉衣赏赐给诸侯王、列侯以及一些国家重臣。玉衣的制作需要大量的玉料、治玉工具及技术熟练的雕玉工匠，所以地方玉器作坊尚不具备这些条件。从出土的属于西汉早期的玉衣资料看，江苏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片，有少数是用谷纹或蟠螭纹璧改制的；山东临沂刘疵墓，出土的玉面罩、玉帽、玉手套、玉鞋等所用玉片，有的背面有纹饰痕迹，也是用玉璧、玉佩等改制而成的。这种用废旧残破或在雕琢过程中致残的废品改制玉衣片的情况或可说明，玉衣是同其他玉制品，如用作礼器的璧和用于装饰的佩等在一起制作生产的，这样生产多种产品的玉器作坊规模一定较大，应该是中央级的作坊。西汉中晚期，玉衣的形制趋于完备，使用也普及开来，不仅制作单件玉衣的工作量大大增加了，玉衣的数量也增加了许多。当然，中央玉器作坊的规模肯定是要扩大的，这里生产的玉衣除了供皇帝自用外，还大量赏赐给王侯贵人。满城陵山刘胜夫妇身着的玉衣，在有些玉片的背面残存有玉璧纹饰，显然是利用废弃的玉璧改制成的。玉衣头罩顶部还使用了玉环，玉衣手套中握的璜形玉器，是用玉璧改制的，刘胜玉衣用于罩生殖器用的小玉盒是由玉琮改制成的。这些情况都说明玉衣仍同其他玉制品同作坊生产，作坊规模相当大，应属于中央一级的玉器作坊。河北定县 40 号墓

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玉衣，因为玉衣过大，不合死者身材，死者穿着时不得不把裤筒下部过长的部分拆下，垫盖在死者腰部的上下。这件与死者身材不符的大号玉衣，说明是在中央作坊制作的。中央作坊生产的玉衣规格是统一的，可能是按当时一般人的身高、胸围、腰围制定的规格。拥有这件玉衣的主人可能比较矮小，所以玉衣就显得肥大了。如果在当地作坊制作，量体裁衣，制作出来的玉衣应该会比较合身的。

西汉中晚期，因玉衣的使用数量剧增，单中央作坊生产的玉衣不一定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因此，地方上，特别是国力强大的诸侯国拥有自己的玉衣作坊是可能的。江苏扬州“妾莫书”西汉晚期墓出土了近 600 片琉璃衣片，有长方形、梯形、三角形、圆形等 14 种形状，在圆形及少数长方形片面模印蟠螭纹饰、长方形片的纹饰中心还有四瓣形花一朵，少数花蕊上还饰有金箔。这些琉璃衣片当是用于模仿玉衣制作琉璃衣的，其用途应与玉衣相仿。像这种玻璃衣应是地方作坊的产品。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衣比较有趣，其头部、手部和足部的玉片玉质较好，琢磨质量较高，玉片四角钻有小孔，以丝线编缀成形。其他部位的玉片玉质差，琢磨不好，并且是用丝带粘附固定的，显然与头、手和足部在质量和编缀方法上有明显差别。有人据此推测，这套玉衣头部、手部和足部可能是从西汉朝廷或内地地方作坊输入的，而其他部位则有可能是在南越国补配的。这种看法虽不无道理，但仍有可疑之处。南越王墓出土了大量玉器，非常精

美，其中一部分可能来自中原，但至少有一部分应是在当地制作的，说明南越国的琢玉工艺是很发达的。而这套玉衣的制作却非常粗糙，与其他同出的精美的玉制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这套玉衣究竟是在何处制作完成的，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东汉时期玉衣制作的情况与西汉中晚期大致相同，除了中央拥有庞大的玉衣生产作坊外，地方上也应有玉衣作坊。河北定县北庄东汉早期中山王墓所出玉衣的部分玉片的背面墨书有“中山”二字，说明这套玉衣是在中央作坊专门为中山王制作的，为了便于区分，工匠们才在玉片的背面书写上“中山”字样。同时，东汉中晚期墓中出土有数套用汉白玉和白色大理石制成的石衣，这种模仿玉衣使用的石衣，应是在地方作坊制作的。

玉衣的使用，是有一定等级限制的，并不是大官小官都可以任意穿着的。当然，它的使用制度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备、就定型了。西汉时期，根据文献记载，皇帝和王侯的玉衣都可以使用金缕（用金丝编缀的玉衣）。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西汉时期诸侯王多用金缕，极个别用银缕，没有使用铜缕的；列侯有用金缕，也有用银缕和铜缕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属首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发现，应属特殊情况。虽然西汉时期有关缕质的等级规定并不十分严格，但并不能说此时期没有等级上的差别。从大的方面来说，没有一定的身分地位就不能使用玉衣，这就是等级规定。从小的方面来看，也能大致看出诸侯王与列侯的等级差别。诸侯王几乎全用金缕（偶有用银缕的），而列侯则金缕、银缕、铜缕都用，并且银缕和铜缕的数量之和要大于金缕。

东汉时期，玉衣关于缕质的使用制度基本上定型了。文献记载，皇帝使用金缕，诸侯王和始封的列侯、贵人、公主使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使用铜缕。可见堂而皇之使用玉衣的多是皇室成员。非皇室成员，虽贵为列侯也不得随意使用，除非得到皇帝的恩赐。考古发掘出土的玉衣资料所反映的等级制度与文献记载大致相符。

两汉玉衣，有的在玉片上饰以各种图案。河北邢台南郊汉墓出土的 200 多片玉片中有一半左右雕刻柿蒂纹或云纹，纹饰镶嵌金丝、金箔片，显得更加华美。江苏扬州甘泉山汉墓出土的玉片中，有的刻蟠虺纹和贴饰金片。可见，就像在衣服上绣花一样，玉衣上也可以刻饰各种图案。

玉衣使用的下限在东汉末，三国时期墓葬中尚未发现玉衣。这当与魏文帝曹丕的禁止有关。文献记载，曹魏黄初三年（公元 222 年），曹丕作《终制》，鉴于陵墓被盗后“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的情况，禁止使用“珠襦玉匣”（玉匣即玉衣）。

礼仪用玉——璧

玉璧是正中有圆孔的薄圆形玉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有发现，商周时期数量增加。这一时期的玉璧多素面，有的饰以简单的纹饰。战国时期已出现外缘有透雕动物纹附饰的玉璧，到汉代，这一类玉璧进一步发展起来。

南越王墓出土各种式样的玉璧共 56 件，仅主棺室就出土 47 件。璧面有大小之分，纹饰有繁简之别。

（1）大玉璧出主棺室头箱内，出土时盛于一漆奁中，是本墓所出玉璧中最大的一件，直径 33.4 厘米。此璧为青玉质，璧面纹饰可分三区，外区饰双身龙纹 7 组，中区为排列整齐有序的涡纹，内区饰 3 组双身龙纹。纹饰疏密得当，琢刻精致，显得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此璧是目前已知考古发掘

出土玉璧中形体最大、琢饰龙纹最多的一块，可称为“璧中之王”。

(2) 透雕重圈三龙衔环璧出主棺室棺内。其位置当墓主尸体阴部。直径9.6厘米。青白玉，玉质坚致，土浸部分呈黄白色或白色斑纹。外圈饰涡纹，内圈饰三龙，龙首伸入到外圈成为内外两圈的连接点。此璧整体构思设计巧妙，琢刻亦精。

(3) 透雕龙纹玉璧出主棺室墓主玉衣头罩上，直径8.8厘米。青玉，湖绿色，玉质极佳，莹润透亮。璧的中心圆孔内双面透雕一游龙，两面饰浅浮雕涡纹。龙昂首挺胸，曲身卷尾，四爪着地有力，好像正要努力挣脱圆孔的束缚一样，造型生动传神。

(4) 透雕龙凤涡纹玉璧出主棺室墓主身上，是组玉佩中的一件。直径7.2厘米，青玉质、略软，土浸呈灰黄色。双面饰浅浮雕涡纹，中心圆孔内蜗居一姿态矫健、栩栩如生的透雕游龙，两侧各连一透雕凤鸟，凤鸟回首曳尾攀附壁上。龙、凤造型圆润丰满，琢刻线条准确流畅，富于动感。

(5) 兽首衔璧出主棺室。青玉质，通体浸蚀呈鸡骨白色。通长16.7厘米、宽13.8厘米。整块玉材雕出。兽首近方形，双目圆睁，狰狞可怖，左侧连一透雕螭虎，呈不对称布局。兽鼻琢刻成长方形环，与璧上端相应琢出的方孔相套接，还可前后摆动。壁面饰浅浮雕涡纹。

此件玉器构思极妙，全器采用透雕、浅浮雕和线雕三种技法琢刻而成，刻工精湛。上半部分兽首螭虎呈不对称布局，是南越国玉器的一大特色。此件玉器系当玉佩使用（图24）。

(6) 双连玉璧出主棺室墓主玉衣双鞋的下方，原来可能用丝带捆绑于鞋底。宽12.3厘米、高7.4厘米。由两个涡纹玉璧外切相连，顶端饰一组透雕卷云纹，下端饰一对凤鸟纹。卷云纹和凤鸟纹左右对称，体态丰满，很富装饰效果，又起到了连接加固双璧的作用。整器既工整，又有变化。据推测，璧在古代是祭天的礼器，墓主双脚踏着双连璧，可能有乘驾双凤升天之意。

日用品

汉代以前，玉器主要是礼仪用玉、装饰品和美术品等，缺少日常生活用器皿。汉代玉器虽然日用品增多，但多是带钩、印章等小件物品。南越王墓除了小件日常用玉器外，还出土了玉盒、玉盖杯、玉卮、高足杯和角杯等较大件的玉器皿，这在汉代墓葬考古中是罕见的。这几件玉器皿，有的是纯玉制品，有的是与青铜工艺相结合的复合制品，工艺精湛，造型美观，是汉玉中价值连城的孤绝品。

(1) 玉角杯出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外裹丝绢。以整玉琢成，青玉质，半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斑。外形像一只号角，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6.7厘米，往下渐收，近底处成卷索状，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主纹饰自口沿处浅浮雕一立姿龙，向下展开绕杯身回环卷缠，渐高起作高浮雕状，及底部成为圆雕。在主纹饰中间，用单线的勾连云雷纹填补空白。此角杯构思极妙，制作尤精，装饰纹样采用阴线刻、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等技法，主纹突出，次纹补白，是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珍品，为汉玉中的稀世之宝。此杯应是南越王自用的饮酒器具。

(2) 玉盒出主棺室，出土时盛于漆盒中。青玉，呈青黄色，局部有黄褐色斑。高7.7厘米。盒身鼓圆，往下渐收，底有小圈足。盖隆起呈漫圆形，顶饰桥形立钮，钮内贯绞索纹圆环，可转动。盖边缘曾破裂过，后经钻孔用

丝线连缀修复。盖面纹饰以宽带纹为界分为三区，内区为八瓣柿蒂形的浅浮雕纹，中区为单线勾连雷纹，外区是勾连雷纹与瓣状纹组合。器盖里以单线勾勒两凤鸟，线条纤细流畅。器身纹饰与盖面相似。整体纹饰构图严谨，雕镂精细，打磨光洁，是一件精雕细刻的玉器绝品（图 26）。

（3）铜框玉盖杯出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外裹多层丝绢。高 16 厘米。杯分杯身和杯盖两部分，杯体呈八棱筒形，上大下小，底部为喇叭形座。杯身先以青铜铸出栅栏形框

架，鎏金，框内有浅槽，分上下两截，上截杯身周围共用 8 块长条形薄青玉片嵌入铜框内，下截杯底周围嵌入 5 块心形青玉片。杯盖圆形隆起，也是先铸出青铜外沿，鎏金，再于盖顶处镶嵌一块圆形青玉，雕琢成螺旋纹形。此器是铸铜、鎏金、治玉与镶嵌工艺完美结合的产物，代表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在考古发掘中系首次发现（图 27）。

（4）铜框玉卮出于西侧室，出土时外裹多层丝绢，高 14 厘米。由卮身和盖组成。整体呈九棱圆筒形，下附三兽首形短足。卮身是先制成鎏金铜框，再用 9 块长条形玉片镶嵌。卮平底，在圆形铜框内嵌入一块圆玉片。卮身上部嵌入圆环形玉璧。卮盖圆形，以木制成，外涂黑漆，上以朱漆绘制线纹，周边镶嵌 3 个弯月形玉饰。卮身玉片质坚色青，浮雕勾连谷纹。卮身铜框饰兽形与几何形纹。此器的制作与铜框玉盖杯相比，还多了一种髹漆工艺，可以说工艺更为复杂（图 28）。

（5）承盘高足玉杯出主棺室，出土时以丝绢裹缠，通高 17 厘米。由高足青玉杯、托架和铜承盘三部分组成。

高足杯由杯身与座足组成。杯身圆筒形，上大下小，圆底，上下饰叶瓣纹，中间饰勾连云纹。座足呈灯把形，饰以叶瓣纹。杯身与座足系用两块青玉分别雕琢而成，然后在杯身底部与座足上部连接处钻孔以小竹条贯穿连接。玉杯高 11.75 厘米。

托架由三龙共衔一块中心接有圆孔的花瓣形玉片组成。玉片中心的圆孔径正与玉杯下部吻合，玉片外沿透雕成三大三小共 6 瓣花、花面饰勾连云雷纹。三龙皆金首银身，张口各衔一瓣小花，共同托承玉杯。龙体的末端固定在托架底部的扁圆形铜圈上，铜圈又平置在铜承盘沿上。

铜承盘宽平沿，浅腹、平底，下附三个铺首形足。盘腹外壁贴饰三个用银铸制的小铺首。高 6.6 厘米。

这件承盘高足玉杯有着极复杂的套接关系，铺首形足与承盘底，小银铺首与承盘壁，三龙尾与托架圆圈形底，三龙首与花瓣形玉片，花瓣形玉片与玉杯，玉杯身与座足等，或焊接、或铆接、或榫卯套接。完成这样一件器物，需要预先做出完美的设计，更需要准确到位的制作以及精心的套接，没有青铜、金银、治玉等工艺方面的能工巧匠通力合作，就不可能完成构思如此奇妙的旷世之作（图 29）。

（6）带钩共 4 件，皆精美华丽，出自主棺室“头箱”中，出土时均外裹丝绢。

龙头形玉带钩两件成对，形制全同。长 15.1 厘米。青玉质，青黄色半透明，玉质细腻温润。钩体呈细长条形，满饰勾连雷纹，好像鳞片一样。首尾均作龙头形。钮作矮圆柱形。雕工十分精湛。

圆雕龙虎玉带钩青玉质，局部有深褐色斑。长 19.5 厘米。通体圆雕，龙虎并体形，共分 8 节。钩首龙头和钩尾虎头两节做出圆卵，中间六节有圆孔

贯通，中心用铁条将8节串连组合而成。主纹是虎形，虎头宽扁，鼓目露齿，四爪着地有力，好像与龙一起奔腾在风云之间，不管在造型上，还是在治玉工艺方面，都属上乘之作。

龙虎拥环带钩青玉质，半透明，晶莹光洁，局部有褐色斑。长18.9厘米。全器由一块整玉雕成。钩首呈虎头形，末端作龙首形，虎龙双体并列，弯曲呈S形。钩中上部透雕一环，龙张口啣环，虎伸爪攫环，形象栩栩如生。钩体表面及圆环均饰勾连雷纹。钮扁圆形，钮柱为圆柱体。此带钩构思新奇，雕琢精细，是玉带钩中的精品。

(7) 觶共两件，出主棺室墓主玉衣左右手中。左手握着的觶是细长龙形，长9.5厘米。一面浅浮雕卷云纹，另一面用阴线勾勒。此件龙形觶厚只有0.1~0.2厘米，是南越王墓玉器中最薄的一件。右手握着的觶呈卷龙形，长7.2厘米，造型简洁流畅，姿态卷曲优美。

(s) 玉印共9枚，其中6枚无文字。3枚有字玉印皆出主棺室墓主身上。“赵昧”玉印方形，覆斗形钮，印文为阴刻“赵昧”二字，有边栏和竖界。“泰子”玉印亦方形，覆斗形钮，印文为阴刻“泰子”二字，篆体，无边栏和竖界。“帝印”玉印方形，螭虎钮，螭虎四周刻云气纹，印文为阴刻篆体“帝印”二字，有边栏和竖界。

“赵昧”玉印是墓主的姓名印章。此墓为南越国第二代王的陵墓已有确凿的证据，“文帝行玺”龙钮金印便是最直接的物证。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文献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姓赵名胡，与此墓所出“赵昧”不符合。经过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认为造成“昧”、“胡”不符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是由于史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是因为第二代南越王一人二名，一个越名，一个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歧议；或出于音义通假。总之，此墓为第二代南越王的陵墓是无疑的。

“泰子”玉印与“泰子”金印应同属一人之印。据考证，这枚“泰子”玉印是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子，亦即第二代南越王赵昧（赵胡）之父的印章。赵昧死后，第三代南越王婴齐将之与“泰子”金印一起放入墓中。

“帝印”玉印意思是皇帝之印，应是赵昧自制之印。这枚帝印也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之一。

装饰品是玉器中出现最早、式样最多、最富于变化和最具活力的品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器多以小件装饰品的面目出现。由于人类具有追求美的天性，玉石又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所以佩戴玉质装饰品成为古代达官贵人们追求的时尚。商周、秦汉时期的玉饰品，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计有璜、环、珮、玦、韞、舞人、组玉佩等130余件。

(1) 犀形玉璜

出主棺室，是墓主人组玉佩中的一件。长8.5厘米。玉质坚密，呈黄白色。整体作透雕犀形，犀低头弓身，口张，吻长，吻上长角弯曲。

长尾下垂又优美地向上回卷，与长吻前后对应。前后肢蹲曲。腰间浮雕出较稀疏的涡纹。腰处正中有圆形穿孔，用于系绳。整件作品表现的是犀牛呈蹲曲小憩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命活力。

(2) 双龙纹玉璜

出主棺室，也是墓主人组玉佩中的一件。长14.2厘米。玉质紧密、呈

青白色。璜体呈弧形，两端雕出对称的龙头，中间浅雕出蒲纹，顶部上沿饰一组透雕云纹，云纹上端穿一圆孔；顶部下沿也饰有一组透雕云纹。龙头张口鼓目，形象生动。

（3）透雕龙螭纹玉环

出东侧室，是右夫人B组玉佩中的一件。直径9厘米。玉质坚硬，局部水浸。双面透雕二龙二兽互相缠绕成环形。龙闭口鼓目，兽尖嘴鼓目，双耳竖起，龙、兽身均瘦长弯曲。整体作品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线刻准确细腻，具有玲珑剔透，精巧别致之美。

（4）透雕龙凤纹重环佩

出主棺室。玉质坚硬，青白色，上浸呈浅褐色斑。直径10.6厘米。外形像壁，中心圆孔处饰一龙作腾飞游动状，两爪及卷尾伸向壁面。壁面透雕一凤鸟，体态轻盈，立于龙爪之上，回眸与龙对视，鸟冠及尾羽均作夸张的卷云纹，与龙爪龙尾一起填满壁面。美丽的凤鸟在回首鸣叫，矫健的游龙在奋力腾跃。整幅画面布局得当，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实乃玉饰中的精品。

（5）连体双龙玉佩

出于东侧室，是右夫人A组玉佩中的一件。横长10.2厘米。玉质坚硬，呈黄白色。平面略呈椭圆形，以二龙联体构成，龙身上部双面透雕，龙首相对，张口瞪目居内。龙下身环绕外周，双面饰涡纹。二龙之间为一戴尖冠的兽首，二龙前爪及胸部分别拥抓住兽首。在玉佩周边分布有五个穿孔，用以系绳。此件作品构思也很奇特。

（6）凤纹牌形玉佩

出主棺室。长14厘米、宽7.4厘米。青玉质，水浸呈鸡骨白色。构思的主体部分应是中间的长方框，其下端曾经折断，为了能够继续使用，特意用黄金铸制成两个构件，用来连接上下两个断口。长方框内透雕一变形凤鸟纹，框外上端透雕一简化了的凤鸟纹，下端连着一高冠卷尾的变形凤鸟纹，其前爪向上抵到左边框内凤鸟的头顶。框外左侧透雕璎珞一串，其上立一变形小凤鸟，右侧上端透雕一昂首挺胸、张口振翅的凤鸟，双足踩着玉璧的上缘，长尾下垂回卷托住玉璧的下缘，玉璧面及框下凤鸟身上满饰涡纹。

此件玉雕作品，构图以长方框为中心，其内其外四面各饰一大小、简繁不同、姿态形象各异的凤鸟纹，其左右两侧还饰以璎珞和涡纹玉璧，形成上下左右不对称的纹饰布局，别具匠心，属汉玉中的稀世之宝。南越王赵昧生前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玉佩，当他不小心将玉佩跌断成两截后，还用特制的黄金构件加以连接修固，使玉佩更显得光彩照人。

（7）金钩玉龙

出于主棺室。金钩长5.9厘米、玉龙长11.5厘米。青玉质，因土浸呈灰白色，由一玉龙和一金质虎头带钩组合而成，好似猛虎噬龙。玉龙回首勾尾，呈S形。近尾处已折断，在断口的两边各钻3个小圆孔，用丝线连缀，说明此器亦为南越王赵昧生前喜欢佩戴的饰品。金带钩单铸成，钩首钩尾均作虎头形。钩尾虎头双眉上扬，额顶刻一“王”字。钩尾虎头下铸成一大一小与龙尾相仿的长方形孔。出土时玉龙的尾端套入孔中。如果龙尾没有折断，从卷曲的龙尾末端无法直接套入孔中，说明金钩是在玉龙折断后特别制作，从龙

尾折断处套人与玉龙相配的，看来，工匠们真花费了不少的心思。

(8) 赵昧组玉佩

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清理玉衣时，发现玉衣上面从胸部到腹下散布有玉璧、玉璜，玉人和金、玉、玻璃珠等许多件饰品，有的饰品上还留有丝绢带穿系的痕迹，表明这是一串大型的组玉佩饰。经过认真的观察记录，根据各单件饰品出土时的位置、形状大小以及残留的丝带痕迹，这组玉佩饰幸而得以复原。复原后的组玉佩由 32 件质地不同的器件组成，计有双凤涡纹璧、龙凤涡纹璧（前已介绍）、犀形璜（前已介绍）、双龙纹璜（前已介绍）各一件，玉人 4 件，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 1 件，玉珠 5 粒，玉套环 1 件，玻璃珠 4 粒，煤精球 2 粒，金珠 10 颗。复原的结果是，两玉璧和两玉璜，小的在上，大的居下，把整串玉佩分为四个组段，其余的金、玉、玻璃等 28 件小饰物分别串配其中。南越王墓共出土了 11 套组玉佩，复原了三套。这套墓主人赵昧的组玉佩是其中最大、也是最豪华的一套。

双凤涡纹璧：青玉，质略软，灰黄色，直径 6.9 厘米，双面涡纹，下方两侧各透雕一凤鸟纹。璧的上下方各有一个圆孔。此璧居组玉佩最上方，上孔用于佩挂，下孔用以串接其它饰品。

玉人：跪坐，平顶，头部五官及衣服用细线纹勾勒出，双手合拢置于腰间。自头顶当中穿孔，用以系线。复原后的这组玉佩，长度约 60 厘米。各种质地的佩饰杂陈其间，各种颜色交相辉映，显得异常恢宏气派。如此繁杂的组玉佩平时佩带多有不便，可能遇到重大的国事活动，如祭祀、庆典时方拿出来佩戴，以示隆重。（9）右夫人 A 组玉佩（图 35）出东侧室右夫人棺位处，与“右夫人玺”金印同出。由连体双龙佩（前已介绍）1 件、玉环 2 件、三凤涡纹璧 1 件、玉璜 5 件以及玻璃珠 1 粒、金珠 10 颗共 20 件器件组成。玉质一般多呈灰白或歪白色。

三凤纹璧：外径 5.7 厘米。中心圆孔较大，璧双面饰涡纹，周边透雕三只凤纹，大小不一，间距不等，姿态各异。其中有二只凤鸟折身向后，首尾相连，好像现今折腰衔杯的杂技动作一样。另一只凤鸟作回首张望状。此璧璧面较窄，凤鸟纹较瘦长，整体风格小巧精致。

璜：上面的一件通体透雕四龙纹，长 8.5 厘米；中间的两件两端透雕龙首，龙身饰卷云纹，长 7 厘米；下面的 2 件双面饰涡纹，长 9.4 厘米。

右夫人在殉葬的四位夫人中地位最高，其佩戴的组玉佩在四位夫人中也最精美，且不止一套。下面再介绍一下右夫人 B 组玉佩。

(10) 右夫人 B 组玉佩（图 36）

出东侧室右夫人棺位西侧，计有玉环、玉璜、玉管各 2 件，玉舞人 1 件，共 7 件器件。玉质坚硬。

环：下面的一件前面已介绍过，上面的一件双面透雕三龙首尾衔接，龙体为绞索形纹，龙鳍与爪作卷云纹。直径 7.4 厘米。

舞人：用扁平小玉片透雕而成，高 4.9 厘米。着长袖连衣曳地长裙，头戴花饰，右手扬袖至头顶，袖端回卷，左手弯曲置于细腰前，袖端下垂。腰带上系挂有一环一璜的组佩饰，末端飘带呈燕尾形。舞人整体呈倾斜状不稳定造型，好像是一套单人舞蹈中的一个定格镜头。

透过舞人的轻盈舞姿，不难想象到南越王宫宴饮时轻歌曼舞的热闹场景。

璜：上面的一件玉质坚硬，色青中泛白，长 12.4 厘米。璜两端作龙首形，双面饰小卷云纹，两端及顶上各有一圆孔。下面的一件双面刻涡纹，顶上有一穿孔。管：长 6.5 厘米，圆柱形，中有孔，管周身满饰浅浮雕涡纹。

(11) 左夫人组玉佩(图 37) 出东侧室“左夫人印”鎏金铜印附近。由玉璧 1 件、玉璜 3 件、玉片饰 1 件、玉佩 1 件和花蕾形玉饰 1 件组成。此组玉佩的质量不如右夫人的二组玉佩，但又比泰夫人和部夫人的组玉佩好，与左夫人的身分地位相符合。

璧：外径 8.6 厘米，双面满饰蒲纹。

璜：上面的一件长 7.5 厘米，一端雕成龙首形，另一端呈榫头状，双面饰涡纹。中间的一件长 11 厘米，双面饰勾连云纹。下面的一件长 17.6 厘米，两面饰涡纹。

片饰：椭圆形，两面饰谷纹。

花蕾形佩：长 6.3 厘米。整体好像一含苞待放的花蕾。一侧透雕一凤鸟，呈昂首曲体卷尾状，踏在花蕾的蒂叶上。花蕾两侧饰勾连云纹。此件作品整体呈不对称构图，饶有趣味，在全国还是首次出土。

玉佩：长 5.4 厘米。透雕成不规则形状，中部镂一圆孔，上下透雕两只凤鸟，双面饰卷云纹。

(12) 跪姿舞人(图 38)

出西耳室，高 3.5 厘米。青白玉，局部有缺损。舞人圆雕而成，头右侧梳一螺髻横出，提胯扭腰并膝而跪，左手上扬甩袖至脑后，右手将长袖抖至侧后方。舞人刻画得表情专注，体态动作传神，展示了汉代长袖舞舒曼优美的无穷魅力。

(13) 两侧附饰韞形玉佩

出主棺室棺内，共 5 件，主体形状基本相同，唯两侧的附饰有别。主体是一端呈尖状的长圆形，中央有一较大的圆孔。两则附饰透雕变形凤鸟纹，左右不对称。器表及附饰上都刻有极细的卷云纹。其中一件长 7.2 厘米。

(14) 顶部附饰韞形玉佩

出东侧室。长 11.6 厘米。主体顶部透雕变形凤鸟纹。双面刻有卷云纹。常见的韞形佩，附饰多位于主体的一侧或两侧，此件玉佩的附饰却高居主体之上，使整体显得修长秀美。

玉韞是商周时期常见的玉器品种，其实用器是用于张弓扣弦，汉代的韞形玉佩即是由玉韞演变成的。剑饰南越王墓共出土玉剑饰 58 件，计有玉剑首 14 件，玉剑格 20 件，玉剑璲 13 件，玉剑珌 11 件。玉剑饰集中出土于西耳室和主棺室。

单西耳室就出土了 43 件，出土时剑饰外裹丝绢，盛放在一漆盒内。一次集中出土如此多的玉剑饰在考古发掘中是罕见的。这批玉剑饰玉质较好，雕琢工艺甚精，大部分尚未经使用。主棺室出土的 15 件玉剑饰分别属于 5 具铁剑，均是实用品。

玉剑首：是剑把末端的玉质装饰品，多呈圆饼形，纹饰有的十分复杂。如出于西耳室的这件，质坚，色白中带青斑，直径 5.1 厘米。正面圆雕双虎和一尖嘴兽，刻工极其细腻(图 39)。另一件出主棺室，直径 5.6 厘米，呈青黄色，纹饰分内外两区，内区隆起，浅浮雕四朵卷云纹，外区浮雕涡纹。

纹饰简洁，琢刻工整。

玉剑格：是剑把上端的玉质装饰品，剑身入鞘后，格与鞘相碰，避免了剑把随着剑身入鞘。此件玉剑格出西耳室，宽 6.2 厘米，铺首形，中脊突起，上端左右突起如双耳状。中空以贯剑柄。双面雕琢纹饰，正中浮雕铺首纹，“双耳”部位各透雕凤鸟一只。铺首双目圆睁，两凤鸟回首相望。此器是西耳室 43 件玉剑饰中雕镂最为精美的一件（图 40）。

玉剑璲：是附固在剑鞘上的玉质装饰品。出土于主棺室的一件，长 11.1 厘米。玉质坚硬，呈青黄色。外形作狭长条状，正面高浮雕群兽图，计有三虎一熊。动物造型生动逼真，是件难得的玉雕工艺品。

玉剑玦：剑鞘末端的玉饰，二般

作束腰梯形。此件玉剑玦玉质致密莹润，玉色黄中带青斑，长 4.3—4.9 厘米。正面圆雕一螭虎，曲体张口，右上侧及左下角浮雕云纹。另一面浅浮雕兽面纹，底部线刻勾连雷纹。琢工刚劲，线条有力（图 42）。

泥土之胎风雨千年

陶器是以泥土为材料做成坯胎，再经入窑烧制而成。多为生活实用器或专门制作用于随葬的明器，器形简单，多素面无纹饰，胎成青灰或灰白色。陶器因没有贵重的材料，又缺少艺术性的造型，更没有华丽的外表，多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常被称为“破壶烂罐”。其实，它在人类艰难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人类生活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在铜、铁、金、银等金属器皿尚未出现以前，陶器就已存在了数千年，并且创造出了彩陶，黑陶等灿烂的文化。即使金属器皿大量出现以后，陶器这种日常生活必需品虽然与金属器皿相比大失颜色，但其作用仍是金属器皿所无法替代的。试想，贵重的金属器皿只能供少数上层统治者使用，广大的百姓日常所用的仍只是陶器。

在岭南的广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 2900 年）就开始使用陶器了。商周时期制陶工艺获得了很大发展，形成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一个陶系。西汉时期，这种制陶工艺又为南越国所继承，并扩大了制造规模。数以万计的南越国时期陶器的出土，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南越王墓墓道、东西耳室、主棺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都随葬有陶器。据统计，此墓共出陶器 371 件（不算 620 个陶网坠），可分为储容器：瓮、罐（双耳罐、三足罐）、甗、壶、匏壶、提筒；炊煮器：鼎、釜、甑；日用品：盆、盒（三足盒）、钵、碗、熏炉；另外还有网坠、响器以及模型明器——陶壁。大量多功能陶器的出土，说明其在南越国宫室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南越王墓出土的陶器，从胎质、纹饰来看，主要是灰白或浅灰、灰黄色胎泥质硬陶（硬度为摩氏 5.5—6.5 度）。器表施几何形纹饰，主要有几何戳印纹、锥刺纹、水波纹、弦纹、篛纹、方格纹等。少数器表施釉。以轮制技术为主，器钮、耳等附件控制成型。除了泥质硬陶外，还有少量夹砂粗陶，如鼎等。夹砂陶属耐火材料，适用于制作炊煮器皿。从器物造型来看，这批陶器明显地可分成两类，一类仿造中原器型，一类具有南越国地方特色。从鼎的造型来看，就有汉式鼎和越式鼎的区别。

“长乐宫器”陶瓮

共 3 件，出墓道外藏椁中。形体较大，敛口，卷唇，肩腹鼓圆突出，小平底。是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器表拍打方格纹与几何形戳印，肩部打印“长乐宫器”四字篆文。这四字篆文虽拍印在陶器上，但布局工整，笔划流畅富于变化，字体端庄秀丽，刻工严谨，毫无仓促潦草之意，实为汉代戳印文字中的精品。据推测，陶瓮可能用于贮存粮食或其他食品。

“长乐宫器”陶鼎

1 件，出西耳室。是越式鼎，敛口，有圆弧形盖，腹似釜形，肩腹饰两个对称的环形小耳。三扁足较高，通体拓印方格地纹与菱形格的戳印纹，肩部打印有“长乐宫器”四字篆文。

西汉初年，长乐宫是首都长安最重要的皇宫。未央宫建成后，皇帝（自惠帝始）移居未央宫，长乐宫便成为太后居住之宫。未央、长乐两宫分居长安城南的西、东两边，故又称未央宫为西宫，长乐宫为东宫，终西汉一朝，长乐宫的地位一直都是举足轻重的。至今，在地面仍可寻访到长乐宫的遗迹，如果运气好，还能捡到图案古朴的建筑材料——瓦当。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探，得知长乐宫周围筑墙，全长万余米，面积 6 万平方公里，约占长安城总

面积的六分之一。南越国宫室百官礼仪多仿效汉廷，从墓中出上的四件带有“长乐宫器”戳印的陶器也可看出，南越国仿效汉朝也建有“长乐宫”，但此宫是否为太后所居，就不得而知了。南越国仿效汉朝是多么用心，连宫殿的名称都一字不变地搬来用了。这四件长乐宫器应是南越国长乐宫里所用之物，赵昧死后，以此盛放食品随葬，以求长生长乐。

“祭肉”陶钵、陶碗

钵 1 件。体小，敛口，浅圆腹，小平底，器表施彩绘。碗 3 件。敛口，浅腹，小平底，器底施墨彩。这四件陶器上均用墨草书“实祭肉”三字，字迹是一人一时书写。因书写者文化水平不高，书写时出现了错别字，给研究人员的考释带来了小小的麻烦。由此墨书文字可知，钵、碗在随葬时内盛有肉类食品。

陶璧

共 145 件。出于主棺室棺椁的足箱内和西侧室。陶璧是专门制作用于随葬的模型明器，随葬时和玉璧放在一起，起着替代玉璧的作用。这样以较低的成本达到厚葬的目的，真是两全其美。南越王毕竟死了，在大量精美的随葬品中掺点假，充点数，看来也并非不可以。

金扣铜扣鎏金扣

生漆是大自然中漆树的天然液汁，具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的特性，还可以用色料配出各种颜色的色漆，涂刷器表，既实用又漂亮，这就是漆器。我国新石器时代就发明了漆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件木胎漆碗），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的工艺品，历经商周秦汉，直至宋元明清，后代继承前代，又不断创新发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汉代的漆器品种繁多，以饮食用器皿为主，如鼎、壶、盂、盒、盘等，还有盛放化妆用具的奩和家具，如几、案、屏风等，胎质主要有木胎（用木材经轮旋，割削和剜凿以及卷制而成）、夹纻胎和竹胎（以竹子经各种加工方法制成），其中以夹纻胎的制作工艺最复杂。它是先用木材或泥土按预先的设计制成一定的器形作为内模，然后用布帛一层一层附于内模之上，逐层涂漆，使其相互粘接到一定的厚度。待布帛干燥后去掉内模，成型的布帛胎也就是夹纻胎。汉代漆器的花纹绚丽华美，多采用漆绘、油彩绘、针刻、金银箔贴、镶嵌等装饰手法，还在器物口沿上套镶金，银、鎏金铜箍，既可加固漆器，又可作装饰，这种漆器称为“扣器”。汉代漆器造型精巧，色彩艳丽，纹饰多变，装饰华丽，集实用价值与工艺价值于一体，是达官显贵钟爱的珍贵器物，其价值不在铜器之下。汉代文献记载：

一杯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汉代漆器多发现于墓葬中，因年代久远，出土时一般已腐朽，只能根据残存的漆皮来判断器形。保存最好的一批漆器发现于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时鲜艳如新。南越王墓中也随葬有大量制作精美、装饰华丽的漆器，可惜腐朽得非常严重，多数已看不清其真面目了。经过考古工作者认真的观察清理，能认出的器形有盆、盒、盘、卮、杯、（耳杯）、奩、案、木箱、屏风、博局、琴、瑟、俑等。胎质有木胎和夹纻胎两种，纹饰以卷云纹、菱形纹、点纹、斜线纹和三角纹为主。有金、铜鎏金铜扣器。

屏风

出于主棺室通往东侧室的过道处，是墓中形体最大、结构最奇巧的一件器物。出土时漆木胎已朽坏，但包护每个转角的鎏金铜构件、起装饰固定作用的鎏金铜泡钉以及铜蟠龙托座、朱雀顶饰、双面兽首顶饰都保存了下来。根据这些铜构件出土时的相对位置，结合制作屏风时构件上刻写的序列数字编号，技术人员对之进行了科学的复原。复原后的屏风，整体平面呈“冂”形，高约1.8米，正面宽3米，共有三间，各宽1米。正中一间安有两扇屏门，可向后开启，左右两间是固定的屏壁。屏风左右间各以折叠铜构件连接左右翼障，两扇翼障各宽1米，可作90度展开或折合。屏风顶上装饰有鎏金铜朱雀两只，朱雀头朝前作振翅欲飞状，尾端插有长近1米的雉鸟尾羽。屏风两面均涂黑漆（个别地方涂红漆），饰有鎏金双面铜兽首三件，并饰以鎏金铜泡钉。

屏风在古代多陈放于门窗之间，起挡风、空间隔断以及遮蔽的作用，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据考古发掘资料，在战国中期墓葬里即有出土，多为明器。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漆屏风亦为明器，满城汉墓一号墓内出有屏风铜构件，当为实用屏风，可惜已无法复原。因此可以说，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折叠式大屏风是我国首次发掘出土的能够复原的实用围屏，为中国古代家具史的研究增添了珍贵的新材料。这件漆屏风以其形体宽大，结构复杂奇巧、色

泽艳丽，装饰讲究，反映出汉代髹漆工艺的高超水平，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南越王豪华的生活场景。

金羊漆盒

已朽，出主棺室棺槨“头箱”内，可能为长方形，带宝盃顶盖。属于这件漆盒的附件有铜环（可能安装于左右面）、铜铺首（可能安装于前后面）各一对，金羊4件（可能是盖上钉附的饰物）。四件金羊作伏地翘首回望之姿态。出土时盒内盛有用于占卜的卜甲，说明此件漆盒与占卜凶吉的巫术有关。

金扣漆卮

出西耳室，已朽，只余金扣。金扣系铸成，包括盖箍，盖顶上的3个环形钩尾立钮、带三蹄足的底座、一个环形连舌鏊和口沿扣圈，总重167.4克。

金座漆杯

出西耳室，已朽，只存金座足。座足高6.4厘米，断面椭圆形，中空，上部是锯齿状，下部宽展如平座，重130克。

漆器本身已很珍贵，再以如此漂亮的黄金饰物加以装饰，其价值可想而知了。南越国宫廷用漆器的豪华由此可见一斑。

博局

4件，出东耳室和东侧室。出东耳室的一件大博局木质部分已朽，用于包边的四个铜边框保存了下来。经过复原，知道博局平面呈方形，边长60厘米，局面涂褐色漆。博局下设4个鹰爪形象牙与铜相套合的支座。支座四爪张开，分立于象牙与铜相套合的方形底座上。大博局上还镶嵌有卷云纹形金片。另外，东耳室还出土有六博棋子12个，6个青玉质，6个水晶质，估计可能是与大博局相配套的博具。一套用于娱乐游戏的博具，做成华丽的漆器已甚是讲究，还包以铜质边框，饰以卷云纹金片，用象牙和铜相套合做成支架和底座，再配以切割非常整齐的长方体青玉、水晶棋子，其讲究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

南越王墓出土的漆器，经过与长沙等地区出土漆器的对比研究，大致可以推测是在南越国境内漆器作坊制作的，由此可见南越国的漆器制造业是非常发达的。

细丝绢厚锦绣

丝织品是以丝为原料，经过纺绩、编织或机织而成的纺织品中的一种。中国远在距今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商周时期丝织品的品种已很丰富，如有平纹的绢、皱纹的縠（hú）、绞经的罗、双经双纬的缣以及菱纹、回纹绮等。春秋战国时期又出现了锦绣品。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新的丝织品品种问世。中国古代丝织业经过长期的工艺技术改进，丝织品种类非常丰富，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声誉，并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出口到古罗马等国，向东输入日本等国。古罗马帝国正是通过进口、使用丝织品才得以了解相隔万里的东方大国——中国，还称中国为“丝之国”。丝织品在古代中国作为出口的拳头产品，对促进中外贸易及中外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世界纺织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汉丝织品以马王堆汉墓和湖北江陵凤凰山 168 号汉墓出土的数量多、品种全，保存也好。南越王墓随葬的丝织品，数量和品种都不在马王堆汉墓之下，惜因保存环境太差，几乎全部炭化，以手轻触即成粉末。经过丝织品专家认真的观察、整理，丝织品的组织以及织造、涂染、印花等工艺幸而得以了解。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织品既有平纹组织的绢（分为超细绢、研光绢、黑油绢、朱绢、细和绣绢）、纱（分为纱、朱纱、縠、绣纱和印花纱），纱罗组织的纱、绉纱、罗，也有重经组织的素色锦、二色锦和绒圈锦，品种十分丰富。

墓中出土的超细绢，经纬密度每平方厘米达 320×80 根，表面光平如纸，是目前已知汉代绢类中组织密度最高的织物，在汉代可能称为“冰纨”。朱绢、朱纱是经过朱砂涂染的织物，而朱砂是不溶于水的物质，如何涂染织物，至今还没有能够完全解决，而在 2000 多年前的南越国时期，工匠们运用得非常纯熟。

墓中出土的印花纱，上面的纹样是用 2—3 套型版分次套印的。正好西耳室出土了二件青铜印花凸版，说明南越国宫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艺。纱类中的漆縠纱，色泽漆黑，是用黑漆液均匀地涂于纱上制成。从出土位置看，可能是纱帽的一部分。以漆纱作冠，既易于成形，又美观凉爽，西汉官更多著此冠。

黑油绢是用植物性油类涂于绢上，外表光滑可防雨防潮，是多雨地区理想的衣料。墓中出土的黑油绢，类似今天的防雨油布，是已知最早的用涂油层工艺制成的“油布”。

研光纱是用研光工艺（即辗压工艺）制成的纱，纱的经纬组织致密，空隙较少。墓中出土的研光纱是在纱上涂上云母粉末后加以辗轧，使织物轻薄、坚牢、平整，云母粉还产生泛光感。这种云母研光纱在全国尚是首次发现。

绣绢绣纱是对织物再施以人工刺绣的装饰，与工艺复杂的绒圈锦都属于高级织物。

经研究，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织品，有一部分可能是西汉朝廷赠送的，大部分应是在南越国织造的，表明南越国拥有规模不小的、发达的丝织品制造业。

玻璃象牙及其它

南越王墓除出土有大量精美的金、银、铜、铁、玉、陶、漆器以及丝织品外，还出土有少量的玻璃、象牙、珍珠制品以及药、墨丸、动物遗骸等。这些出土物虽然没有漂亮的外观，但往往能说明一些重要的问题，是研究南越国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珍贵的实物资料。

玻璃器

玻璃器皿以其晶莹的色泽，优美的造型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古代，玻璃因制作工艺复杂，产量小，所以异常昂贵，其价值不在黄金之下。根据考古资料，玻璃器皿大约在公元前 16 或 15 世纪首先出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稍晚，埃及也开始生产相似的玻璃器皿。在世界古代中世纪历史上，罗马帝国、萨珊波斯、阿拉伯帝国的玻璃制造业都很发达，分别成为当时玻璃生产中心，部分产品还远销到东方的中国。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能制造玻璃，是世界最早的玻璃产地之一，并以其独特的造型和成分（铅玻璃）自成体系。自战国以至明清，中国的玻璃器一直存在着“中国制造”和从西方进口两个体系。

南越王墓出土较多玻璃器，计有壁、平板玻璃牌饰、串珠、珠、贝等品种，多是装饰品。色泽有青白、灰黑、浅蓝、深蓝、黄白、灰黄、青绿等。

（1）玻璃壁

出西耳室，5 件。色青白，半透明。器形较小，器表饰三角形纹。模铸而成。经测定，含铅 42.86%，钢 2%，属中国古玻璃系统。

（2）玻璃珠

出西耳室、主棺室及东西侧室。灰黑色，扁圆算珠形，中有一孔。表面有绿、白两色“蜻蜓眼”。

（3）玻璃牌饰

出西耳室、主棺室及东侧室，共 22 件。长方形。制法是在铸成的鎏金铜框内嵌一块浅蓝色透明平板玻璃。用途是固定在革带上作为装饰。这是我国迄今已知的时代最早的一批透明平板玻璃，对研究我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经建筑材料专家研究，这批平板玻璃的制法可能是先浇铸成薄板状，再适当研磨切割加工成一定的尺寸。

经过科学的检验（化学成分分析、透光率和密度测定），南越王墓出土的这批玻璃器的成分都是铅钡玻璃。世界古玻璃专家公认，在世界古代玻璃中，只有中国古代玻璃的成分是铅钡玻璃，因此，这批西汉玻璃无疑是“中国制造”的。至于说是南越国自制的，还是在中原制成后输入的，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象牙雕刻

南越王墓出土了原支大象牙以及象牙雕刻制品，计有卮、筒、印章、算筹、棋子和工艺装饰品等。

（1）原支大象牙

出西耳室，共有 5 根象牙并排堆放，每根的长度都超过 120 厘米。横截面呈椭圆形。经动物学专家的鉴定，象牙与亚洲象纤细的牙有明显的区别，与非洲雄象大而粗壮的牙接近。说明这五根象牙的产地在遥远的非洲，作为雕刻的原料，通过贸易进口到南越国。珍贵的非洲大象牙未及制成精美的雕刻品就被放入墓内随葬了。

（2）金扣牙卮

出西耳室，出土时装在鎏金铜扣漆奁内，可见这件牙奁是何等贵重。奁的盖与身相扣合呈圆筒形。盖面系一整块圆饼形象牙板，外扣金箍，盖面嵌有3个金立钮，呈环形钩尾状。身如筒状，上口外扣金箍，底下承一个三足金底座，中部嵌有一环形连舌金鍔。盖面的象牙表里以及器身外表均饰以针刻线画，有圆圈纹、锥刺点纹、柿蒂纹、飞雁、凤鸟形纹、弦纹、曲尺纹、神兽纹等。柿蒂纹呈三瓣，布局工整，丰腴饱满，装饰性极强；凤鸟纹以单线刻划，线条简洁流畅，造型圆润生动；神兽通体浑圆，独角，张口衔绶，作回首张望状，足甚长，前肢蹲踞，后臂耸起，姿态威猛生动，极富动感。这件奁以象牙制作器盖器身，套以金扣，饰以金立钮、金鍔、通身针刻内容丰富的线画，并以朱蓝二色染出不同的色块，确是一件颇具匠心的实用品兼工艺品，在汉代考古上尚属初见。

骨雕天鹅

出西耳室。天鹅作振翅前冲状，右翅下垂，左翅半张开，右足弯曲，左足伸直，曲颈回首，张口衔尾。雕工精致，层次清晰，细部刻划传神，是一件优秀的微雕工艺作品。珍珠一部分出自主棺室“头箱”中，原盛于一个大漆盒内，出土时漆盒已朽，珍珠散落满地。珍珠直径0.3—1.1厘米不等，总重为4117克。另一部分出自墓主玉衣头套下，盛在一丝囊内，可能是一件丝囊珍珠枕，珍珠直径0.1—0.4厘米，总重约470克。珠不正圆，为天然珍珠，未经加工。用珍珠做成枕头，在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南越王赵昧真是别出心裁、与众不同。

墨丸

出西耳室，原盛放在一漆盒内。约4385颗，总重876.75克。呈小圆饼形，质地细腻，色泽黑中微泛红。其制法是将稠糊状原料随意滴聚成型。一次出土数量如此多的墨丸，在我国汉代考古中属首次。经鉴定，墨丸即是墓葬前室周壁彩绘图案所用的颜料。

药

多出西耳室，计有五色药石（紫水晶、硫磺、雄黄、赭石、绿松石）、药材、药丸、羚羊角等。药丸、药材可能系墓主生前病时服用，死后随葬入墓。五色石又称“五石”散，除能治病外，还被当成是长生不老之药。

古代帝王享尽荣华富贵，他们最害怕的是死。秦汉魏晋时祈求长生不老的风气非常盛行。秦始皇就曾派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乘楼船入海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一去不返（传说徐福向东航行到了今天的日本，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重要人物）。西汉长安城建章宫内建有一座神明台，台高50丈，是建章宫中最壮观的建筑物。台上有铜铸的仙人，非常巨大。仙人手托一个直径27丈的大铜盘，盆内置一巨型玉杯，名承露盘，用以承接自天而降的露水。传说喝了杯中的露水，人就可以长生不老。这就是汉武帝营建神明台的主要目的。另外，建章宫附近还开凿了一个大水池，名太液池，汉武帝为了祈求神仙，在太液池中建造了20余丈高的渐台，还建造了三座假山，象征东海中神仙居住的瀛洲、蓬莱、方丈三座神山。就是在远离首都长安的离宫——甘泉宫，汉武帝在此也建了一座通天台，通天台上也安置有承露盘。由此可见汉武帝求神仙是多么虔诚，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仙，这样就可以长生不老了。

南越王墓出土的五色药石，表明南越国统治者也在祈求长生不老。墓中主棺室还出土了一件承盘高足玉杯，可能就是用以承接露水的承露盘杯。

动物遗骸

出于后藏室的最多，东西耳室和西侧室也有少量出土。经鉴定，计有螺（分耳状耳螺、沟纹笋光螺两种）、青蚶、河蚬、楔形斧蛤、龟足（石砺）、笠藤壶、真虾、大黄鱼、广东鲂、鲤鱼、花鱼、水鱼（中华鳖）、家鸡、黄胸鹑（wú）（禾花雀）、竹鼠、家猪、山羊、黄牛等20余种，分属于3个门，7个纲。其中属于人工饲养的家畜家禽有4个种，约占20%；陆地野生动物2个种占10%左右；水产动物（咸水、淡水）占70%以上。这些动物多是当作食品入葬、供墓主死后享用的，出土时多放在铜、陶器内。其中放在铜鼎内的动物可能是煮熟后食用，而放在铜烤炉内的动物则是烤制后食用，类似现在的烧烤。看来，当时烹制食用动物的方法还不少呢。

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骸，不仅反映了南越王的食物结构，也是研究汉代岭南地区气候、自然环境、经济结构等问题的珍贵资料。通过对这批资料的整理研究，可知西汉时广州附近的自然环境是河流交错、水网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淡、咸水产品丰富）；珠江河口的位置就在广州市区边缘（青蚶、龟足、楔形斧蛤等海产品只有在沿海地区才有分布）；当时的气候带比现在稍偏热带南部（象类动物在汉代广州附近仍有，今天已消失）；南越国除农业生产外，还有家畜饲养业（猪、牛、羊、鸡），同时，渔猎经济仍占较大比重。青蚶、龟足、禾花雀都是很难捕捉的动物（青蚶以足丝固着在岩缝或洞穴内，不易发现，要凿开岩洞，用镊子之类器物夹取才能获得；龟足的柄部有伸缩性，一遇触动即缩入石缝；禾花雀系候鸟，每年10月从东北飞到岭南，喜吃灌浆稻谷），说明当时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渔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掌握了熟练的捕捉技能，并对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气候变化、潮汐规律等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根据这批动物资料，还可大约推知墓主下葬的时间。据研究，禾花雀每年十月中下旬到岭南越冬，此时也是大量捕捉禾花雀的季节。青蚶等贝类动物有冬眠习性，在秋末冬初时最为肥美，是大量捕食的最好时期。因此，从墓内出土大量禾花雀和青蚶推断，南越王赵昧正是在岭南人们大量捕食禾花雀和青蚶的季节——秋冬相交之季下葬入土的。

墓中出土大量的动物，都是味道鲜美的肉食品，至今广州附近的人们还在食用（如禾花雀等）。南越王希望他死后仍能享用这些美味佳肴，虽然这一愿望未免荒谬可笑，但大量动物的随葬却为今天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复原当时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十分珍贵的资料。

从南越王墓看南越国经济

农业和渔业

南越国的国都番禺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北部，这里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比较适宜发展农业生产。

早在新石器时代，岭南地区就已出现了原始农业。据考古发掘资料，在广西南宁豹子头、青山及横县的西津、秋江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贝丘遗址里，发现有大量的石斧、石镞、石杵、石磨盘、石刀和蚌刀等挖土、收割农作物及加工粮食的工具；在广东曲江石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中层和下层，还发现有许多栽培稻、稻秆和谷壳。

但在秦代以前，这里的农业还是处于“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的较原始的阶段，产量较低。秦军南下，带来了先进的农具和农耕技术，对岭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起到了一些作用。但由于秦军所到之处往往都是人口较集中的市县所在地，所以一些较偏远的地区铁制农具还很不普及，大多还使用木石农具。所以总的来说，农业生产还较落后。

赵佗立国后，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西汉政府封赵佗为南越王后，在长沙国与南越国的边境上设立了“关市”，与南越国进行贸易，南越国利用“关市”，从中原地区输入了先进的铁制农具和马、牛、羊等牲畜。在广州、广西平乐、贵县曾发掘过一大批南越国时期的墓葬，这些墓葬里出土了很多的铁制品，铁制农具有铧、耜、铲、镰、锄等，还有铁制工具，斧、凿、铸、剑、刀、剪刀、锯、钉等。这些农具和工具的形制与内地出土的同时代的器物形制基本相同，推测是通过关市贸易从内地输入到南越国的。铧是用来耕地的，耜、铲是用来翻土、挖土的工具，锄是用于松土的工具，也适合用于兴修水利时的开沟、起垄，镰是用于收割的工具，还有刀、斧，是砍伐灌木、开荒割草不可少的。从这些出土物来看，用于农业生产各个阶段的农具基本上都有了。这些铁制工具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南越国生产的发展。当时中原地区已有了牛耕，南越国从中原输入的马、牛，估计也用于农耕，但牛耕肯定还不普遍。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当时的农作物品种已经比较丰富了。粮食类的主要种植水稻，另外还有黍、粟、菽、蕒、芋、大麻、高粱；蔬菜类有黄瓜、姜、葫芦；瓜果类有橄榄、桔子、桃子、梅子、酸枣、人面子、木瓜、西瓜；还有花椒。

总之，南越王国政权采取的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推行的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岭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空前的发展。

岭南地区的渔业也很发达。岭南拥有很长的海岸线及众多的河湖港汊，其中盛产水产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学会捕鱼和食用贝类。在南越国时期，这些水产品仍是人们的日常食物。在广州发现的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经常有鱼骨及蚌类海产出土，象岗南越王墓中所见到的水产品种类更齐全，有虾、龟鳖、笋光螺、耳状耳螺、大黄鱼、广东鲂等，说明渔业生产在南越国的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当然，岭南境内的发展并不在同一水平上。在平原地带以农业为主，铁制农具与牛耕的使用相比较而言普遍一些，故农业生产要发达一些。而在边远的山区丘陵及沿海一带，铁农具的使用可能还不普遍，再加上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狩猎业和渔业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虽说

存在着这些不平衡，但总的来说，南越国时期的农业、渔业、畜牧业的发展为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纺织业

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最初的纺织业，不仅能纺织葛、麻，还会缫丝织出丝带和绢。

到了秦汉时期，纺织业空前发展，尤其是丝绸制造业，其工艺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南越国的纺织业水平究竟如何？南越王墓发掘以前认识尚不清楚。过去发掘的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也曾出土过一些纺织品残片。如广州 1099 号墓和 1136 号墓出土过残绢，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曾出土过丝绸、麻布、织棉、漆绘纱帽等残片，同墓出土的一件木牍“从器志”上还列出不少纺织品的名称，有缁、苳、布细、线、絮、丝等。但因为出土数量少，而且岭南是酸性土壤，这些纺织品不易保存，出土时多已碳化，一触即碎，所以这些产品是本地出产的还是从内地输入的，并不十分清楚。1983 年南越王墓的发掘出土了大批丝织物，为我们了解南越国丝织业提供了实物资料。

南越王墓内的丝织品的使用，非常奢侈。墓内的随葬品，小至一把铁削，一块玉剑饰，大至一个铜鼎，成捆的兵器，几乎都用丝织品包扎捆缠。有几个铜熏炉还用绣花绢、绒圈锦这样高级的丝织物来包裹。另外在西耳室还发现了叠置成堆的整匹丝绢，全部已经碳化了，用手一摸即成粉末。但在放大镜下，还可看出织物的组织结构及印染的花纹图案。这些织物有好几种品种，如平纹的绢，方孔的纱，斜纹的绮，组织复杂的锦、罗、绉纱。在铜镜、玉璧等器物上，还发现手工编织的缓带、罗带和组带等编织物。另外还发现刺绣。有一种“湘黄超薄绢”，其经纬密度竟达每平方厘米 320 根经线×80 根纬线，用肉眼根本看不出经纬线，只有在 10 倍以上的放大镜下方能看清。长沙马王堆一号墓曾出土过两件成幅的泥金银印花纱，花纹单位的外形为菱形，每个单位由三个印版组成，其中两个印版一大一小，均由细曲线纹组成火焰形纹样，印出银灰色或银白色。另一印版由小点组成重叠的人字形纹，印出金色或朱红色的小圆点，套叠在菱形的花纹单位之中。推测这种纹饰可能是用凸板印的，但由于没有发现工具而无法证明。在整理南越王墓出土物时发现有几片残铜片，去锈后拼复起来，竟是大小两件青铜印花凸板，大的一块约为 58×40 毫米，另一块更小。两块的花纹构图组合起来，与上述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泥金银印花纱十分相似，只是纹样单位要比马王堆的大一些。而且在南越王墓已碳化的织物中也发现有这种纹样的印花罗。印花工具与成品同出于一墓，意义不同寻常。马王堆出土的泥金银印花纱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织物，而南越王墓发现的套印工具更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另外，罗泊湾一号墓曾发现过一些实用织机和模型织机的部件。可以辨认的有打纬刀、卷布轴、经轴、梭、引经杆、分经杆、桃经刀、提综杆和“马头”。这些印染、织布工具的出土表明，南越国确有自己的丝织生产。

从南越王墓出土大量的丝织品来看，南越国的纺织业规模不会小，而且也应该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岭南地区盛产桑树，所以当时应该已饲养家蚕了。前面提到的一种超细绢，其经线的投影宽度仅有 0.02 厘米，能够缫出这样细的丝，说明当时不仅缫丝技术相当成熟，而且已经能选择优质蚕茧了。

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一种丝织品，其外表像泡沫一般卷曲起伏，它的经纬线都是先经过强捻丝后上机织成的。这样强捻的丝，如果用当时常见的纺轮，是无法完成的，所以应该是用纺车捻成的。当时汉代中原地区已经有了

手摇纺车，南越国王室中应该也用纺车了。

南越国的印染工艺也相当成熟了。在南越王墓发现的丝织品中，印花织物和涂染织物都有发现。墓中出土一种印花纱，有白色的火焰纹，红色的小圆点纹。火焰纹可能是用白云母一类矿物制成的染料染的，而红色小圆点是用朱砂染的，这种图案与所出的印花铜版是一致的。这种印花方法是完全用手工套印，即印花工人手拿凸版像盖图章一样在展开的织物上一行行盖印。这种原始的印花方法非常费工夫，估计长1米、宽22厘米左右的织物，就要打印600多次。涂染织物有云母绢、漆纱和黑油绢。云母绢是在丝绢表面涂染云母粉末，然后用大石头等碾压，表面闪闪发亮，非常美观华丽。漆纱是用黑漆涂在方孔的纱上制成的，这种纺织品比较适合做帽子。长沙马王堆就出土一顶这样的纱帽，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曾发现一顶残漆纱帽。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小块涂了漆的纱，还发现了一些漆纱帽的残片。黑油绢表面由于涂了某种油料，黑腻而有光泽，可以防水，用来做防雨的衣料、车篷帐之类是最合适的。目前在全国其他的汉墓中，还没有见到这种涂油绢。

南越王墓中还出土有用朱砂染色的织物。有整匹的朱红色的绢和菱纹罗，在玉器的表面则留有朱红色的“纱”的痕迹。这些色泽鲜红的丝织品是当时王公贵族喜爱的高级衣料。在河北满城县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都有发现。朱砂是一种矿物，它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特性，如果用普通的碾压方法来研磨，就会失去鲜红的色泽而变成红黄色，必须用互相碰撞的方法，使它的颗粒变细，才能保持艳丽的朱红。南越王墓出土的朱绢、朱纱、朱罗，虽然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时颜色依然非常鲜艳，现在还不清楚当时的工匠使用了什么粘合剂，以使朱砂能够牢固、均匀地粘在织物上。

当时的纺织品除丝织品外，还有麻制品。广西罗泊湾南越国时期贵族墓出土的“从器志”中，曾记载随葬品中有麻，而且也出土了布、麻布和纱衣残片，同墓还出土有麻的种子。据《汉书·地理志》载：南粤男子“种禾稻苧麻”。这些都说明南越国时已种植麻而且用麻来制作纺织品。

南越王墓出土的织物原料、色泽、图案、工艺有很大一部分与中原同期织物十分相似，它们有可能是汉朝赐与南越王的，或是通过贸易关系输入的。但从整体上看，南越国的织物及其原料来源，大部分应是本地生产和制造的。

总之，南越国时期岭南地区的纺织业已经有了较大的规模，而且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制造纺织品的作坊由王国工官管理，使用大量刑徒进行生产，织物以丝和麻为主。不仅能织出绢、方孔纱这种比较简单的平纹织物，也应该能生产罗，并能印花、涂染。南越王墓中大量使用绢作为包裹随葬品的材料，就说明南越国的纺织品产量也不少。

冶铸业

岭南地区的青铜冶铸业大致到了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如广西恭城县秧家春秋墓出土的盘口鼎、蛇斗蛙纹尊、扁茎剑、靴形钺；宾阳县新宾发现的栉纹铜钟等，形制与纹饰很有特色，制作工艺较粗糙，应该是本地制造的产品。在武鸣马头春秋墓还发现铸造镞、钺、斧等器物的石范，更是本地已有冶铸业的有力证据。到了战国时期，从考古出土情况来看，青铜器种类和数量都较以前有所增加，分布的范围也较以前广泛。如在广西宾阳、田东、贺县、柳江、象州、兴安、容县、武鸣，广东饶平、肇庆、清远、德庆、四会、揭阳、罗定及越南清化、富州、山西等地出土的盘口鼎、附耳簋、羊角钮种、靴形钺、扁茎剑、篋刀、戚、人像柄匕首、方形印器、圆珠形器、叉形器、人首柱形器等，这些器物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应是本地铸造的。这时的青铜器已采用了单范、多范、复合范铸造，铸造的工艺有浑铸法、铸接法和铸后焊接法，并且已经有了铸后加工、热处理、退火工艺。

到了南越国时期，社会秩序安定，岭南与周边地区的贸易、交往更频繁，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青铜冶铸业在冶铸规模、冶铸技术方面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器物种类增多，数量增大。据统计，在岭南地区发掘的300多座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包括了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娱乐用品，还有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还有其他杂项用品。生产工具有犁、铧、斧、铤、凿、斤、锯、削刀、刮刀、铲、鋤头、锉刀等。日常生活用具有炊煮食物的鼎、釜，用来蒸食物的甑，装酒的壶、提筒，装水用的瓶、盆，还有喝酒用的卮，用来燃香的熏炉，照明用的灯，梳妆用的镜子，盛放物品的案，刷子的柄等。兵器有剑、矛、戈、钺、镞、镖、刀、匕首、箭头及射箭用的弩机。装饰品主要是一种长方形的小铜牌，上铸有镂空透雕的图案，背面有穿，可用皮带串起来围在腰间作装饰品，另外还有指环。娱乐用具有鼓、钟、铙、钲、铃、棋盘等，钟、铙之类不仅是乐器，同时也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征。

从这些青铜器的纹饰和形制看，有些铜器具有中原的风格，有的具有楚地的风格，也有南越国所特有的东西。如一种越式鼎，有的上面还刻有“蕃禺”二字和标志容量、重量的铭文。南越王墓出土一组勾鑊，形制与内地完全相同，但器上刻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八个字，可知这是南越国仿造的。还有一种大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器物，不仅岭南有，西南地区也有。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中出土了两个大铜鼓，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岭南本地铸造的产品，铜鼓体形较大，而鼓身、鼓面的厚度仅5毫米左右，上面还有各式花纹、动物纹等图案，要求有很高的冶铸技术。在象岗南越王墓中发现了大小不同的三个铜烤炉，炉上各种烤炙配件齐全，有悬炉的铁链，烤肉的铁钎和长叉。大烤炉底部还装有四个轮子，便于移动。出土时，有两件烤炉内仍塞满黄泥范，表明它们是刚刚铸出便成了随葬品，也表明这是南越国本地制造的产品。

南越国铸造青铜器所用铜材，其来源可能有两个：一是从内地输入的。南越武王赵佗曾上书西汉王朝，抱怨禁绝“外粤金铁田器”，金，即铜，表明南越的铜材和铜制生产工具，至少有一部分还要依靠中原的供应。二是南越国开采当地的矿产冶炼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可确凿定为南越国时期的铜矿或冶铜遗址，但已发现有战国时期的铜矿。在广西北流发现的一个矿冶

遗址，被认为很可能在南越国时已开始使用。就是说南越国已出现采矿、冶炼到铸造及铸后加工、表面热处理的全套工序了。

从南越国铸造的青铜器的形制和残留在器物上的铸痕可以看出，其铸造工艺有内模外范铸造法，这主要用于制作体积较大、结构较复杂的空腔器物，如铜鼓、铜镬、壶、鼎、钟、筒等；全范式铸造法，用来铸造体积较小，结构较简单的实心器物，如刀、斧、镞、匕首、铃、动物塑像等；套接铸造法，一般用于铸造连环状的铸件。如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竹节铜筒上的绞索状提梁，两端的链状套环就是以此法铸造的。必须提出的是还有一种铸造方法——失蜡法。这种方法可制作出非常繁复、立体的纹饰，其做法是用蜂蜡做成铸件的模型，再用其他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和敷成外范，加热烘烤后，蜡模全部熔化，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了空壳，再往里头浇灌金属熔液，铸成器物。在象岗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屏风铜座足，还有瑟上的弦柱，柱头上有精巧的小熊、小野猪、小猴等动物，又有蛟龙出没于云气波涛之间。这些小动物都是立体的，大小有的还不到1厘米，而头、身子、五官、鬃毛都表现得清清楚楚。只有用失蜡法才能铸出如此精细、复杂的图案。

但南越国的青铜器铸造业，与同期的中原地区相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制作技术方面仍多沿用中原东周时期的传统工艺，如两分范合铸容器，活芯垫控制器壁厚度，以及圈足器的浇口设在器底中部的技术，中原地区在秦汉时期已较少使用。还有铸范的衔接处设计有时不合理，铸造时在接口处出现裂缝，不得不加以补铸。不过，南越国时期青铜铸造业发展还是很快的，大大缩短了岭南地区与中原发达地区的差距。

岭南地区使用铁器较晚，目前考古资料所见最早铁器是战国晚期的，一件铁钺，一件铁斧，估计是楚人南进岭南后流入的。秦平百越后，铁器才大量在岭南出现。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不少铁器，南越文王赵昧的墓中出土铁器246件，罗泊湾一号墓出土25件，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出土14件，广州182座南越墓中有51座出土83件，平乐银山岭123座南越墓中有98座出土铁器206件。出土铁器的种类有农具、手工业工具、武器、日常生活的炊具、杂器。最常见的农具有锄、耜；手工业工具是斧、镑、凿、刮刀、削刀；武器是剑、矛、戟、铠甲和铁挺铜镞；炊具杂器有鼎、釜、三足架、镊、锥。这些铁器，有些可能是从中原输入的，但也有南越国本地制造的。有一种越式大铁鼎，是本地特有的器物，因而应是在本地铸造的。另外南越王墓还出土了成捆的铁剑和铁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王朝对南越国是有戒心的，不会将大批的铁制武器输入到南越国去，这些铁制武器也是当地铸造的，说明南越国已有了铸铁业。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教研组曾对南越王墓出土的铁甲、铁铍、铁铲、铁剑等做了金相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铁器都是用加热锻打的方法制成的。铁剑在锻打以后，又经过了淬火处理，使剑的表面硬度提高。而西汉时中原地区的小型农具和工具，基本上都是用铸造法制成的。制作方法的不同，说明这些铁器是本地锻造的。这些工具往往是几种不同含碳的原料锻打在一起制成，而且经常利用废料重新加工锻制。这种把不同原料锻打在一起，以及反复利用废料的作法，也反映了这些铁器是在缺乏原料的南越国生产的。

当时南越国虽然已掌握了锻铸技术，但有无自己的冶铁业，目前尚无定论。不过南越国的铁料来源可能主要还是靠中原进口的。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过吕后时期，曾关闭了南越国与长沙国边界的关市，禁止向南越输送“金铁

田器”，为此南越王赵佗三次上书汉廷，要求解禁。从南越王赵佗的迫切要求来看，南越国所需铁器要依靠中原供应，或者要从中原输入铁材，然后在本地加工锻铸。

冶铸业的进步，为南越国提供了锐利的武器，也提供了农具和各种工具，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玉器和玻璃制造业

过去发现的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有少量的玉器出土，如玉璧、玉璜、小玉珠、玉环、玉佩、玉剑具、玉象生等，其风格造型与中原地区的玉器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过去总认为这是从长沙国或中原地区输入的。

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发现后，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共 240 多件。有璧、璜、佩、带钩、缶、高足杯、盖盒、盖后、印玺、玉具剑饰、玉舞人等，还有玉衣。多数玉器与中原地区的没有什么区别，有少数几件器具比较有特色，是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如角形玉杯、玉盖盒、高足玉杯。在中原地区玉多用来制作璧、璜、佩等礼器和装饰用品，没有用来作器皿的。这种造型设计独特的器物，应是南越国宫廷制玉作坊的产品。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一套丝缕玉衣，头套、手套、脚套制作得还比较精致，上衣与裤子却比较粗糙，其玉片背面还有花纹，看来是用其他的玉器改制的，或是废料再利用加工而成的，玉衣应是在一个综合的玉器作坊中制作的。也可看出南越国的玉器制作业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其制玉水平也与中原地区不相上下。

南越国的制玉工具和制玉方法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基本相同。在金属工具还不发达、硬度不够的古代，刻玉是用一种小而扁圆的工具，粘上很硬的矿石细沙，在玉石表面磋磨成形，起刻划、磋磨作用的是矿砂。在南越王墓中发现一件玉璧，四分之三的壁面花纹已磋磨光滑，尚有四分之一的花纹未经修整，留下许多白色的刀刻痕迹，从中可看出当时玉璧的加工方法。先用锋利的金属刀刃刻划出轮廓，然后再用皮革、砂加水等方法打磨光滑。从南越王墓出土玉衣的玉片也可看出当时切割玉片的方法，是用一种长条形扁片金属工具，边加磨料边来回推拉而切割成的。还有，玉器上的孔眼、镂空等，也是用竹管或金属管，加上水和砂，转动管子研磨而成的。

南越国出土的玉器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中原来的，但有些无疑是南越国自己制作的，而且南越国的玉器制作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南越国的玉雕工人，有些可能是战国末年从楚国逃到岭南的玉工，有些可能是南下的秦军中身怀雕玉技艺的士兵及其后代。他们保留了中原和楚地的传统玉雕风格，又吸收了当地的文化，以致形成了南越国玉器汉、楚、越三种文化融合的独特风格。

过去在广州和贵县发现的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有玻璃制品，但出上较零星。象岗南越王墓中发现了较多的玻璃制品，使我们得以对南越国的玻璃业有了初步的了解。

南越国时期的玻璃制品有璧、平板玻璃、圆圈纹珠，小串珠和贝饰、鼻塞、耳珰等，均为装饰品。色泽有黄白、青白、青绿、深绿、浅蓝、深蓝、黑色等。

南越王墓出土的玻璃器，经鉴定的有璧 2 件、平板玻璃 2 件、圆圈玻璃 1 件、小串珠 1 粒，结果皆属铅钡玻璃。据古玻璃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玻璃含有氧化铅和氧化钡，较为典型，自成一体。

时代最早的铅钡玻璃制品大多发现于长沙楚墓，故推测长沙是中国最早制作玻璃的地区之一。南越王墓出土的玻璃璧，与长沙、衡阳、资兴等地出土的战国、西汉玻璃璧形制一样，但平板玻璃、小串珠和玻璃耳珰则是其他地方所未见过的。另外，在南越王墓中还发现了 22 件镶嵌蓝色平板玻璃的铜牌饰，牌饰的背面有穿，用皮带穿起来，围在腰间作为装饰品。这种牌饰可

能是受北方草原地区匈奴式的动物纹铜牌饰的启发而制作的，这种器物从未在其他地方发现过。这些都表明，南越国已有了玻璃制造业。

漆器制造业

我国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漆器实物资料是新石器时代的。漆器就是用木料或麻布作成器胎，然后在表面上刷上漆。这种器物轻便美观，非常受古人的喜爱。漆器在较早阶段用木块斫砍制成器形，胎比较厚重，称为斫木胎；后来将薄木片卷成器形，接口处用木钉钉合，质地大为减轻，称为卷木胎。后来又出现了用麻布或增帛在模上粘贴数层，去掉内模后，脱胎成型，称为夹纻胎。内胎作好后就要涂漆，一般要涂好几遍漆。还采用多种形式进行装饰，器物一般是外表涂黑漆，内表涂红漆，然后在黑漆上绘红色、白色的各种纹饰，还用青铜、鎏金铜、金、银、玉等作成口沿、支脚、座足、把手等装饰漆器，这称做扣器。

岭南地区漆器业始于何时，史籍无记载。广东肇庆的战国墓发现过漆器的残迹，使我们得以窥视当时岭南使用漆器之一斑。其后在广州罗冈的一座秦墓中，又发现盘、奩、耳杯等漆器印痕，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又发现一块被定为秦代的漆纻残片，上面针刻有“丞里”三字。这些零星的发现，还不能说明秦代岭南已有漆器制造业。但罗冈秦墓漆器上的一些图案，后来多见于南越国墓葬出土的漆器上，说明秦代漆器对南越国漆器生产的影响，或者说，岭南漆器业是在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南越国时期的漆器出土的也不少，50年代在广州市郊发掘的南越国墓葬中，曾出土比较完整的漆器87件，器形有敦、扁壶、盒、奩、盘、耳杯、案、环、镂孔漆器、泡钉。1976—1980年，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漆器800多件（片），后来又发掘了罗泊湾二号墓和贺县金钟汉墓，所发现的漆器数量很可观。1983年发掘了西汉初第二代南越王墓，又出土了大批漆器。

从这些出土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南越国的漆器与长沙、江陵、扬州等地出土的同时期的大同小异，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南越王墓出土漆器大多表里均髹漆，一般外表髹黑漆，内里髹红漆，然后又在黑漆上加绘彩色纹饰。一般都是漆绘，即用生漆制成的半透明漆加入某种颜料制成油彩，用以在已髹漆的器物上描绘各种图案。颜色以红、白为主，也有绿、墨绿、褐、黄、金色等。花纹有几何类的，花草类的，动物写生类的。比较有特色的有鱼纹、龟纹、犀牛纹。

南越国时期墓葬出土的漆器，有不少的上有烙印、针刻和漆书文字。广州出土的漆器中，漆书文字有“高乐”、“龙中”，针刻文字有“十(七)”，烙印文字有“蕃禺”。广西地区出土的漆器，只有烙印和针刻文字，并且仅见于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漆器上。烙印文字有“布山”、“市府草”、“市府”，针刻文字有“胡”、“厨”、“杯”、“土”。烙印文字即是在素木胎上烙印戳记而后上漆的，是漆器制作过程中打上的戳记，因而大都是制造地的地名或漆器制作的官署名。针刻文字，是在漆器制成以后刻上的文字，往往刻有买主、用主的姓名或器物之用途。漆书文字，是制漆工匠在制器过程中用颜色漆写上的文字，其内容大多是制器工人的姓名或标明器物的用途。

漆器上的烙印文字大都是漆器制造地的地名或官署名称。广州出土的漆器上有烙印文字“蕃禺”，蕃就是番，番禺是南越国的都城，表明该漆器是番禺的漆器作坊制作的。广西出土的漆器上有烙印文字“布山”、“市府草”，草与造是通假字，意思是该器物是布山市府所造的，布山也是南越国的一个

重要城市。从这些烙印文字中我们知道，当时的南越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漆器制造业，这些漆器作坊都是官府直接控制的。

一件漆器，需要多种工艺、多道工序、多人合作方能制成。从现在出土的漆器铭文题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漆器作坊中有素工、髹工、铜扣黄涂工、画工、雕工、上工、清工、供工、造工等工种，还有护工卒史、长、丞、掾、令史、佐、啬夫等官吏负责监造。素工，就是制作器内胎的；髹工，就是给内胎上粗漆的；上工，是在髹工工作的基础上再细细上漆；画工，是给上好漆的器物上描绘纹饰；雕工，是在器物上雕刻纹饰的；清工，最后修饰器物的。总之，一件普通漆器的完成，起码要经过制胎，初步髹漆、反复髹漆、描绘纹饰、铭刻纹饰等多道工序。如果是扣器或嵌玉漆器，还要铜扣黄涂（即铜饰上镀金）和嵌玉工序。

从南越国漆器的形制、纹饰来看，与长沙，江陵、扬州等地同时期的漆器比较相似，但也有些自己的特色。其漆器制造业的工匠可能大多来自原楚地，保持了楚的风格，又在越文化的影响下，创造出了两种风格融合的产品。

岭南地区不产漆，南越国制漆业所需生漆应当来自内地。南越国对汉王朝长期称臣，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铁器、马牛羊等牲畜及部分丝绸从中原进口，所以从中原输入生漆用于漆器制造业的可能性很大。

漆器精巧，美观，又具有实用价值，因此汉代人是非常喜欢漆器的。当时漆器是非常贵的，一般是用不起的，贵族阶层使用漆器是很时髦的。南越王国处处仿效中原，对漆器的追求和使用也仿效汉廷。南越王国的漆器业在秦朝以前是没有的，能迅速发展起来，而且水平还较高，与贵族阶层的奢求有很大关系。

造船业

岭南地区多水，河、湖、港、汊遍布，船只作为水上交通工具，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秦代以前，岭南地区社会发展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生产力比较低，所以当时舟船制造规模还很小，只能制作一些简单的、较原始的独木舟。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表明，岭南地区出现大规模的造船业是从秦代开始的。

1975年在广州发现了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说明秦汉之际番禺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造船能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据研究，这个造船工场一直延用到西汉初年的文景之际，即南越王赵佗统治的后期才废弃填覆，前后共60余年的时间，南越国经营这个造船工场也有50余年。这个造船工场所反映的正是南越国时期造船业的状况。

此处造船工场建造在灰黑色的沉积粘土层上，在粘上层中含有大量的海洋生物——有孔虫，说明船场所在地原来曾经是浅海，后来淤成了海滩。这个造船场可分为造船台和木料加工场两大区域。在船场的中心部位发现了3个平行并列的造船台，其中一号船台长达100米以上，船台的结构，是用枕木排列成基础，然后在枕木上平行铺放两行厚重的木板组成滑道。两排滑板上放有木墩，用来承架所造的木船。船台滑板与枕木没有用钉或榫卯固定，宽窄可任意调整。因此，既可造大小不同的船只，也可以造同一规格的船只，还可以根据需要把两个船台拼起来造更大的船。根据对船台构造的研究，这个造船工场主要生产的是平底船，吃水较浅，适宜在内陆的江河中或沿海岸航行。由船台现存宽度推算，可分别建造身宽5—8米，长约20米，载重25—30吨的大型木船。

在船台附近，发现了用来烘烤造船用木料的“弯木地牛”。

当时的工匠对木材的性质非常了解，对船台不同的部位选用不同的木材。如铺底的大枕木用杉木，杉木质轻，富于弹性，用作枕木可分散船体的重压而不易折断。格木材质坚重，纹理密致，耐水湿，用来作架承船体的木墩，适合需要质坚抗弯力强的要求。樟木坚硬，纹理斜行，结构细密，耐腐蚀，耐水湿又防虫，宜作滑板。而造船则用杉木、格木，质轻而耐水湿，是适宜造船的木材。

船场遗址还发现了许多造船用的工具，如铁铤、铁凿和船板捻缝专用的挣凿。还有方、圆两类铁钉，以及划线用的铅块，木垂球等。

其他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南越国时期造船业的状况。在象岗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一个青铜提筒上，铸有一圈四只船的图案。这些船两头翘起，船身呈流线形，船尾有橹，船上还有一种类似“望楼”的高台。有六人在船上，或作杀人状，或作持匕首状，或作摇橹状，还有跪在地上、双手反绑的小人，状似俘虏。1986年在广州市区发现的一座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出有彩绘的木船模型。船上前部有12名划桨木俑，后部是两层木楼，这应是一条楼船，船舱板上还有彩绘。在广西贵县罗泊湾同一时期的墓中出土两面铜鼓，其中一面鼓上有双身双尾的大船图案，船上有六人划桨。这些大概表现的是当时水战和水上航行的状况。从文献看，据《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时准备征服南越，“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从“粤欲与汉用船战”这一句来看，如果南越国的战船和水军不具备相当的规模和实力的话，是不

敢向汉朝挑战的。汉武帝对南越的挑战不敢掉以轻心，大修昆明池，建造大型楼船以训练水军，也从反面说明了南越战船规模之大和水军之强盛。

像广州造船工场那样大型的船台所造的大船，都是由王国政府工官控制的，是不可能给平民百姓使用的。所以除了官办的大工场以外，还有许多民办的小工场，用来制造小型船只，供一般百姓使用。在广州西汉早期墓 M1050 中，曾出土过一只独木舟模型，腐朽的较严重，只存船底和侧板，这种形制简单的传统产品，无疑是民间所造。当时民间交通仍普遍使用独木舟，也可能用一种较小而简单的木船。独木舟是用整段木头中间刨空而成，方法简单，容易制造。而且舟轻体小，行动比较灵活，缺点是遇水浪容易翻，而且舟的容积较小，不能多载人、货。不过，在风浪较小的内陆河港上，独木舟仍有它的优越性。直到东汉时期，广东仍有独木舟。另外，目前虽然没有见到竹筏、木筏的出土物，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当时民间使用竹筏、木筏的可能性。

总之，南越国时期的造船业，既有王国工官下辖的大型船场，建造军用、御用大船，又有民间作坊，制作简单的独木舟或小木船，供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所用。

当时的船只动力估计主要是靠人力划浆，但部分海船可能已经使用了风帆，否则单纯依靠人力划浆出海经商，是无法想像的。

商业与贸易

秦汉以前，岭南地区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秦始皇挥兵南下统一岭南时，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这里提到的“贾人”就是商人。当时秦朝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经常将商人或曾经作过商人的人发配到边境，也曾发配商贾到岭南，这从客观上对岭南的开发起到了好的效果。

赵伦割据岭南后，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贸易，用中原贵族喜爱的岭南土特产翡翠、珠玑、犀角、象牙等，与中原交换铜铁工具和马牛羊等牲畜，为岭南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提供了较先进的工具。除了吕后这一短时期外，南越一直与中原保持着贸易关系。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中原器物比秦以前大大增多了。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两件铜鼎上铭刻一“析”字，一件铜钁上刻“犛”（lí）字。据考证，“析”为春秋时楚邑，汉时于其地置析县，在今河南省内乡县。“犛”，汉时曾设置犛县，在今陕西武功县。这些文字表明了该器物的产地是中原。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的木牍“从器志”上记有“中上瓠州”、“中土食物五笥”字样，“中土”即今日所说中原。可见贸易范围很广，从食物、生活用品到生产工具，应有尽有。

同时，南越国也与周边地区进行贸易。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唐蒙出使南越，在番禺吃到了蜀地的枸酱。说明南越与西南夷也有着贸易往来，而且贸易范围很广泛。

南越国与海外也有贸易关系，这在文献中有零星记载，从考古发掘材料中也可找到一点线索。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些水晶、玛瑙、玻璃等，经鉴定，有的原料非中国产，有的制法则不同于中国的传统工艺，说明它们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通过贸易来自海外。广州象岗南越王墓中出土了5支原支大象牙，经鉴定，确认为是非洲象牙。还发现一个小漆盒内装着树脂状药物，可能是乳香。乳香产于红海沿岸，南越国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间接输入的。还有一件圆形银盒，器身器盖均用捶揲法压出蒜瓣形花纹，这种制法的金银器起源于波斯文化。还有一种金花泡饰，其上焊有小金珠，这种焊珠工艺与中国传统的金银细工不同，也应是西方的产品。这些都说明南越国已经与南亚、东南亚互通贸易了，通过南亚、东南亚，又引进了一些西方的东西。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越国内商业情况。当时应该既有官署的市井，又有民间进行贸易的场所。但当时南越国使用什么样的货币呢？文献没有记载。在已发掘的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贵县罗泊湾曾出土过一块金饼。广州有10座墓和一处造船遗址出过“半两”钱；广西平乐银山岭有6座墓出土过“半两”钱，这些半两中既有秦的，也有西汉吕后半两和文帝半两。这些钱可能是与汉朝的关市贸易中得来的。

有人认为岭南盛产铜矿，并且青铜冶炼及铸造技术都较高，所以当时应该有铸钱业了。但我们从南越国当时的状况看，秦统一以前，社会发展阶段较落后，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这种情形下，贸易形式恐怕还处于物物交换阶段。秦军南下带来了商品经济可能会对这种原始的贸易方式有所冲击，但秦军所能影响的是一些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的地方，不可能遍及整个岭南地区。南越国建立后，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其原因可能也是货币的作用不大。在南越国与中原的关市贸易中，有可能使用中原的货币，这无疑是十分便利

的，但同时也并行着物物交换。在对海外的贸易中，更是以物易物了。

目前在南越国时期的墓葬和遗址中，没有发现汉武帝元狩五年始铸的五铢钱。从元狩五年到南越灭亡有七年的时间。这七年中五铢钱没有流传到岭南，可见岭南与中原的贸易仍以物物交换为主。这也是南越王死后随葬品中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唯独没有铜钱的缘故吧。

结 语

南越王墓虽然发现于基建工地，幸而保存完好，没有遭到破坏。墓的形制独特，兼有竖穴墓与崖洞墓的建造方法与特征，不过从整体上看，应属于崖洞墓系统。墓中出土的随葬品异常丰富，共有金银器、铜器、铁器、玉器、陶器、漆器、玻璃器、丝织品等千余件，其中不少是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也是中国迄今发掘的保存完好的数座汉代大墓之一，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状况以及南越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南越国名义上是西汉的一个诸侯王国，实则僭越称帝，可以说具有双重性质。从南越王墓来看，形制、规模并没有超出诸侯王墓的规格，可用以随葬的部分金玉之器，如“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帝印”玉印、特大玉璧等都是其它王陵所未见的。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南越王称帝的物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此墓在某些方面已超出王陵的规格，可能在某些方面模仿了皇帝陵。西汉十一陵至今尚无一陵发掘，没有可用于对比的资料。如果将来有一天帝陵发掘了，或许对南越王墓的认识会更深入些。

南越王墓发掘结束后，就地建立了遗址博物馆。墓室经过修复后向游人开放；主要陈列墓中出土文物的综合陈列楼于1988年2月28日落成，对外开展展出。如果您有机会到了广州，一定要到博物馆去，您会看到赵昧长眠2000多年的地下宫殿，还能亲眼目睹本书介绍的文物精品。

墓主与时代

南越王墓的发掘资料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墓主是谁？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发掘者认为，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赵佗之孙——赵昧（即文献记载的赵胡），根据有如下几点。第一，墓内出土了一些文字资料，如“文帝行玺”金印、“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青铜勾鐸铭文、“帝印”玉印、“帝印”封泥、“赵昧”玉印、“昧”字封泥等，充分说明墓主是曾经称帝——文帝的某代南越王，名赵昧。第二，《史记》、《汉书》中的《南越（粤）列传》记载，南越国自赵佗起，共经历了5世93年。又记载，第三代王赵婴齐曾“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说明文帝是第一代南越王（自称武帝）的直接继承者，亦即第二代王（自称文帝）。由以上两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自称南越文帝的赵昧。第三，文献记载第二代王名胡，非名昧，其原因或是史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或是一人二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不同，或属于音义通假。第四，墓中出土的2枚“泰子”印（一玉印，一金印）应是曾为太子，又没当上南越王就死去的赵佗之子、赵昧之父生前的印章，由赵婴齐放入墓中。第五，赵昧非赵佗之子，应是赵佗之孙，且不是长孙，是次孙中的一个。

有的学者根据2枚“泰子”印以及赵胡，赵昧不相符合等情况，认为墓主应是第二代南越王赵胡，“赵昧”印应是赵胡之父或兄长的私章。还有人认为墓主赵昧是赵佗之子，赵佗之子曾继任王位。甚至有人还认为墓主是第三代南越王婴齐，“文帝行玺”金印是其父的遗物，故藏入自己墓中。这些观点都带有片面性，经不起仔细的推敲，所以是没有说服力的。

经过发掘者的详细考证，墓主约死于公元前122年左右，下葬时间当在死后不久。

生人殉葬

所谓人殉，就是用活人为死人殉葬。人殉是古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能够享受人殉的死者，生前都有一定的地位。我国早在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存在为氏族首领殉葬的现象（殉人一般是妻妾）。进入商周奴隶社会后，人殉这一残酷的社会现象发展到了极盛时期。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发掘了不少商代墓葬，有的贵族大墓发现殉人 90 人。使用殉人的墓主大都是奴隶主，殉人身分多为近臣和近侍。

秦汉以后，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社会体制已经确立。从总的方面来看，社会向前发展了，人殉现象逐渐减少，处于衰微的阶段。但由于宗法伦理思想和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加之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人殉这一恶俗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消失，甚至在某个历史时期、某个地区还颇为流行。就是到了明清时期，在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束缚下，仍广泛存在着妻妾从夫而死的现象（死法很多，如自缢、触棺、绝食、服毒等），地方志中称之为“烈女”，“烈妇”或“贞妇”。

西汉时期，不管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表明，人殉在中原地区基本上被禁止不存在了。西汉十一陵中，景帝阳陵和宣帝杜陵都发掘了部分陪葬坑，没有发现活人殉葬的现象。西汉王陵中，除南越王墓外，都没有发现人殉。偏居岭南的南越国，西汉时仍保留着人殉的习俗。南越王墓共发现殉人 15 具，墓道中有 2 具，其中 1 具置斜坡尽端处，可能是守卫的士兵，另 1 具葬外藏椁中，可能是车夫；前室有一具殉人，身分为“景巷令”；东耳室一具殉人与众多乐器同出，可能是乐伎；东侧室有四具“夫人”殉人，应是姬妾；西侧室七具殉人与厨房用具同出，可能都是杂役奴仆。经体质人类学家的鉴定，殉人多是受击砸后脑致死的，有的可能是自缢身亡，可见人殉是多么残酷！

寻找赵佗墓

文献记载，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在位长达 67 年之久。第二代王赵昧（赵胡）是赵佗的次孙，在位十余年病死，葬于象岗，其陵墓已经发掘。第三代王赵婴齐是赵昧的儿子，在位只有八九年。第四代王是婴齐之子赵兴，即位不久即被丞相吕嘉所杀。婴齐还有一子，名赵建德，是亡国之主，也是被杀身亡。南越国四主和五主在位时间合起来前后只有 3 年，又都是被杀死的，可以肯定没有建造与其身分相符的大型陵墓。如此来看，南越国五主就只剩下主赵佗和三主赵婴齐的陵墓没有找到。

文献记载，三主婴齐的陵墓已被孙权派往岭南的士卒盗掘。1983 年 5 月，也就是发现象岗大墓的前一个月，广州市考古队在西村车辆段宿舍工地清理了一座大型木椁墓，墓坑长 13 米、宽 6 米，全部填河沙。这座墓是广州所见南越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座木椁墓。惜墓室被严重盗掘，除两件小陶器外，连破陶片也没剩下一块。在发掘中，考古队员于盗洞内发现了玉舞人、玉璧、玉璜、玉剑饰等精美玉器若干件，应是盗墓者慌忙之中遗落下来的。这几件玉器不管是玉质还是雕琢工艺都不在象岗汉墓出土玉器之下。过去广州发掘过一些南越国时期的大墓，但从未出土过如此精美的玉佩饰。另外，墓中出土的玉剑饰，表明墓主应是男性（随葬有剑）。总之，从墓的规模、出土玉器的精美程度、墓主是男性、早期被盗掘一空等方面来看，此墓可能就是三主赵婴齐的陵墓。

南越国一主赵佗长眠何处？至今还是一个谜。广州市考古队从 50 年代起

就开始寻找南越王墓，可寻找的重点放在了广州市远郊地区。象岗二主赵昧墓和西村三主赵婴齐墓的发现，说明南越王墓不在广州远郊，就在市区人们的眼皮底下。象岗是越秀山最西的 1 个小石岗，再往西就是闻名的芝兰湖，再无山岗了，因此，赵佗墓应该往象岗以东的越秀山中去寻找。在越秀山附近就分布有比象岗还要高大的土石山岗，赵佗墓很可能深藏于此。赵佗墓葬所隐秘，被盗的可能性不大。赵佗在位 67 年，其时国力强盛，他的墓中一定藏有更多的珍宝。所以，赵佗墓一旦发现，定会成为更大的考古发现。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南越王墓自发现起，至今近 13 年了。这期间，专家学者就很多问题发表了看法，除了关于墓主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论外，学术界对大多数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本书采用的多是发掘报告里陈述的观点，另外还参考了其它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章，文章的名字详见书后的“参考文献”。书中有些观点与发掘报告不同，属作者本人粗浅的看法。书中使用的图版均采自《西汉南越王墓》和《中国考古文物之美——西汉南越王墓》。

本书是由刘振东和谭青枝共同编写完成的。照片由张明惠先生拍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古方两位先生给予了很多帮助。四川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付出了很多劳动。在此对诸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编写的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一定不少，诚望读者提出批评。

作 者

1996 年 6 月 25 日于西安

参考文献

1. 《史记》，（汉）司马迁著，中华书局校点本。
2. 《汉书》，（汉）班固著，中华书局校点本。
3. 《西汉南越王墓》（上下册），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91年。
4. 《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岭南西汉文物宝库，西汉南越王墓》，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91年。
5.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 《古南越国史》，余天炽等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7. 《南越王墓与南越王国》，吕烈丹著，广州文化出版社，1990年。
8. 《我国考古发掘又一重大收获，广州发现西汉南越王墓》，《人民日报》，1983年11月11日。
9. 《我国汉代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广州发现西汉南越王墓》，《考古》1983年第12期。
10. 《从南越王墓看南越王国》，黄展岳，《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
11. 《南越文王墓葬的人殉》，黄新美，《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2. 《岭南考古的重大发现——南越王墓重见天日》，越秀、李森，《人民画报》1984年第8期。
13. 《南越王墓发掘手记》，李季，《文物天地》1986年第3期。
14. 《象岗探秘》，黄淼章，《岭南文史》第10辑。
15.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墓主考》，麦英豪、黎金，《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
16. 《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印花凸版》，吕烈丹，《考古》1989年第2期。
17. 《铜提筒考略》，黄展岳，《考古》1989年9期。
18. 《象岗南越王墓反映的诸问题》，麦英豪，《岭南文史》第10辑。
19. 《关于两广出土北方动物纹牌饰问题》，黄展岳，《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2期。
20. 《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黄展岳，《考古》1996年。

后 记

南越王墓自发现起，至今近 13 年了。这期间，专家学者就很多问题发表了看法，除了关于墓主的问题存在较大争论外，学术界对大多数问题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本书采用的多是发掘报告里陈述的观点，另外还参考了其它一些学者的研究文章，文章的名字详见书后的“参考文献”。书中有些观点与发掘报告不同，属作者本人粗浅的看法。书中使用的图版均采自《西汉南越王墓》和《中国考古文物之美——西汉南越王墓》。

本书是由刘振东和谭青枝共同编写完成的。照片由张明惠先生拍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仁湘、古方两位先生给予了很多帮助。四川教育出版社的编辑也付出了很多劳动。在此对诸位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编写的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一定不少，诚望读者提出批评。

作 者

1996 年 6 月 25 日于西安

